

〔美〕史沫特莱

革命时期的中国人



中国展望出版社

1712-5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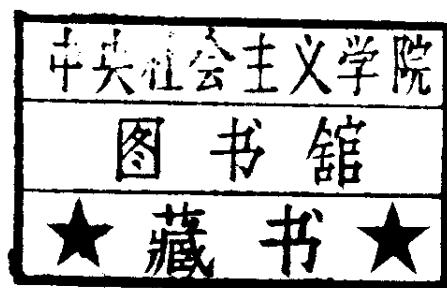
200412829

58745

革命时期的中国人

〔美〕史沫特莱著 麦金农编

王恩光 许邦兴 刘湖 译



中国展望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谨 献 给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两 国 人 民 之 间 的 友 谊

Agnes Smedley
PORTRAITS OF CHINESE WOMEN
IN REVOLUTIO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an
MacKinnon and Steve MacKinnon

Feminest Press, Box 334, Old Westbury,
New York 11568, U. S. A. 1976

译者的话

在建国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缅怀已经作古的许多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样，我们也缅怀已经离世的那些为中国革命事业作过贡献的外国朋友，其中一位就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出版了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的中译本（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三联书店1981年重印）。粉碎四人帮后，又出版了她倾注全部心血写成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中译本（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现在这部《革命时期的中国人》，则是史沫特莱著作的第三部中译本。我们选择在建国三十五周年出版此书，是借此对她表示一点纪念之意。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的这三部中译本，各有特色。如果说，第一、第二两部是传记性的长篇著作，那末这第三部却是一部短篇小说集。由于史沫特莱生前向世界报道中国革命的大量稿件都是用这种短篇小说或杂文的形式发表的，因此，出版这本文集的中译本，有着它独特的意义。

关于史沫特莱的生平，在《大地的女儿》中译本《序》和《伟大的道路》的《中译本校者序言》中均有介绍，本书英文版原编者序中还有更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史沫特莱对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谊，这是众所周知的事。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阔别二十年的美国朋友斯诺时，在第一句话中就向史沫特莱表示深切的悼念。

史沫特莱和斯诺都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史沫特莱去世后,是斯诺替她在美国举行了追悼会。事出有巧,1982年,斯诺夫人根据斯诺生前遗著和书信编成的集子《斯诺眼中的中国》在我国出版了中译本(中国学术出版社出版);今年,麦金农根据史沫特莱生前遗著编成的这本作品集又在我国出版了中译本。在翻译校订这两部作品的过程中,觉得这两位美国朋友有着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是美国记者、作家;两人都在帝国主义、中国反动势力横行于旧中国的时候来到中国,住留的时间也大致相同;他们都用犀利的笔向全世界如实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斗争的艰苦和希望,戳穿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虚伪宣传;他们都备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一个被逼迁居瑞士,一个前往英国,先后都病故在异乡,并在遗嘱中交代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中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两人都热爱中国。史沫特莱在去世前不久写给朱德同志的一封信中说:“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斯诺也说过类似的话:“……我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我的一部分应该始终留在中国黄褐色的山岭上,留在她绿色的梯田上……首先,应该留给那些……士兵,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生存……。”斯诺临终时用生命的最后力量向马海德医生讲出的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史沫特莱在去世前半年多向在伦敦参加英中友协成立大会的我国青年学生胡其安同志激动地表示:“……我将申请归化为中国人。……倘若有一天我终竟能成为中国籍公民,将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她的这一愿望虽未实现,但她的骨灰已安葬在我国北京八宝山革

命公墓，朱德同志亲笔为墓碑题字。

史沫特莱在我国十一年，一直参加中国革命活动（包括早期的“左联”文化运动），并以较长时间亲身参加新四军、八路军的活动，她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感性认识是相当丰富的。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采访见闻，撰写了大批短篇小说和杂文，陆续选编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攻》、《中国的战歌》等几部作品集。这几部作品集中，都浸透着史沫特莱本人的革命感情，文笔动人，而不象国际上一般新闻记者所采用的那种旁白式的笔调。读着读着，往往使人感到作者是一名中国革命作家，而不是一位外国记者。

这部《革命时期的中国人》是根据上述几本作品中的十八篇短文编成的。它主要反映了许多中国革命妇女的英雄形象，描绘了旧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悲惨境况，鞭鞑了少数背叛革命的堕落者，同时也收集了史沫特莱记叙中国人的其它著名短文。

虽然史沫特莱是位美国作家，但她描写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取材于中国，创作于中国，也应该是或至少共属于中国革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翻译校订完本书以后，感到它只是史沫特莱大批短篇创作中的一部分。如果能把上述几本作品集陆续译成中文出版，那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广大读者，特别是中国年轻一代的读者，看看一位外国朋友笔下介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数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经历，再看看这位外国朋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所抱的坚定信心和她的献身精神，必然会从中受到鼓舞和启迪。史沫特莱同我国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着深厚的情谊，在我国文化界、新闻界、学术界也有不少友好，目前还

有不少同志健在。他们都很关心史沫特莱的著作，关心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希望这本《革命时期的中国人》的中译本出版，能有助于进一步加深这种友谊，并引起我国读者对史沫特莱其他几部作品集的关注，早日出版中译本。

本书由王恩光同志校订。在校订过程中，承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同志，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中心委员会等单位许多同志提供多种有关文献资料，特此表示谢意。

1984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1
苦难曲	29
献身者	34
奉天五女子	55
徐美玲	62
行尸走肉	68
贵柱的故事	80
烈士的遗孀	93
难民	109
中国的显贵们	114
宋美龄与萧红	122
缫丝工人	125
青年与妇女委员会	133
女雇农	136
妇女参加抗战	141
我的中国儿子	148
白色恐怖片断	161
共产党员单菲	170
矿工家属	178

序 言

简·麦金农 史蒂夫·麦金农

1973年，妇女运动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随着美国人重新恢复对中国的关心，史沫特莱（公元1892—1950）已成为新一代人的重要发言人。她是一位作家，是革命运动的参与者，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妇女运动者，了解这一点的人们，无不受感于史沫特莱的精神而投身于他们自己的斗争之中。史沫特莱揭露了美国监狱中的种种黑幕；她在德国、印度和中国从事创建节制生育门诊所的工作；她为帮助组织印度反英革命运动筹措经费；她保护中国作家免受蒋介石的迫害；她成为一名具有国际地位的战地记者；她为援助中国抗战征募捐款；她替中国红军游击队护理伤员；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同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进行斗争。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一生的著述和经历，对于当前为争取自决权和新的社会制度而进行工作的其他人士来说，具有一种新的重要意义。

史沫特莱的活跃精神和她的妇女解放主义来自她的个人

* 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 1909—1957），1946年后任美国参议员。任议员期间，以充当反共急先锋著称，操纵参议院调查小组委员会，对许多机构和个人进行“忠诚调查”，打击民主和进步力量，制造恐怖气氛。他的观点和做法被称为麦卡锡主义。——译注

出身和阶级背景。她出生在密苏里州北部的农村贫苦之家，在美国西部许多贫穷小镇的棚屋中和矿山的帐篷中度过了童年。她的父亲嗜酒如命，悲观失望，虽是文盲，却善于讲故事。直至他到洛克菲勒设在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的矿山当了一名煤矿工人，情绪垮了，就不再讲故事了。史沫特莱的母亲拖儿带女，还给人家洗衣服。操劳过度，营养不良，风吹日晒，精疲力尽，使她不到四十岁就离开了人世。史沫特莱自幼受到杰西·詹姆士*浪漫故事的熏陶，受到美国西部牧童民谣的感染，在她身上有着美国旧时西部那种炽热的个人主义的烙印；同时也受到经济现实的逼迫而在年仅十二岁时受雇当女仆，使她敏锐地理解到谋生——特别是对于一名妇女来说是怎么回事。史沫特莱一家赤贫如洗，不得不靠她一个当妓女的姑姑给点接济，同这位亲戚的关系，使她终生感到既自豪又惭愧（史沫特莱生前最后的兴趣之一是在英国研究娼妓问题）。她从母亲和姑姑的具体生活中见到，下层阶级妇女们为一次又一次地受孕、生孩子和带孩子而饱受辛酸，害怕自己会堕落成这样的妇女。这种情绪在她一生中始终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并激励着她的工作。

她的母亲还向她灌输另一种梦想，那是一种在劳动人民的经历中无时不有的梦想，认为妇女应该通过教育自己解放自己。在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一书中，她用西南地区丰富的地方性资料，准确地描绘了她为实现这一梦想所遭遇到的种种苦难。在她家庭经济状况稳定期间，她偶然有机会上小学读书。1911至1912年，坦佩师范学校（现今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为她提供了第一次重要的教育机会。此时，她

* 杰西·詹姆士(Jesse James)是美国西部故事中的传奇人物。——译注

担任了校刊的编辑。她撰写的有关这一时期许多故事显然都是自传体的，其中有些故事在十八年以后写在《大地的女儿》一书之中。在坦佩师范学校，史沫特莱结识了她的第一个丈夫欧内斯特·布伦廷和布伦廷的姐姐索尔伯格。这两个人对史沫特莱的影响很大，然而，正象在她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史沫特莱害怕性生活和怀孕，害怕人工流产时感情上的痛苦，结果只能同丈夫离婚。通过在坦佩师范学校和后来在圣迭戈州立大学（当时叫圣迭戈师范学校）学习，她的教育程度有了提高，足以使她于1914年在圣迭戈师范学校求得了一个打字教员的职位。两年以后，她又失去了这个职位，因为她同社会党有联系；同参与1912年圣迭戈言论自由运动的人士也有联系，可能还因为她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有过接触。由于失业和为了寻找更深入的政治教育，史沫特莱决定向东前往纽约。

1917—1920年，史沫特莱在纽约居留。她精力充沛，活动能力很强。她一面给人当秘书，一面为社会党的党报《号召》和玛格丽特·桑格主编的《节制生育评论》撰写稿件。后来她愈来愈深地卷入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两国政府把印度的民族主义看作是一种颠覆活动，把美国支持印度民族主义的人看作是叛徒。英、美两国的谍报人员密切注视着史沫特莱的行动，他们追逐史沫特莱长达三十多年，追逐活动波及三大洲。1918年3月，史沫特莱和一名印度民族主义活动家纳斯·戈斯在纽约被捕。根据间谍法，控告他们煽动反对英国统治印度的叛乱活动和伪装外交人员。战争时期的歇斯底里又使这一控告变成了德国反对我盟国英国的一件阴谋案的组成部分。在汤姆斯监狱囚禁六个月之后，由于对史沫特莱的控告中，有一条是触犯了当地的一

项反节制生育法令，史沫特莱被保释出狱。保释金是由玛格丽特·桑格弄来的。在《号召》这份刊物中，史沫特莱发表了一篇文章《铁窗难友》，描写四名与她一起坐牢的女囚犯。^①监狱生活加深了她的激进主义观点，使她更多地卷入印度的革命运动。即使在控告尚未撤消以前（1923年才正式撤消），她就主编一份通讯刊物《印度新闻报道》，并担任印度解放之友社的执行秘书，为该社撰写文章和募集基金。^②

1920年，英国谍报部门和美国司法部采取联合行动，使美国的印度革命活动大受压制。那时候，史沫特莱的思想也已超越了象拉拉·拉巴特·莱伊（《大地的女儿》中那位慈父般的教授式人物）这些她早期导师们的温和思想，倾向于在印度发动武装革命。因此，她决定移居德国，参加一个名叫“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大地的女儿》的最后部分故事的地点虽然是在美国，但却描绘了她在德国这段期间的经历和紧张活动的考验。

柏林当时是海外印度解放活动的中心，于是史沫特莱就直接移居到这个中心。1921年，埃玛·戈德曼是这样描写她和她的一位印度同伴的：

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姑娘，是一位忠诚和真正的叛逆者。看来，除了为印度受压迫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以外，她的生活中没有别的兴趣。查托（她的印度朋友）则文质彬彬、才智横溢，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却是一个有点功于心计的人。他自称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十分明显，他是一个印地民族主义者，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了印地民族主义事业。^③

戈德曼不那么喜欢的这个“功于心计”的人就是维伦特拉纳斯·查托帕达雅，他是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长期以来的组织者和智囊人物。他后来成为史沫特莱的未婚同居丈夫，也是史沫特莱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师。但是，她同查托(人们都这样称呼他)的关系终于损害了她的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M. N. 罗伊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说，她同查托的关系，使其他印度革命人士同查托之间产生了对立情绪：

……著名的革命家查托帕达雅，当然是惹人喜爱的。大家知道，她(史沫特莱)来到了柏林，同查托同居了好几年。看来，她是为了毒化查托的思想，使查托反对我。总之，她是印度革命组织内部的一个恶魔……由于她的影响，查托这个机智而脚踏实地的人才改变了他的作法。最后我终于知道革命组织的内部有其他成员都从心底里不喜欢她，因为她自命为比印度人还要热爱印度的爱国者……④

在《大地的女儿》一书中，和在四十年代给朋友们的通信中，史沫特莱讲述了这段故事中自己的一面：她不仅要为革命组织筹措资金而奋力工作，她还要象奴仆一样替男人们做饭理家，而那些男人们却坐在一旁高谈革命。她还说，其他印度革命家都承认她对革命事业的积极贡献。例如，尼赫鲁于1926年在柏林同史沫特莱相遇，对她的印象极深，并于印度独立后，请她去访问印度。时隔二十多年之后，尼赫鲁*还于1949年

* 尼赫鲁 (Jawaharal Nehru, 1889—1964)，1947年印度独立后任总理，一直任职到逝世。他还是印度现任总理英迪拉·甘地的父亲。——译注

在纽约会见了她。后来，史沫特莱深受全面精神打击之苦，为了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撰写《大地的女儿》是她的部分医治方法。从此以后，尽管她的私人事务和政治事务依然有意识地缠着她，但是史沫特莱再也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再也不把感情寄托在某个男人身上了。

象在纽约的时候一样，史沫特莱在柏林的政治活动和求学深造活动并不局限于印度革命运动。她继续从事妇女运动的各项活动，她同玛格丽特·桑格继续保持个人接触。1927年，她请桑格到德国进行一次旅行演讲，并于1928年协助开办了柏林第一个节制生育门诊所。她还在柏林大学讲授英国问题研究和美国问题研究的课程，并向校方申请让她当一名印度历史的博士研究生。她在德国撰写了许多关于印度历史和妇女问题的文章^⑤，有些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二十年代，她进入德国左派激进知识界。她同凯绥·珂勒惠支*交上了朋友，两人一起工作，翻译（英译德）节制生育的小册子并为小册子作插图。1928至1929年，德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法兰克福日报》（当时象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和沃尔特·

* 凯绥·珂勒惠支 (Käthe Kollwitz)，德国女版画家。作品以反对德国军国主义、表现正在兴起的人民斗争和反映德国工人运动等为题材，曾被希特勒赶出艺术学院，剥夺教授学衔。1943年被逐出柏林，一年多后死去。1936年鲁迅在我国出版了她的版画选集。——译注

** 贝尔托特·布莱希特 (Bertold Brecht, 1898—1956)，德国戏剧家和诗人。1918年11月参加德国巴燕工人起义。二十年代末曾在柏林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结合创作活动，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1933年因反对纳粹被迫流亡国外，先后到过欧洲许多国家，后经苏联赴美国。1948年才回到柏林。——译注

本杰明那样的知名人物都为该报撰稿），用第一版连载《大地的女儿》。当时，史沫特莱已经到了中国，她从中国给《法兰克福日报》寄回各种报道文章。

史沫特莱于1929年初抵达中国时，她的心理状态看来是不稳定的。据别人的记述，她那时的情绪反复无常，有时候意志偏执，有时候富有同情心，幽默多趣甚至手舞足蹈。她很快就参与了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也许她的热情甚至比当年参与印度的政治运动时更为炽烈，因为此时她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妇女和穷人，而且可以直接体验他们的苦难。路易·艾黎在他的《有办法》一书中，抓住了来到中国一年以后的史沫特莱所关切的事物的性质：

……她要求看几家工厂，我们正好走访过几家令人吃惊的血汗工厂*，这一类工厂在当时上海“模范租界”中是到处都有的。

我现在还记得，当我告诉她上海产业工人中使我触目惊心的某些苦难、某些悲剧、某些轻生事件的时候，她在桌子对面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那双大眼睛，此刻仍呈现在我的脑际。

她露出了一丝短暂的苦笑，然后告诉我她对上海第一个强烈的印象，她曾经看到一群工人顶着盛夏的酷暑，在一个码头上用一辆绳子拖拉的手拉货车拖运货物。来了一个满腮胡须个子高大的印度巡

* 血汗工厂，指旧中国那些劳动条件极端恶劣、工资低、残酷剥削工人的小工厂。——译注

桶，为了替一个趾高气扬的外国官员所坐着的发亮的黑色轿车开路，竟然狠狠揍打那群拉车工人“汗流如注”的光背脊。此时，她感到受打的就是自己。她看到一个受压迫民族居然如此对待另一个受压迫的民族，不禁感到羞辱*。她心想：“凡是有胆量的人，这里真是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⑥

艾黎接着告诉她，他终于相信，要在旧制度下进行改革是不可能的；他谈到，有一批人把缫丝工人组织起来，他们被“当作共产党员在无锡残暴地处死了”。艾黎说：“这件事使我心中豁然开朗，唯一的道路就是实现根本的变革。史沫特莱向我靠近，抓住了我的腕子坚定地说，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实现这种变革吧！”⑦

根据前述这一类观察，史沫特莱为《法兰克福日报》和几家美国杂志撰写了一系列有力的报道文章，其中有许多文章后来被收录在她的第一本中国文集《中国人民的命运》（1933年出版）之中，有几篇则在本书中予以重印。这些早期的作品清楚地说明史沫特莱具有当作家的能力，也清楚地说明当时使她愈来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强烈感情。1931年，她同哈罗德·艾萨克斯一起创办了激进的上海刊物《中国论坛》。1932年春，她又同艾萨克斯合编了一本题为《国民党反动的五年》的书，该书是对蒋介石政府的一份强烈的控告书。1932年，史沫特莱是蒋介石和上海外国巡捕房严密监

* 当年上海的“公共租界”由英国人掌权，他们从当时英国殖民地印度调来一批印度人当警察，上海人称之为“印度巡捕”（或“红头阿三”），印度人也是受英国压迫的，故史沫特莱为此感到羞耻。——译注

视的对象和经常打扰的人物。1932年，史沫特莱帮助宋庆龄和中央研究院的成员们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便向外部世界宣传：在蒋介石的统治下，中国没有民权保障。^⑧她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其他一些项目中同宋庆龄紧密合作，不过后来因为个人之间的争论而互相疏远了。她打算象在柏林那样在上海建立一个节制生育门诊所，但是没有成功。她为撰写第一部报道毛泽东和朱德的江西苏维埃的作品《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年出版）搜集材料。这部著作是根据象红军司令员周建屏那样的共产党人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有一段时间，周正好在史沫特莱上海的同一幢公寓中养病。

史沫特莱本人也在1933年得了重病。她到苏联去养病，并在那里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这部书。1934年，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采访，并急于在美国报刊界寻找工作。同年，她又回到了中国。1936年12月，她在中国西北城市西安，报道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在这次事变中，蒋介石被张学良少帅扣押，被迫同意与共产党人结成联盟，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此后不久，她前往共产党的首都延安，鼓励驻华国际记者们亲自到那里看一看“赤匪”的庐山真面目。抗日战争期间，她凭借自己锐利有力的文章和亲身参与救护伤员的机会，帮助中国从国外获得各种医疗用品。她的信件随毛泽东的信件一起寄到美国，使白求恩和其他几位西方医生来到了中国；通过她个人和朱德向尼赫鲁的呼吁，使印度派来了五位医生并提供了医疗用品。她还为建立中国红十字会做过工作。

史沫特莱广交中国朋友，其中包括陈翰笙这样的经济学家，鲁迅、茅盾、丁玲这样的大作家，宋庆龄这样的上海政界人

士，朱德和周恩来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在上海的西方人士中，史沫特莱的名字也是大家熟知和大家喜欢的。她交友极广，有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哈罗德·艾萨克斯和弗兰克·格拉斯这样的激进分子，有埃德加·斯诺、尼姆·韦尔斯、杰克·贝尔登、兰德尔·古尔德和弗雷达·厄特利这样的新闻记者，有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有一位圣公会主教洛根·鲁茨，有香港医务总监的妻孥希儿达·西尔韦恩—克拉克，有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工作人员莫德·拉塞尔，还有美国驻华的主要军事人员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海军陆战队武官埃文斯·卡尔逊。显然，她的熟人遍及政界。当史沫特莱认为对于帮助饱经创伤的中国有所裨益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为宋美龄所编辑的一本书（用英文出版的《中国将再次崛起》）专门写了一章文字。但是她把自己的同情心完全倾注在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之中，特别是倾注在象红军总司令朱德那样的人物的身上，她后来为朱德撰写了传记。左派人士对她很熟悉，她在《法兰克福日报》取得的职务，就是由当时德国共产党党员尤里安·古姆佩尔茨介绍的。她早期撰写的几本关于中国的书是由先锋出版社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同时也在苏联由“外国工人合作出版协会”用《中国的红色风暴》为书名出版。另一方面，她不愿意那些派驻中国的西方共产党员去检查她的作品。三十年代后期，她拒绝遵循共产党只打日本帝国主义不打蒋介石的斗争路线。党的一些积极分子发现她个人主义严重，难以对付；史沫特莱则坚持要按自己的意图行事。

在史沫特莱三十年代的写作生涯中，对她产生最大影响的人物也许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始人鲁迅。她帮助翻译鲁迅

的作品，鲁迅也翻译她的作品。鲁迅的白话式文学和社会现实主义加强了史沫特莱从事写作的信心。1934至1935年，史沫特莱同鲁迅和鲁迅夫人许广平同住在一起几乎有一年时间。1936年，他们合作编辑了一本关于珂勒惠支的书。^⑨史沫特莱同著名小说家和妇女活动积极分子丁玲也很接近，生前一直同丁玲有通信往来。正是在丁玲那样的妇女运动工作者的帮助下，史沫特莱才能如此深刻地描写出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国妇女所处的环境。

中国压迫妇女的传统由来已久。^⑩在史沫特莱的小说中，我们见得最多的象征是野蛮的缠足制度，也就是把好端端的健康的脚折断成从脚趾到脚跟只有三寸长的“金莲”。除了某些地区和某些阶级有所不同外，从十世纪以来中国就用缠足来蹂躏女性。就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言，妇女在家庭中犹如奴隶，当然，这种情况在阶级与阶级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也有不同的方式。华南和华中地区底层阶级的妇女，除了料理家务、生儿育女、抚养孩子以外，还要从事田间劳动。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妇女在乡村到处都是织造土布的主要力量。当然，这类工作是在男子指导之下进行的。史沫特莱说，底层阶级的妇女往往作为“妹仔”（丫环）被随便买卖。上层阶级的妇女则不必干活，但是她们也没有财产权或不能继承财产。她们可以享受奢华和愉快的生活，可以掌管家务，但她们依然是男人们的玩物和（或）工具，从属于她们的父亲、丈夫或儿子。婚姻关系使上层和下层的妇女都从属于男子。首先，一切婚姻都是强迫的，新娘离开自己的家庭（较富的家庭还有一份嫁妆）就到夫家——在一个素不相识的丈夫家中生活和干活。结婚以后，只有生了儿子，才能提

高这个妇女的地位。此外，就象谚语中所说：“出嫁的女子买来的马，任你骑来任你打”。在低层阶级，虐杀女婴的事是常见的。从传统上看，妇女要逃脱家庭的压迫，只有自杀、当妓女或者出家当尼姑。

对于妇女和男人来说，中国的革命进程至少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满清王朝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被太平天国的农民大革命(1851—1864年)动摇了。这次革命运动中，缠足被宣布为非法。在战斗部队中，在全部由太平天国妇女组成的娘子军*中，男女在工作 and 财产权方面一律平等。在太平天国新的官员考试制度中，妇女可以同男子竞争。最后，由于清朝借助西方的优势军火，太平天国被镇压了下去，但是革命已经在农民中间播下了种子。

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西方帝国主义开始屠杀中国人民。通过炮舰外交和一系列战争（从1839—1942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到十九世纪末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出于这种外国的威胁（不是出于国内农民反抗问题），才加速了中国的上层阶级寻找比较激进的手段以使他们自己和中国恢复早年那种富庶和强盛的地位。到了本世纪初，改良主义者不再仅仅借助西方的武器和技术，而倾向于为实现现代化而接受西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模式。随之对妇女的权利也开始关心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杰出的改革家对女人缠足的做法进行抨击，并支持对妇女进行正规教育。在西方人士的心目中，缠足是代表中国落后的一种不文明的象征；如果中国

* 太平军的妇女，均编成女营，行军作战与男人相同，这种编制当时称为“女馆”。1853年太平天国天京的女馆约有十四万人，按军队编制，分前、后、左、右、中共四十军。——译注

要成为一个强盛的现代国家，妇女就必须受教育。中国需要一支更大和更有知识的工作队伍，也需要受过教育的母亲来带养上层阶级的孩子。

后来在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事，就象史沫特莱在本书的故事中所记载的那样，中国的革命力量在反动势力的政治倒退和大屠杀面前进行突围。革命就是用这种方式前进的，尽管进展得很缓慢，很曲折。妇女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日趋重要。第一批革命妇女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现的。她们来自社会上层阶级，是中国新办的和外国（特别是日本）的女子学校的毕业生。她们虽然受到西方妇女解放模式的影响，却有着显著的不同之处，她们的妇女解放观同那个时期的新的民族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批早期的激进妇女自觉地创办了一份宣传男女平等的《中国女报》，主张妇女拥有财产权、婚姻自由权、教育权和选举权。但是她们的首要论据却是民族主义的，即：中国需要坚强、独立的妇女使中国强盛起来。^①她们把大部分时间用于与男子一样地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的目的是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一个议会制的现代国家。这批妇女中最著名的一人就是《中国女报》的主笔和革命活动家秋瑾，1907年因领导一次反对满清王朝的起义，不幸被捕遇难。娘子军也参加了1911至1912年发生的共和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主张妇女参政者们立即要求有选举权。由于北京的国民审议会*拒绝她们的要求，她们就砸碎该会的玻璃窗，使该会垮了台。

1913年，共和革命的实权落入铁腕人物独裁者袁世凯之

* 原文如此。译者从历史资料中未查到这个“国民审议会”。民国初年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时的立法机关叫“参议院”。孙让位给袁世凯后，北京于1913年成立国会，下设参众两院。——译注

手。革命党人横遭杀戮，再次转入地下。但在中国知识界中（如果不是政治界的话），各种新思想依然十分活跃，掀起着某种形式的文化革命。这场文化革命于1919年5月4日达到了最高潮，那一天，在中国各大城市中发生了一连串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事件，他们反对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中，由西方列强把中国的主权出卖给日本。在“五四”运动中，妇女们也站在最前列，妇女问题也是一个首要问题。这场运动有助于产生一代新的激进的女革命家，就象史沫特莱短篇小说《献身者》中张小红这样的人物。传统的家族制度是受攻击的一大目标。妇女们要求婚姻自主权、财产权、选举权、工作权和受教育的权利。易卜生的剧本（特别是《玩偶之家》）译成中文后在中国上演。在大部分城市中和某些农村中建立了妇女组织，缠足现象开始消失。1919年，毛泽东发表了他第一篇政治论文。文章的主题是妇女、强迫婚姻和自杀问题。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二十年代的政治形势朝着更为进步和更民族主义化的方向发展。1923至1924年，孙中山按照苏联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改组了国民党。他还同当时人数不多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于1921年）结成联盟。尽一切努力把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教育，尤其是对于工人，更为重视。在象上海、广州那样的通商口岸的城市中，还出现了工会运动，妇女在工会运动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在短篇作品《缫丝工人》中，史沫特莱报道了一批广东女工的独立精神和战斗精神。上海两万三千名丝厂女工于1923年举行罢工，争取每天工作十小时，每天工资五分钱，取得了成功。领导这类罢工的妇女往往是一些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共产党员和无政府主义者，如向警予和丁玲。史沫特莱通过《献身者》中

的张小红这个人物，生动地描写了1925年“五卅”惨案中妇女们同西方帝国主义进行面对面斗争的情景。在“五卅”惨案时，上海的英国巡捕向一大群罢工工人和游行的学生开枪射击。根据史沫特莱的说法，这次革命的高潮是1925至1927年的北伐成功，那是由国共合作的部队向华南和华中的军阀发动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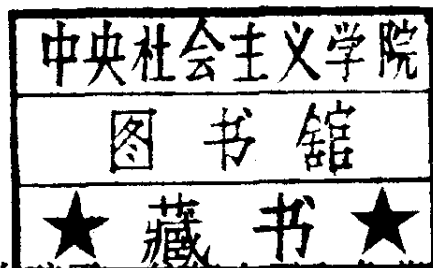
1927年3月的一次工人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那是一个令人兴奋和大有希望的时刻。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的一场白色恐怖使一切希望顷刻间化为泡影。1927年4月，蒋介石出其不意地下令逮捕和枪决一切共产党员。成千上万的人牺牲了，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其余的人则转入了地下。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员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试图在许多城市中举行武装起义，但所有的起义都失败了，革命力量剩下不到十分之一。剪短发不缠足的妇女是新中国妇女的标志，这样的妇女就成了白色恐怖和反动派搜捕的对象。史沫特莱在《行尸走肉》、《烈士的遗孀》、《献身者》和《共产党员单菲》等小说中准确地描绘出这种情景。在广州，一次就有二、三百名剪短发的妇女被枪毙了。在白色恐怖中被杀害的妇女领袖达一千多人。^⑩ 革命和妇女运动遭受的打击是沉重的，从而迫使这两者的方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927年以后，大城市似乎失去了生气。反动势力进来了，留在城里的那些有政治意识的青年们，有的堕落，有的消沉，就象《行尸走肉》中的齐月。或者对西方和日本的模式卑躬屈膝，谄媚奉承，就象贵柱和徐美玲及她丈夫。此后，战斗在农村中打响了，在那里，男女农民群众同来自城市的经过战斗考验的领导们结成了联盟。

从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革命到二十世纪，农民革命不

断爆发。但是，后来的几次农民叛乱，在对待妇女或组织水平方面，再也没有达到太平天国革命军这样先进的地步。一直到三十年代组织起由共产党员领导的苏维埃，特别是毛泽东和朱德所领导的著名江西省苏维埃（1928—1934年），才使大批农村妇女站起身来，自己作主，同男人们一起战斗和对压迫她们的男人进行战斗。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战争的内容，首先是共产党同蒋介石的国民党之间的内战，接着在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同这些原先的敌人结成了统一战线，为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而共同斗争。战争加速了经济衰退，使许多家庭遭到饥荒或接近饥荒。在战争和革命的压力下，传统的家族结构以及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封建依附关系被削弱了。在《青年与妇女委员会》一文中，史沫特莱报道华中地区安徽省立煌县的妇女们是怎样“放大脚、剪短发、参加学习，管理公务”的，那时候这个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建立了一个苏维埃。三十年代中期国民党白匪军重新占领了这个地区，恢复反动统治。剪短发的妇女要受到怀疑，当地又大力恢复了强迫婚姻。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史沫特莱于1939年访问了这个地区，此时妇女们又重新承担公务，在该游击区的抗日救国会中担任要职，并且在婚姻问题上同男人们进行斗争。安徽省立煌县是其他游击区的一个典范，在那里，农村妇女们象早期太平天国革命为争取男女平等那样进行斗争，她们的力量开始重新显露出来。在全中国，正是抗日统一战线，才给了共产党员和妇女运动一个进入农村社会的机会。

本书反映的中国妇女形象，记载了妇女们的觉醒，特别是低层阶级妇女的觉醒。这种记载，比我们所知的任何新闻报道、学术研究或其他当代中国资料都更真实。在本书的各



篇作品中，读者可以见到女矿工、纺织女工和象蔡妈妈那样的农村妇女，她们全都同传统的桎梏决裂而为解放进行斗争。读者可以找到水平大不相同的各种思想意识。有的妇女赤贫如洗，她们只能在社会上盲目乱闯，例如躺倒在沈阳街头那个老妇向围着她嘲笑的男人们发出一连串的咒骂。有的妇女是出身于城市上层阶级的思想激进的领导人，如《献身者》中的张小红或共产党员单菲。史沫特莱的作品真实地反映出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国妇女多种多样的生活和思想意识。

本书中的各篇故事和塑造的形象，说明史沫特莱坚决主张一切妇女若要争取独立，关键在于争取经济独立，这一观点在她的《大地的女儿》中也写得十分明确。此外，再推进一步说，一切被压迫的人要争取解放，也应该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在这些方面，史沫特莱的观点与三十年代中国共产主义妇女协会的主张是相同的。本书中所塑造的各种形象进一步展示了史沫特莱敬慕那些坚强和富有进取心的妇女，她们不受传统的习惯势力的束缚。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正是由于史沫特莱自己对这些习惯势力不予理睬，才使她同中国同志们之间关系紧张。可以想象，当她到达延安的时候，她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其他人士热烈拥抱——亲吻致使严肃的共产党员们感到吃惊的情景。也可能是她的过度热情（例如教共产党领导人跳方形舞）* 使人们产生误解，认为她已经超越了女性解放的程度。有一件事显然使别人对她产生相当大的抵触情绪：她说凡是同自己丈夫一起参加长征而幸存下来的妇

* 四对男女一起跳的舞。——译注

女，只要她们的丈夫有封建思想，就应该离婚。这些老资格的女革命家原先都是在农村环境中结婚和建立家庭关系的，她们认为，妇女们在这一革命阶段必须作出牺牲。^⑩史沫特莱和在这个问题上同她站在一边的中国妇女们都来自城市，因此对于农村的情况所知甚少。说实在的，无论是史沫特莱还是中国的妇女们，都是重视男女平等关系的，特别是在革命同志之间，更为重视这种平等关系。她们之间（指史沫特莱同中国妇女之间）的分歧，只在于为什么或怎样去实现这种平等关系。

史沫特莱于1937年9月离开延安，还是平日的那身打扮：一件白色的衬衣和一条宽肥的裤子。不过，在进入西安以前，她换上了一身红军军装，她完全知道这样做会引起轰动。果然，不久以后，评论文章利用史沫特莱穿着这身军装的照片证明她是同中国共产主义事业一鼻孔出气的。不幸的是，这些评论者忽略了这一点：史沫特莱之所以要穿这身红军军装而不穿她自己平时的衣服，正是为了进行宣传以引起人们对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注意。史沫特莱自己知道，她同中国人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尽管自己出身于工人阶级，她永远也达不到同中国人完全一致的地步。这个观点在她的大部分著作中都有所流露。她在《中国在反攻》一书中是这样写的：

今晚，这些挨饿的人们唱着歌，然后纷纷到他们那种在泥地上用稻草铺成的床上去休息，他们的歌声使我觉得比往常具有更深的意味了。他们的声音就象夜幕中的一支弦乐队。今天我吃饱了饭，我体会到自己永远也不能充分理解此中的意义，那是中

国为求取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实质！这种实质深深地印在这些工人和农民的心坎上。我依然是一个旁观者，我受到特殊照顾。尽管这些人在挨饿，但我总是能吃饱。尽管这些人在挨冻，但我总是能穿得暖，而且还有一张暖烘烘的床铺。他们将要出去打仗，许多人将要在冰冻三尺的战场上献出生命。而我仍将是一个旁观者。我看着他们的身影在昏暗的街道中逝去，他们依然引吭高歌。我渴望有一种视觉的火花，能使我深入到他们的头脑和心灵中进行观察，把他们对愿意为之献出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高的代价的这场伟大斗争所抱的信念描绘出来。^⑭

1938年史沫特莱是在汉口度过的，她在汉口等待意料中的日本进攻。她对自己信仰的事业所持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各界人士的尊敬，其中包括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反共新闻记者弗雷达·厄特利、美国驻华总领事约翰·戴维斯、《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亲共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还有她最亲密的朋友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她的公开工作是同罗伯特·K·S·利姆医生一起为中国红十字会进行宣传，同时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记者。在这一段时间内，史沫特莱特别擅于使政治观点极不相同的人士联合在一起。显然，她的自信心也与日俱增，使她更富有幽默感，更有热情。

1938年10月汉口沦陷以后，史沫特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关于她在新四军中的生活，《中国的战歌》一书（1943年美国诺夫出版社出版）已有生动的描述。《中国的

战歌》一书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报道战地情况的最佳作品之一。总之，她承受了难以置信的战争苦难，帮助建立一批红十字站，她管理伤员的急救工作。她还是群众集会上的一位演讲能手。刘良模1950年回忆史沫特莱时，曾记述她在长沙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讲话的情景。当时，她因患病连立起身来都很困难，但是她一站到群众面前，就变成了一位热情奔放的演讲者，她的讲话深深地激励了群众。^⑮

虽然她在新四军中的工作是为革命事业服务，但是从她于1939年6月写给弗雷达·厄特利的下述这封信中^⑯（当时史沫特莱正在游击队中）流露出她有某种程度的个人孤独感。

最最亲爱的弗雷达：

从心理观点和人性观点来看，汉口的最后几天是那样罕见和不寻常的几天，迄今尚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一想起这些日子，就会联想到肖伯纳的《心碎之家》。那时候你说过，世界上谁也比不上美国驻外国的新闻记者吃香，尤其是那些有修养的作风正派的美国记者。但我不知道假如我在芝加哥大街上见到这些人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别做梦啦！现在同我保持一定联系的只有埃文斯和弗兰克了。埃文斯从上海写了一张便条给我，托贝尔登捎来，贝尔登到这里呆一个星期。埃文斯想起托他捎给我他在《美洲》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的副本。弗兰克·多恩（美国海军军官）返回美国的时候，他在船上写了一封有人情味的长信给我。当时的汉口就象一艘轮船似的一个孤岛，在孤岛上人们只能自顾自。我想他此刻已把我忘了。有一次德丁在重庆问起别人我

究竟在哪里，这样才使他记起我还留在人世间的某个地方。

我有点偏爱汉口那种富有魅力的气氛。这是我这十年生活中的愉快的时刻。我在汉口遇到了外国人，其中有些是无赖，但大多数是具有西方世界多数人那种翩翩风度的人。这些人自己并不知道他们同中国人之间有着多么悬殊的不同。虽然我从来不愿意被人们当作资产阶级妇女来对待，但来自英国、美国也许还有法国的男人们，却具有一种下意识的深深敬重妇女的观念，具有一点保护妇女、帮助妇女的责任感，对妇女彬彬有礼。男人的这种彬彬有礼往往带有一种温存或罗曼史的色彩。要把这一点解释清楚是困难的，因为整个气氛就是如此。在中国男子的身上完全找不到这些东西。在中国，即使是男女之间的友谊和同志情谊也是没有的。外国的“罗曼史”一词在中国语言中意味着男女乱交的性关系。“爱”这个词在中国普遍用来表示性交。对于一个中国男人来说，即使接触一下女人的手臂或手，也意味着某种两性行为，足以引起震惊。

就这样，我在这片沙漠上生活了十年，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发现汉口是一个奇妙的地方。从那以后，我对这个问题一直想得很多。我应该回到西方世界呢？还是留在中国？我怕我必须留在中国，不过留在汉口则不在此例，我相信我们大家对此都有同感。我希望把这一点当作宝贵的记忆留在自己的脑海里。我常常想起一出戏，在这出戏中，来自不同阶级的许多人都乘在一艘正在大洋中下沉的轮船

上。他们一起面临着死亡，把阶级的差别抛开了，人性使他们互相靠近了。但是，一旦风暴停歇，轮船得救了，原有的冷酷的阶级差别又恢复了。我相信汉口也是一样。

爱你的

艾格妮丝

这一时期，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感情上最亲密的人是一个十岁男孩，名叫沈国华，她打算把他收养做自己的中国儿子。关于这一段故事（本书已予重新刊出），海明威*深深为之感动，因此将它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编著的一本书中，书名是《战斗的人们》。

1940年，来自日本的威胁增加了，再加上生病，迫使史沫特莱离开了她心爱的新四军。对新四军的领导者们来说，史沫特莱继续用她那支有影响的笔来写关于中国的文章是极为重要的。她前往当时国民党的陪都重庆，但由于健康状况恶劣，利姆医生命令她前往香港。1940年9月，她先到广西桂林，再乘飞机飞越日本人的战线抵达香港。在香港，有一小段时间她同朋友希尔达·西尔韦恩—克拉克一起养病。不久，香港的沦陷已迫在眉睫，她向埃文斯·卡尔逊借了一笔路费，回到她那阔别已久的圣迭戈家中。

四十年代，史沫特莱写成了她最重要的著作。那时她继续为几家刊物（包括《新共和》）撰写书评文章，但是她的主要任务是在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讲演之余完成《中国的战

* 海明威 (Ernest M. Hemingway 1899—1961)，美国著名作家，他反对法西斯，参加西班牙内战，写出了名著《战地钟声》，后来又写了《老人与海》等作品。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歌》(此书出版后几乎立刻被译成中文),并着手撰写朱德的传记。1943至1944年,《中国的战歌》出版并理所当然地获得好评之后,史沫特莱的个人生活就比较安定了。她同著名的驻华战地记者埃德加·斯诺和杰克·贝尔登的友谊也加深了。她的著作、演讲、广播节目,以及她在电台上同前传教士现任议员周以德*这样的人物进行辩论,这一切都证明史沫特莱已能驾轻就熟地运用自己掌握的材料和控制自己。四十年代中期,她是在作家们的圣地纽约州的耶德庄度过的。她在那里结识了许多值得交往的新朋友,其中包括凯瑟琳·安·波特、卡尔逊·麦卡勒斯、托尼·威利森和乔治·威利森。她又恢复了对戏剧的兴趣。除了有空上剧场看看戏以外,她还着手编写一部讲中国共产党解放中国妇女的剧本。那几年中,她还喜欢在花园中种点东西。她喜欢的是“种得捧捧的西红柿”,而不是美丽的花卉。

史沫特莱这种比较安定和创作量较高的生活,于1949年2月10日突然结束了。那一天美国陆军部公布了一份由麦克阿瑟将军的参谋部起草的报告,报告内容是关于佐尔基间谍网**的,报告指控史沫特莱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就是一名苏联间谍。史沫特莱立即出庭,迫使陆军公开撤消了对她的指控。但是在当时充满反共色彩的政治气氛下,各种没有根据的传说继续流传,说史沫特莱是一名共产党员,或者是某种颠覆分子。⑩此时的史沫特莱,已无法找到适当的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周以德(Walter H. Judd),1925至1931,1934至1938年先后在南京、福建、山西当传教医生,是个中国通。1943年起任美国众议员达二十年,持反华立场,是反华组织“百万人委员会”主席。——译注

**佐尔基是德国人,任职德国驻日大使馆,太平洋战争前,他和日本人尾崎秀实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判处死刑。——译注

1949年10月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以后，史沫特莱欣喜若狂。于是，尽管身体很不好，她还是决定回到中国去。史沫特莱先到伦敦，在伦敦等待签证。1950年5月4日，她在牛津医院接受一次手术，由于溃疡病把胃切除了三分之二。5月6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与世长逝了。几天以后，在纽约一所公谊会教派的会议厅里，埃德加·斯诺为她举行了一个仪式简朴、发言坦率的纪念会，有二百名友好参加了这次纪念会。

除了在中国，其他地方很少有人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逝世举行公开的哀悼。中国报刊以显要的版面刊登了丁玲、茅盾和其他朋友为她撰写的悼念文章。这些文章后来在一本纪念册中同史沫特莱译文选编合在一起重新出版。中国人表示愤慨，指责美国政府迫害史沫特莱，使她贫困致病，借此杀害了史沫特莱，因为她支持中国人民。^⑩1960年，周恩来总理经过二十多年再次会见了埃德加·斯诺，会见时他谈到纪念史沫特莱和罗斯福总统，向他们致敬。^⑪现在，史沫特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位女英雄，她被光荣地安葬在北京郊区。可是在美国，多年以来她的名字继续受到攻击和嘲笑。^⑫1956年，她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了，但没有人注意这本书。到了六十年代，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名字差不多已经被人忘却了。

现在，一场新的妇女运动已重新出现，产生了新的左派，人们对中国产生了新的关注，从而重新唤醒了大家对史沫特莱这样一位作家和这样一位人物的兴趣。她一定会为此含笑九泉的。正如《中国的战歌》第一部分所表明的那样，她从未把自己的生活历史同中国革命的历史分割开来。更有甚

者，她在这部著作和其他著作的字里行间，把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写作揉合到为争取社会根本变革的斗争中去，揉合到为摆脱每一种奴役形式的解放运动中去了。

本书刊登的故事和杂文是从大量史沫特莱的作品中选出的，大体上按发表年代排列。大部分作品是从她撰写的书籍中摘取的，有一些作品则是最初发表在报刊上的报道。除了此书所收录的材料以外，史沫特莱还写过其他一些以妇女问题为题材的作品，如为《铁窗难友》中的囚犯们还写过一些短文，此外还写过有关节制生育问题和印度妇女问题研究的文章。尽管她对妇女们的生活深为关心，但是她从未想到要专为自己出一本有关妇女问题的文集。当时的妇女运动还没有达到需要出版这样一本文集的程度，此外，史沫特莱是把当时的妇女斗争作为较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的。

本书不仅记载了痛苦和牺牲是中国妇女解放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表明，在中国，妇女运动同革命运动必然是互相联系、成败相关的。目前，西方的妇女运动正在寻找方向，正在经受着为克服障碍而遇到的种种困难，正在发现妇女运动同更大的政治运动之间的联系，因此，史沫特莱的小说也许可以比较生动地告诉我们一些东西。当然，世界上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历史环境，不过，也许正如史沫特莱所想的那样，西方的妇女们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得到教益。

序言注解

①见《号召》杂志，1920年2月15日，1920年2月22日，1920年2月29日，1920年3月14日。

②见琼·詹森《无家可归者：东印度的移民政治学（1900—1917年）》

(未发表的手稿)和艾伦·劳歇尔《美国的反帝国主义分子和亲印运动(1900—1932年)》,原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43卷(1974年2月)第83—110页。

③埃玛·戈德曼《过好我的一生》(纽约诺夫出版社1931年出版),第905页。

④《M.N.罗伊回忆录》(孟买和纽约,联合出版社1964年出版),第488页。

⑤《印度妇女今昔》,原载德国《妇女》月刊第32卷(1924年),第239—244、279—283页;《印度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原载德国《地缘政治学杂志》第二卷第六期(1925年6月),第385—403页;《反对亚洲的战争》,原载《国际》(工人协会)杂志第二卷第六十四期(1925年),第22—26页;《印度妇女》,原载《新苏黎世日报》1925年8月12日第四版;《印度教徒的献身精神》,原载《新苏黎世日报》1925年12月31日;《印度民族妇女领袖》,原载《德意志汇报》1925年12月31日;《当代印度妇女》,原载《新一代》第二十一卷(1925年)第95—100页;《印度妇女领袖》,原载《国家妇女》月刊第八卷第四期(1926年),第52页;《印度女作家》,原载《柏林日报》1926年9月4日;《黑人的复兴》,原载《语言学家》第三卷第六期(1928年3月15日),第1页(此刊是柏林大学的学生刊物)。除上述德文文章外,史沫特莱在德国期间还发表过一些用英文撰写的文章,其中包括:《乔德·辛格》,原载《民族》,1922年3月22日,第341—342页;《饥饿的德国》,原载《民族》,1923年11月28日,第601—602页;《阿卡里运动:一部英雄史诗》,原载《民族》,1924年7月2日,第15—17页;《德国的红色前线》,原载《民族》,1928年8月1日第116—117页;《战争爆发以来的写作》,原载《考察》,1929年2月1日,第596页,此文与朱利安·冈佩尔兹合写。

⑥路易·艾黎《有办法》(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52年出版),第15—16页。

⑦同上,第16页。

⑧中央研究院是由国家资助的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全国性科学院。来自中央研究院的若干杰出的知识分子同史沫特莱一起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其中包括作家鲁迅以及学者、教育家蔡元培和胡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于1932年12月,发起人为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胡适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与宋庆龄、鲁迅等完全对立。此条注解有误。——译注)

⑨这是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于1955年告诉石垣绫子的。见石垣绫子《回忆史沫特莱》(东京三铃书房1967年出版),第64页。

⑩关于中国妇女问题的参考文献目录,最佳的一份是玛丽琳·杨编的《中国妇女》,即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论文第十五号(美国密执安州安阿伯中国研究中心1973年出版)。另一部重要的近期著作是玛格丽·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合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妇女》(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出版)。还有一篇简短但题材广泛的书目资料,可以参看希尔·罗博瑟姆《妇女、反抗与

革命》（纽约文塔格出版社1974年出版）一书中的“当野鸡飞上天的时候”一章。

⑬见夏洛特·L·比安《中国妇女刊物中的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主义（1902—1911年）》，原载《现代中国》第一卷第四期（1975年10月），第379—416页。

⑭见海伦·F·斯诺（尼姆·韦尔斯）《现代中国妇女》（海牙和纽约，双日多伦出版公司1939年出版），第170页。

⑮关于早年的情况，请参阅胡其希（译音）《江西苏维埃的妇女革命》，原载《中国季刊》第59期（1974年7—9月），第477—490页。

⑯见《中国在反攻》（纽约先锋出版社1938年出版），第123页。

⑰见《史沫特莱——中国人民之友》（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出版），第40—41页。

⑱见弗雷达·厄特利《自由史诗》（华盛顿国民出版社1970年出版），第206—207页。

⑲对史沫特莱发动最全面、最直截了当的攻击的人是查尔斯·A·威洛比少将，参见他所著《上海阴谋案：佐尔基间谍网》一书（纽约达顿出版公司1952年出版）。查默斯·约翰逊则以比较客观的态度为史沫特莱进行辩护，参见他的学术著作《一个叛国的实例：尾崎秀实和佐尔基间谍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

⑳见《史沫特莱——中国人民之友》（出处见注⑰）。还可参看《人民中国》英文版为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和三周年所写的主要纪念文章（该刊1951年5月16日第13—14页和1953年5月16日第36页）。《人民中国》是《北京周报》的前身。

㉑见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纽约兰多姆出版社1961年出版）第77页。

㉒对于史沫特莱的典型的假评论，请参看肯尼思·E·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诱遇》（美国伊萨卡市，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

㉓日本例外。在日本，史沫特莱《朱德传》的日译本1967年由石垣绫子销售出许多本。此人从四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史沫特莱的好友，并在日本出版了史沫特莱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传记《回忆史沫特莱》（出处见注⑰）。

苦 难 曲

某夜，在中国内地一家小客店里，有个广东姑娘躺在一张旧式的中国大牙床上，倾诉着自己童年的生活情景。她的名字取自一支中国古老的民谣，那是一支在她开始懂事时就已熟悉了民谣。她那双纤细白嫩的巧手交迭地枕在头下，反复地唱着这支歌曲。

同大部分民谣一样，这是一支淳朴的歌曲，通过许多节歌词叙述一段完整的故事。它不落俗套，没有中国古典乐曲所固有的那种高深莫测的东西，就连最最西洋化的人都能听得懂。这歌曲不仅是一支民谣，而且是民间传说的回忆，是一种象征，对今天中国的许多事物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就字义来看，这是一支反映纪元前二百年一个哀怨的妻子为她在修筑长城中死去的丈夫所唱出的苦难曲。歌曲开始唱道：

正月梅花是新春，
家家户户挂红灯；
人家丈夫都团聚，
奴家的丈夫去造长城。

二月杏花暖洋洋，

本文原载《中国人民的命运》（纽约先锋出版社，1933年版），第313—315页。

双双燕子到南墙；
燕巢修得端端正，
对对成双在房梁。

歌词分十二段，接唱下去的各段是：

三月桃花是清明，
桃红柳绿正当景；
家家坟上飘白纸，
奴家坟上冷清清。

四月蔷薇满院香，
姑嫂双双去采桑；
桑篮挂在桑枝上，
擦一把眼泪捞一把桑。

五月石榴似黄梅，
黄梅发水落下来；
家家田中禾秧栽，
孟姜女田中草成堆。

六月荷花热难当，
蚊虫飞来叮脑膛；
宁吮奴家千口血，
莫叮奴丈夫范喜良。

七月凤仙秋风凉，
家家窗前裁衣裳；

青红蓝绿都作到，
孟姜女家中是空箱。

八月木樨雁叫开，
孤雁足下带书回；
闲人只说闲人话，
哪有人儿送衣来。

九月菊花是重阳，
重阳美酒菊花香；
满满斟杯吃不下，
无夫饮酒不成双。

十月芙蓉稻上场，
牵砮作米纳官粮；
家家都有砮来牵，
孟姜女家中是空仓。

十一月冰冻雪花飞，
孟姜女千里送寒衣；
前面乌鸦来领路，
哭倒长城惨凄凄。

十二月腊梅过年忙，
杀猪杀羊闹洋洋；
家家都有猪羊宰，

孟姜女家中哭断肠*

这支用柔和而悦耳的音调唱出的古代歌曲，传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

或许有人会问，这支歌曲为什么会如此广泛流传，许多中国人将告诉你：因为建筑长城这件事在当时几乎触动了中国每一个家庭。两千五百英里长的伟大而壮丽的长城，竟要在二十年内建成，如同埃及的金字塔或巴比伦王国的斜坡花园一样，它们都是靠奴隶劳动建成的。

据说，中华帝国每十个男人就有三人被征召去建筑长城，在残忍的监工们的皮鞭抽打下，他们象野兽一样被驱赶着去从事艰苦繁重的劳动。他们一个个精疲力尽倒在地下，在劳动中受了伤，或者奄奄一息尚未死去时，就被活活地埋葬在长城的土方之中。有关建筑长城的悲惨传说，已经流传了好多个世纪，人们对这段传统的回忆，一直萦回于这支民歌和其他许多民歌之中。

这支在中国如此广泛流传的歌曲，已不止是表达建筑长城苦难情况的一个象征，而是表达中国普遍苦难情况的象征。如今在上海的街头，你能听到苦力们在唱这支歌曲，但

* 三十年代中国流行的《孟姜女词曲》，由白占友收录在他编的《孟姜女的故事考》中，《大公报》社发行(1935年)，并由柳君涛配曲。如今不少六十岁以上的同志可能还熟悉当时流行全国的这段曲调的哀怨旋律。

2/4 $\left| \underline{\underline{1}} \quad 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2}} \quad \left| \quad 3 \cdot 2 \quad 3 \quad \left| \quad 5 \quad 6 \quad 5 \quad 3 \quad \left| \quad 2 \quad \cdot \quad 0 \quad \left| \quad 5 \quad 5 \quad 3 \cdot 2 \quad \right| \right. \right.$
 $\underline{\underline{1}} \cdot \underline{\underline{2}} \quad 3 \quad \left| \quad \underline{\underline{2}} \quad 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6}} \quad 1 \quad \left| \quad 5 \quad \cdot \quad 0 \quad \left| \quad 5 \cdot \quad 6 \quad 1 \quad \left| \quad 3 \quad 1 \quad 2 \quad 3 \quad \left| \quad \underline{\underline{2}} \quad 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6}} \quad 5 \quad \right| \right. \right.$
 $\underline{\underline{6}} \cdot \quad 0 \quad \left| \quad \underline{\underline{6}} \quad 2 \quad \underline{\underline{1}} \cdot 6 \quad \left| \quad 5 \cdot \quad 6 \quad 1 \quad \left| \quad \underline{\underline{2}} \quad 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6}} \quad 1 \quad \left| \quad 5 \cdot \quad 0 \quad \right| \right. \right. \quad \text{校者注}$

其内容有所改变。现在它是一支革命歌曲，保持了部分原歌词，但曲调还是原封未动。歌曲的改动部分是描述人民革命的故事，但这个革命当时被国民党出卖了。

现在，这支歌曲唱道，人民的苦难感动了上苍，长城听到这哀怨的呼声，崩坍了。这首歌词，部分是抒情的，部分是富于战斗性的。但是曲调依然是愁闷的，带有几乎一切民歌所共有的那种令人伤感的忧郁气息。

献 身 者

在中国革命演进的伟大历史舞台上，一再出现着一个妇女的形象。

猛然一看，这个形象是娇嫩的，双手像小孩那么纤细、柔软，但仔细再看，这个中等身材的苗条体型似乎是健壮而结实的，双手由于经常劳动而显得有点瘦削。一头光滑的乌发，就像夏夜那般柔和，有时修剪得像一个男孩，有时却留得长长的，用一个狭长的绿色小别针把长发扣在颈后。有时她身穿一套军装，有时穿着一身普通妇女常穿的那种褪了色的棉布衣裤，而有时候却穿上一件统治阶级贵妇人所穿的漂亮绸旗袍。

这个苗条的身影，现在穿着一件长长的丝绸睡袍，从颈子到脚踝保持着完美无缺的线条，朝我们转过脸来。她的容貌同服装并不相称。因为这里丝毫也看不到统治阶级贵妇人容貌中所共有的那种特征：毫无表情的娃娃式的美容，冷漠的神态，或专为自己打算的自私自利或冷酷的脸色。相反的，从她那朝着我们的面容中可以看出，有一团烈火在燃烧着，她的眼神和整个面部表情流露出一种生动活泼的、火热的信念。这是一张动人的聪明面孔。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能看透一切事物，了解一切事物。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她的每一个动作，她的每一句言词，都表现出这样两种力

本文原载《中国人民的命运》第68—89页。

量：一种是亲爱与热情；另一种是坚强而不可动摇的信念。

中国旧时封建舞台上的许多演员要走到台边介绍自己在戏中扮演的角色，这位妇女也可以进行一番自我介绍。最好让这位妇女讲得快些，要不然悲剧袭来，将使她永远哑口无言。所以，还是让她讲吧：

“我名叫张小红，1902年出生在香港一家豪富名门。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全部财富都靠我祖父一人赚来。我祖父早年在一个英国企业家的家中当仆人。

“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的几年内，被迫输入鸦片、支付巨额赔款、开辟租界，并把香港‘租给’英国，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英国企业家愿意给我祖父提供金钱和荣誉，只要我祖父肯帮他一起开拓这块新殖民地。我祖父接受了英国人所提出的条件。多年之后，我祖父积攒的家产总值达一千万两（白银），包括土地、房屋、仓库、店铺、码头、赌场及鸦片交易等。

“因为出身贫苦，我祖父没有受过封建教育，但由于经常同西方资本家密切联系，他深受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影响。他还保持着许多封建的社会习俗，他把这些习俗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结合在一起，使他更善于从每一个在他手下工作的男女工人身上榨取大量财富，以壮门庭。

“由于他的财富，使他受到华南耆绅们莫大的尊敬和钦佩，然而许多人却不赞成他的某些新思想，比如他家的妇女受教育的问题。幸亏我同我的姐姐们都已准许上学，我家有些男人也到外国留学去了。但是这种自由思想，只能在我祖

父自己家中畅行无阻，而无法扩及其他家庭或广大人民群众。象他的英国伙伴一样，他曾用鸦片毒害过广大群众，而且他还贩卖过男女奴隶。

“我的祖母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守旧派妇女，尽管家里已有大量财富，可是她从不感到满足，除非有更多的金钱通过她的手指流入家庭金库。我祖父去世后，在满清王朝垮台前不久，祖母已成为家中的最高权威。这是因为我父亲染上抽鸦片烟的恶习，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整天沉湎于寻花问柳之中的缘故。作为长子，我父亲本来应该掌握治家大权的。母亲是一个大盐商的女儿，能干而又有雄心，成了我祖母的一个得力支持者。

“我有两个姐姐和四个哥哥，但是我母亲却最疼爱我这样一个小妞。这是超乎寻常的，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子，据说即使一个具有畸形足的儿子也比一个具有十八罗汉*德行的女儿更宝贵，而给一个女儿受教育好比给别人的花园浇水一样。

“我六岁时，我们大家庭中有一名男子从国外留学归来，在香港创办了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他劝我母亲和祖母准许由我带头为女孩们上学开一先例。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一向都反对男女同校。

“在我们家中，尽管某些方面已为新思潮所渗透，但其他方面却仍保持着封建的和殖民主义的色彩。像中国南方的其他外国商人和中国商人一样，我家也深深扎根于纯粹的唯

* 本章所提到的十八罗汉是指如来佛的门徒（其中两名中国人，十六名印度人），全国各地寺庙里都有他们的塑像。十八罗汉的含义是表示幸运的象征。关于香港“妹仔”（婢女）的情况，史沫特莱曾用德文写过详尽报道（见1933年9月10日的《法兰克福日报》）。

利是图的商业主义之中。赚钱是生存的一个目的，是一件值得珍重的事物，是一位人人都得卑躬屈膝地加以顶礼膜拜的神。为了赚钱，一切都可以宽恕，一切都可以自圆其说，生活中的一切都从属于它。

“我能记忆起的最早几件事中，有一件就是我祖母参预的贩卖奴隶勾当。我说过，她是一个从不知足的妇女，除非金钱不断从她的指缝中流过。她所经营的奴隶通常都是些女孩子，有礼貌地被称之为‘妹仔’（即丫环，婢女之意）——有些中国和英国的辩护士试图美化她们的遭遇，称她们为‘养女’。

“这是中国的许多伪君子所用的一个托辞。‘妹仔’实际上是可用金钱买卖的奴隶，主人对她们有生杀之权。如果主人高兴，可以把她们转卖出去；可以把她们送进工厂去当工人，替主人挣钱；可以让她们当妓女；可以让她们卖给有钱的好色之徒当妾。这些姑娘都是中国南方各省农民的女儿，贫穷的农民，没有条件把女儿养到出嫁为止。

“在中国南方和香港，简直没有一个小康之家不养一、两个丫环的，这些婢女承担着沉重繁琐的家务劳动。美貌的姑娘通常以高价卖给富翁当小老婆。其余的则卖给妓院当妓女或卖给广州、澳门、香港或南洋诸城市盛行的‘花船’（变相的妓院）当歌女。上海及中国北方诸城市的富人，也到处去找美貌的广州小老婆或妓女。

“我家全靠这些婢女来料理家务劳动，因为我家所有的仆人都是‘妹仔’。这还不算，带到我家来的姑娘，有的还要卖给与我家相同阶级的富人。我祖母就做这类买卖。我还记得小时候曾站在我祖母身旁窥视着那些男人前来挑选姑娘的情景。来的人中，有时候是一个广州的胖官吏，有时候是

一名富商，是来自广州或香港的巨商，有时候是官吏的花花公子。他们是来找小老婆的，很少有男人或女人是来挑家庭婢女的。这些衣冠楚楚的男人来访时，给他们以香茗款待。我祖母对他们寒暄一番，表示关切他们的健康和國府的昌盛。

“然后，在他们说明来意之后，一个个浓妆艳抹的盛装姑娘被带进屋来。但是，买主都是精明狡猾的商人，不会轻易受骗上当。他们常常强迫姑娘卷起她那长而宽大的裤腿或撩起她的旗袍，让他们鉴定她大腿的肤色。不时，一个男人还拿来一块湿布，擦掉姑娘脸上的脂粉，确定她脸面肤色是否白皙。有时他甚至到姑娘身上东摸西摸。

“感到满意后，他就走近那姑娘，冲着她的脸笑嘻嘻地问道：‘你愿意做我的小老婆吗？’那粉颈低垂的姑娘低声回答说：‘愿意’。双眼滚下泪珠，在她那愁云笼罩的脸颊上留下了两行长长的泪痕。然后，她悄悄退走，而买主就同我祖母进行一番讨价还价。但在付清价款之前，他还一个劲儿地坚持要证据，以证明他这个商品确实是一个处女。如果在初夜他发现她并非处女，他将把她退还，并索还他所付的钱。

“有些男人喜欢说什么纳妾是为了找一个‘爱情的伴侣’，而元配夫人是传宗接代的传统方式所必需的，也是为了尊崇祖先，纳妾制度提供了爱情的因素。但是，我不禁要问——对谁的爱情？妾是一个可以随便买卖的奴隶，如果她主人高兴，或者主人变穷需要钱花，就可以把她再转卖给别人。或者她可能被她的有权势的主人赏赐给自己的一个下属。什么爱情！这种由富人随意购买孤苦无援的弱女子的勾当，就是我国统治阶级所谓的爱情。但是，即使对购买这些

弱女子的男人来说，也无所谓什么爱情，只不过是肉体的淫欲而已。

“你以为我是在讲过去二十五年前（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的黑暗年代那些已经消逝了的习俗吗？不，我讲的是现在的事情。因为贩卖妇女和姑娘的勾当，今日在华北、华南、华东、华西到处盛行。正当我的祖国深深地陷入贫穷与屈辱的困境之际，奴隶买卖的苦根也越扎越深。历届政府的高级官吏和军阀，不论是南京政府的，广州政府的，还是北洋政府的，都有他们买来的小老婆，就连外国人如此钦佩和支持的蒋介石，为了同一个女人结婚，竟先后遗弃了四个‘妻子’，因为他期望通过这个女人的种种关系来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而飞黄腾达。

“我有幸生为豪富名门的闺秀，得以尽情享受金钱所能买到的舒适而安逸的生活。我母亲对我爱护备至，视为掌上明珠，还为我的幸福前途费尽心思。我童年时常感到疑惑不解的是，假如我出生在农民家庭或者是穷人的女儿，我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是不是也会有像在我家厨房里操劳的婢女以及从我祖母之手买卖的姑娘们那样的遭遇呢？而我小时候所看到的那种被出卖给富人的姑娘含泪回答‘愿意’时的情景，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的。我童年时曾有过这样的幻想，我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勇往直前为解放所有的女奴而斗争。

“我童年时亦曾听到过贩卖男奴隶的情况，他们中很多人是被绑架来的，而另一些人则是在种种幌子下被贩运到海外去的，所有这些幌子似乎都意味着使‘感伤主义者’的良心得到安慰。一直沿用至今的幌子之一就是所谓的契约劳工。成千上万中国南方的贫苦农民，劳工或散兵游勇，在高

额月工资——发财致富的引诱下，或者在仅够充饥的非薄待遇的条件下，纷纷加入了英国、荷兰或法国在东南亚殖民地的种植园或矿山所招募的劳工队伍，这些地方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南洋’地区。

“有人经常听到关于中国‘移民’去南洋发财致富的情况。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真的发财。但是，一将成名万骨枯，每一个发财的人往往伴随着数以万计的劳工死于贫困、绝望和工头的皮鞭之下。这些人给家里汇钱，每年汇款累计成百万元。但是，被强迫去海外帝国主义殖民地谋生的祖国同胞数以百万计，如果他们省吃俭用，每人从菲薄的收入中每月节省下三、四元钱汇回祖国，那也构成一笔几百万元巨款了。但对少数致富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笔小得可怜的施舍而已。

“我可以再告诉你，当今把劳工遣送到欧洲各殖民地的种植园和矿山去所采用的方式。香港有一家荷兰大贸易公司的分公司，专门为荷属东印度的锡矿提供劳工，这些矿山地处恶劣环境，条件很差，在那里工作、生活的劳工寿命短促，一般仅能活几年。然而，这家荷兰公司每年两三次派中国劳工征募员到广东省招工。他们用虚构的故事，描述那里如何如何繁荣富有，诱骗劳工去荷属东印度（群岛）谋生。劳工征募员每征得一名劳工可得几元钱的报酬，还要分一部分给那些审批招工的中国官员，然后才可签发护照给这帮受骗者。

“新招募的劳工分批(每批数百人)搭船去香港，在那里还得经过荷兰公司一番严格的体格检查。看看他们的胸围是否宽大，他们的胳膊是否粗壮，他们的体力能否胜任荷属东印度无人能做的工作。这些人就这样被集中装船，从香港运

走了，甚至连牛群都不能采用这样的运输方式。他们到达荷属东印度的某港口后，一登陆就被囚禁在一个个家畜圈栏内。在那里办理登记手续，要在他们每人面前的一纸荷兰文法律文件上签字。这些劳工们连本国文字都不懂，当然看不懂那法律文件上的荷兰文，就这样无能为力地签了字。甚至连他们被迫在文件上按指印，就意味着在十年内将失去人身自由这一点，也不跟他们讲清楚。

“这一纸文件就把他们束缚起来了，只得老老实实地在锡矿里从事十年的艰苦劳动。荷兰人所订的低工资以及如此恶劣的条件，使他们成为牛马都不如的奴隶。事先在中国并不给他们看这个文件，以致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如果他们中有人拒绝在文件上签字，那就得偿付给公司一笔路费和伙食费，而且必须立即离境，自费返回中国。如果有人仍然提出抗议，等待着他们的乃是荷兰新主人的皮靴和皮鞭。于是，大多数人在绝望中签了字，因为他们已被牢牢地拴在贫困与愚昧的车轮上了。即使还有少数人敢于起来反对，象少数当过兵的、被荷兰人称为‘坏分子’的人，到头来还是签了字，因为斗争只是死亡，要回国也是死路一条罢了。

“然后，他们被运送至锡矿，好多人在那里死去，以致每年要送来两批新劳工作补充。那些试图逃跑的劳工被逮捕起来，送‘法庭’受审，‘法官’就是矿山的经理，其所施的刑罚，包括皮鞭抽打和苦役合同期的延长。

“今日南洋的奴隶主不仅仅限于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了，现在还有中国的百万富翁。他们是祖祖辈辈在那里艰苦劳动的中国父老的后代，他们通过不寻常的、不正当的手段积累起大量财产。这些后辈们现在已经加入了白人种植园主和矿山主的阶级阵线。种族界线已不复存在，取

而代之的是新出现的强硬的阶级界线，这种阶级界线是用工人们的鲜血划分的，南洋的财富就建筑在工人的尸体之上。

“……我上面所讲的似乎远离了我个人家史的正题。我认为你或许会对这个奴隶的故事感兴趣，因为在无数人类屈辱的事件中，唯有这件事使我觉醒，唤起我的责任感，它使我看清了统治阶级的庐山真面目。

“还是听我讲下去。我的家庭是一个封建习俗与现代资本主义思想的混合体，把这两种剥削方式结合在一起，就能从受它权势控制的人们身上榨取到大量财富。我恰巧在这样一个时期，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之中，能够有机会上学，能够享受到中国其他地方的姑娘所享受不到的种种权利。当我尚在童年时期，满清王朝被推翻了，一系列新思想洪水般涌进了我的祖国。男人剪掉了长发辫，从而消除了屈辱的象征，处于骚动焦点的妇女和姑娘也不再缠足了。我自己却从未缠过足。

“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是从1919年5月4日开始的，当时我方二八年华（即十六岁）。我的一个姐姐已在好多年前前结婚了，跟她的当大官的丈夫住在广州。她很幸运，她的婆家住在汕头，以致在广州有她单独的小家庭。但是，她很不愉快，因为她的生活只是一个接一个地生儿育女。她现有七个孩子，而且每年要生一个新的，使她身体日益衰弱。精神日益苦闷。她的丈夫却整天与达官贵人厮混，出入酒楼赌场，过着花天酒地的荒淫生活。

“我上中学时，母亲让我去广州和姐姐住在一起。我住在广州时，国立北京大学的师生们所发动的‘五四’运动开始了。他们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抗议凡尔赛和平会

议的决议，当时，假装是中国的朋友的帝国主义列强，却同意日本人占领中国的领土，还批准了日本强加给老朽腐败的北洋政府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五四’运动终于迫使中国（北洋政府）的代表退出了凡尔赛和会。

“但是对中国青年来说，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它是紧接着俄国的伟大十月革命而发生的，带来了对一切社会价值的重新评价，而且对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封建意识进行了致命的打击。广州的学生比香港的学生要自由得多，朝气蓬勃。我本人深受这场运动的感染而欣喜若狂。它犹如一阵清新凉爽的微风，吹透了一所陈腐发霉的古老住宅。

“国立北京大学的一些名教授和学生所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将西方的新知识引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就是该杂志的编辑。通过这本杂志，我接触到了马克思学说，从而开始认真地学习社会科学。当时，我是广东学生联合会的一个成员，这个学生联合会是非常激进的，后来我就当了该会领导人之一。

“那年，我们广州学生为贫苦儿童开办了几所义务学校。从那时开始，我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怜悯和同情这些贫苦孩子，而是想让他们掌握和运用我的知识，我要为他们服务。因为我从他们身上懂得了生活的真谛。在广州的随后两年中，我几乎利用我所有的课余时间，在工人夜校里教书。我从来不感到疲倦，因为来上学的工人都有像在沙漠里的人渴望找到水喝那样一股劲头。

“在我的这段生活中，充满着艰巨的工作，充满着伟大的抱负，也充满着同我家庭的艰巨斗争。除了我两个婚姻极不美满的姐姐以外，几乎全家人都想逼我结婚。不仅仅是母

亲泪流满面地恳求我结婚，我的哥哥、叔伯、阿姨，甚至近亲远戚将近一百人都集中目标，要使我从‘危险倾向’中解脱出来，并劝我同百万富翁的子弟结婚，以便把我束缚起来。我一再拒绝结婚，可是我母亲却一个劲儿地为我寻找她认为我可能会喜欢的其他有钱的年轻人。我每次回香港探亲，总是充满着痛苦与斗争；我的亲戚每次到广州我姐姐家探望和我所收到的每一封信，都给我带来了新的苦恼。

“但是，我坚决拒绝结婚，我下决心学医，将来当一名医生，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服务。我同家庭的斗争是我生平第一次同封建势力所作的艰巨斗争，这是一场为期两年多的、从四面八方紧紧地包围着我的可怕的斗争。

“我十八岁时，嫁给北洋政府一名高级官吏的大姐偷偷地寄钱给我，让我逃离广州去北京找她。有一天，我离开广州去香港，瞒着家里人，又搭乘轮船离港北上。好多年我没有回家。我从北京写信给母亲，请求她汇钱给我，供我在北京读医科学学校，并威胁说，如果她拒不汇钱，我再也不见她的面了。最后，慈母爱女之情占了上风，她终于向我的愿望低下了她那可悲而糊涂的头。

“在北京，我成为著名国立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在我预习医学专业的同时，我开始全面而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我读了许多书，许多篇文章和短篇小说以及许多翻译作品。我同诸如《新青年》和《创造社》*等出版物的一些作者进行了密切的联系，《创造社》是由当时上海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创办的一个新文学学会的会刊。*我在北京的整

* 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一个著名文学团体，1921年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发起，该社的刊物并不叫《创造社》，而叫《创造》（季刊、月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校者注

个学生生活充满着艰苦的工作。我学医学得越多，越感到绝大部分病症都是社会病，而这些病症在一个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就不会存在。

“我在北京学习了五年，‘五卅’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是由于1925年5月30日上海的英国巡捕对学生和工人进行大屠杀而引起的。这场大屠杀远比‘五四’运动更清楚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帝国主义是中国进步的巨大障碍。我们坚决要打倒帝国主义。在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以及在随后席卷全国的反英帝国主义的斗争浪潮中，我是十分积极的。可是到了第二年，一些不利于中国进步的新的反动势力竟明目张胆地跳到前台来活动了。北京的中国警察在3月18日屠杀了大批反对帝国主义最后通牒的游行示威学生——面对这一最后通牒，我们中国的统治者不仅俯首贴耳地在它的面前爬行，而且还击毙了那些反对它的人。

“大屠杀开始时，我正好在游行队伍中。我目睹警察举起步枪，开始向集合在一起的数以千计学生（包括小孩）的群众大会开枪。群众从枪林弹雨中四散逃跑，警察竟向他们的后背射击。我站在人群中动弹不得，眼看着警察举枪向逃跑的青年后背开枪，一阵狂笑之后又开枪了。他们似乎象打鸟那样故意击毙老百姓，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如此惨无人道、野蛮残酷的行径是我无力防止的。

“我转过身来想离开那里。但是我绊了一跤摔倒在地，我发现自己跌倒在一个姑娘身上，一条深色的污血像小溪那样从她的颈子上慢慢地流淌着。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倒在我身上，一个接一个地把我压在下面。我一点也动不了，只听到极度痛苦的喘气声，并感觉到爬在我上面的几个人在颤抖、在痉挛，同时，一股股带血腥味的暖流向我袭来，朝我的脸部

和颈部倾注，湿透了我的衣服。从远处传来了一阵阵劈劈啪啪的枪声以及男男女女的惨叫声。我竭力呼救，但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我当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呼救是徒劳的。一度我失去了知觉，后来一阵急促的呼声把我唤醒，我睁开眼睛一看，发现我已在自己的宿舍里，女同学们正在替我擦洗身上的血迹，一位医生在试我的体温。

“在这场大屠杀中，同学们的尸体挽救了我的生命。我只是在胳膊上部受了一点轻微的枪伤。当时，我还没有感觉到自己受了伤。但是，这场大屠杀却暴露了阻碍中国进步的另一帮敌人——军阀和官僚。

“同年春天，我已在北京经过六年的学习，成了一名医生。我原来打算要去外国继续深造，但是当时的革命运动气势高涨，革命军准备离开广州，挥戈北上抗击军阀。因此，我立即离开北京，匆匆赶向当时中国的革命中心——广州。

“自从我离开广州之后，香港工人总罢工爆发了，致使港英当局陷于瘫痪，同时也表现出工人阶级不可战胜的力量以及在中国革命中工人阶级应起的历史作用。这次罢工使得那些在我国大城市里稳坐钓鱼台的中国官僚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第一次感到又怕又恨，不寒而栗。在罢工期间，罢工者花了很多时间在广州市内外铺设了现代化的柏油马路，使广州市容大为改观。

“我还发现广东全省的几百万农民都已组织起自己的农会，并正在打碎地主和高利贷的封建锁链以及军阀官僚加在农民身上的镣铐。虽然这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但是在一个彻底革命的政党领导之下，农民为一个求得解放的社会纲领而团结在一起，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个政党就是把工农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而在两年前，它

还同国民党联合在一起。

“通过这些事态的发展，我终于理解到，我童年时代曾想过要领导一支军队去解放奴隶，那简直是幼稚的梦想。因为在这里正酝酿着一种社会制度，一种起来解放中国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制度。我过去一度梦想过要给予解放的那些女奴们，现在被看作是真正的人了，买卖奴隶是触犯刑律的，要判死罪；在殖民地的种植园或矿山中劳动的劳工们再也不会因签一纸合同而送命了。

“但与此同时，当我路经香港回家呆上几个小时，当我在广州走来走去随便观察一番，我就看到革命正面临着一种多么危险而可怕的局面啊。因为工人和农民的组织还很年轻，武器也配备不足。而那些封建商人、旧官僚以及所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他们的队伍中跳了出来，千方百计要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力，并企图粉碎方兴未艾的群众革命。

“我本人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根据我自己的志愿，并在我党的指示下，我参加了一支号称‘铁军’的部队的医疗队，作为革命女战士之一，我剪短了头发，穿上了军装，长驱直入地从广州奔赴长江流域。

“凡是象我们这样经历过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人，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千百万劳苦工农群众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和对革命的期望。多少世纪以来被压迫得直不起腰来的、衣不蔽体的广大农民现在站起来了，昂首挺胸地开始从事解放自己的工作。他们有的参加革命军队作战，有的当向导，有的在部队行军经过的地方，为了以茶水干粮招待过路的军队，在路旁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开始减租减息，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在好多地方还没收了大地主的土地，甚至赶走了当地的土豪劣绅。他们除了对革命军队的直接支援以外，在整个中

国南方地区开始爆发了一次次伟大的农民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成千上万的农民同旧军阀部队，同地主和土豪劣绅面对面地展开了白刃战。他们并不一定要等待革命军来到后再行动。只要一听到革命军逼近的消息，他们就召开会议，然后向反动势力发起猛烈的进攻。

“我所在的那个号称‘铁军’的部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认为是一支共产党军队。我们的指挥官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他们信心坚定，忠于原则，已成为今日华中工农红军的领导人物。我们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充满着荣誉感。有了群众的支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我们前进了。我们攻克了汉口和汉阳，我们包围了武昌，直至把它攻克。我的体格越发健壮，无论在野战医院里，或是在艰苦作战后从战地上运回伤兵，我似乎有使不尽的精力，从不知疲倦。我用双手阖上了成百名牺牲了的、中国英勇青年的双眼。我眼看一个个男女战士为革命而献身，一股钢铁般的坚强信念随之深深地渗进了我的心房。过去经常从我双目中流淌出来的热泪现已干涸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无穷的力量。

“我们的军队开进了南昌，而当我们在南昌的时候，爆发了反革命叛乱，可怕的白色恐怖开始了。军队内部的军官们都是地主劣绅的子弟，或者是来自城市的职业军人和资本家。从一开始他们对工农掌权抱有疑惧和憎恨心理，而当群众日益解放自己之时，这些军官同地主、劣绅和城市资本家联合起来结成统一战线以保持旧秩序，企图把新生的革命扼杀在摇篮里。

“在我们军队里，军官们特别憎恨那些平等对待普通士兵的政治委员们。军官们被迫出席每周举行一次的官兵联席会议，在会上普通士兵有权责问军官并要求他们公开帐目，

或追问军官为什么不给士兵发放应得的薪饷。军官赖以发财的、所有一切旧有的贪污特权都从此一扫而光。

“反动势力同革命力量公开冲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白色恐怖，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惨遭屠杀。随后，这白色恐怖又波及那些敢于昂首挺胸、站起来斗争的农民头上。成千上万新组织起来但缺少武器的工农群众均遭杀戮。所有的封建反动势力猖狂肆虐，于是中国大地血流成河。

“但是，革命武装力量为维护革命而战斗着。在南昌，我们的起义失败了，后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军长途跋涉，穿越整个江西省向汕头前进，准备在拿下汕头后进军广州，并希望广州将再次成为革命的堡垒。革命毕竟太年轻了，而城市里帝国主义分子所积极支持的反动势力当时却还十分强大。在汕头那次战役中我们被打败了，而就在那次战斗中我才发现有必要放下我的药箱而拿起步枪。到达中国南方后，我感到一切反动派所做的贩卖人口和贩卖鸦片等勾当我都熟悉，因为我本来就出生于反动统治阶级。虽然，我还是尽我的责任去照料伤员，可有时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还要战斗。我是怀着深刻的仇恨而战斗的。

“打败了——是的——是暂时性的。我们的部队撤退了，打散了。有些人转移到福建和江西去了。我们一部分人却向广州转移。我乔装打扮成一个时髦的贵妇人在广州住下了。我不时有点心神不定，甚至奢望有朝一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会被粉碎，从而有可能成立一个劳苦大众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广州公社的崩溃使我头脑里长期徘徊的那个幻想破灭了。

“1927年12月11日，广州的工农群众联合起来成立了广

州公社，但并未发生流血事件。躲在中央银行大厦里的少数士兵在开枪抵抗，把他们赶走之后，银行大厦已被付之一炬，周围的一些建筑物也被烈火焚毁了。公社就开始组织起一个工农革命政府，成为当时中国人民一个新的自由社会的中心。

“三天之后，反动军队在许多外国人的支持下和一些最封建的中国军官的领导下占领了广州，他们得到停泊在珠江里的外国炮艇的援助。公社被推翻了，人民又惨遭屠杀。如此残杀的惨状恐怕只有在过去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才能见到，但是，过去几百年中平息农民叛乱的大屠杀以及成吉思汗在征服别国时的大开杀戒，肯定都比不上白军在封建军官指使下大批杀戮广州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那种野蛮和残酷程度。

“全城毁于炮火，成千上万男女工人和男女学生在街上惨遭杀害。白军军官一见到工人或学生就杀——有时候他们在街上拦住过路人，然后把他们击毙；或者抓住他们，强迫他们跪下，不是砍下脑袋，就是碎尸万段。每一个剪短发的姑娘被抓到后，剥光衣服被现场的多少人所轮奸，然后从下身往上把她的身体撕成两片。这些姑娘通常只不过十五、六岁，而白军军官对来自香港进行采访的英国记者竟这样说道：‘那些剪短发的姑娘是最坏的了，她们非常傲慢，老是以蔑视的口吻反唇相讥。我们必须成千上万地杀掉她们’。

“被杀害的尸体堆积起来象一堆经屠宰后的猪的躯体。光在某一天里就有四千名囚犯被列队赶出城外，在机枪火力的扫射下一一倒下。当时在场的一些外国帝国主义领事馆的官员们还面带笑容地摆好姿势照了几张以尸体为背景的照片。五名苏联领事馆的官员当场被捕，在大街上游街示众，

他们口袋里的钱被抢掠一空，光着脚被杀害了。该领事馆的一名妇女被人用一根大木棒从她的阴道中插入活活捅死。

“四年之后，我在上海默默地倾听着一位美国军事情报官的妻子给我讲那个苏联妇女被杀害的经过，还给我看一张她当时被捅死的相片。这位情报官的妻子讲完之后，又伪善地补充了这么一句话：‘可是你要知道，我却一点也不同情这个女人！’好了，即使我以前一点也不知道，现在我才明白，原来美国的统治阶级不见得比中国的封建反动派要仁慈多少。美国工人们一旦要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放自己进行斗争，他们将会面临一种与我们在中国所面临的同样可怕的恐怖。

“在广州大屠杀几天之后，有钱人开始敢于上街了。我身穿丝绸旗袍打扮成一个资产阶级贵妇人模样，也在大街上蹒跚一番。这样我倒是安全的。若是一身贫苦妇女打扮，那我就有可能被杀害。我在街上走来走去，所到之处看到的尽是些受伤而垂死的工人，以及被击毙或砍了头的工人，我还看到一些资产阶级妇女走过大街，朝受伤和垂死的工人们弯下腰去，用石块或木头把他们打得脑浆横流。那些‘教养良好’的统治阶级贵妇人胸怀中的所谓人性、美德（无论在中国或其他国家都一样）现在在我面前充分暴露了它的恐怖实质。我听到别人讲，有几个这类妇女竟用削铅笔刀从苏联官员的尸体上割下一块肉来留作纪念，然后让这些尸体同在广州牺牲的革命烈士一起埋在万人坑里。

“资产阶级与军阀的政权重新建立起来了。所有的工会都被解散了，只有那个支持反动派的半官方黄色机修工工会例外。以前被革命政府所解散了的商团，现经广州商界加以改组，还加强了武器装备。全省的农会均告瓦解，数以千计的

农民在斗争中牺牲了。

“现在，那套封建——资本主义旧秩序又在广州恢复了。到处都是鸦片烟馆，鸦片烟竟成了进出口买卖的一种主要商品；狂嫖滥赌、笙歌饮宴又成为达官贵人们的主要娱乐活动。贩卖婢女之风再次盛行，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我又亲眼目睹农家姑娘被贩卖给巨商官家去当婢女或小老婆。

这个政权又恢复了那种对农民进行掠夺和征税的旧制度，它甚至采用投标拍卖的方式将收税权转让给最高出价人。为了要取得这些权利，投标人往往先要奉献给政府几百万元的贿金。他们带着自己的武装力量去农村胡作非为，不受拘束地向农民强征苛捐杂税。他们只向政府缴纳一部分应交的税款，把多余部份留作自用了。这个政府并不限定这多余税款的范围。这些象秃鹫一样的税务吸血鬼榨尽了农民的血汗。农民协会过去所赢得的一切人权，农民所有的种种希望和梦想统统被新成立的商人政客和军阀的政权化为泡影。如同一大群蝗虫飞掠过天空那样，笼罩着整个国民党和全中国。

“我看清了中国统治阶级的面目，这意味着我也看清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的面目。因为在中国反动派重新上台的过程中，他们是象亲兄弟那样互相勾结在一起的。他们对人类干尽了坏事，没有一起暴行，没有一个野蛮行为，没有一件罪行是没有他们的份的。帝国主义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有的只是赤贫、苦役、贪污腐败以及屈辱而已。

“当然，我是一个共产党人。除了希望广大劳苦大众成为自由的人，并能使他们获得自己应有的那种世代被剥夺了的文化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呢？我是一个令人信服

的共产党人，我在华中工农革命队伍里工作着，在那里我们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我们为建设一个人道主义的、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在这个地区，我是一名医生，一名卫生工作人员。过去，我作为贵族阶级的一员，学到不少知识；现在，我应该把全部知识贡献出来，为工农服务。

“开始，我们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愚昧与屈辱的旧制度；如今，我们有了学校，有了医院，有了俱乐部，有了剧团——还有属于劳动者所有的自由、土地以及我们自己的种种政治机关和军事保卫机构。我走遍我们这个地区，建立医疗机构，到处去作有关公共卫生的报告，还给妇女们讲课，教她们学习妇幼保健知识。我长时间地凝视着成百万张受压迫群众渴望得到知识的殷切面孔，再也没有其他东西能引起我的注视了。由于某种不便说明的原因而把我调到像上海那样一些反动派猖獗的大城市去工作时，这些殷切的面容始终在我面前感召着我。

“至于我出生的那个封建家庭——对我说来只不过是一个黑暗而丑恶的回忆罢了，对他们（家里人）说来，我却是一个可怕的恶梦。我的希望是，如果我还有机会去对付他们及其同类的话，我将作为红军的一份子摧毁他们所珍重的一切，为那些受他们奴役过的人带来人的生存权利。他们曾经试图用婚姻来约束我，把我同富家子弟一起拴在床上，让我生育更多的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小家伙。但是，我却从革命队伍里选中了一位我所疼爱的男人，我并没有采取资产阶级那一套神圣不可侵犯的结婚仪式。我既没有请牧师给我祝福，又没有请警方批准，就得到了我和他共同生活的许可。我的丈夫不幸在白色恐怖下牺牲了，虽然我的心和他一起被埋葬在汉口的一座无名坟墓里，但他的死是英雄的，是为了

我国的劳苦群众，他的牺牲更加锻炼了我那不懈的钢铁意志。

“你或许想知道我在中国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说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就够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是在一个创造新世界的队伍里战斗着。也就是说，某一天我或许会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消失——但是，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会给将来带来革命的胜利果实，我是这个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我该走了，因为还有好多工作要我去做，我不知道还应该做多久才能完成分配给我的那部分任务。”

奉天五女子

夜幕降临到这座被高大的满清城墙围住的奉天城。城外公共租界和日租界的生活方式同中国南方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看来有着天壤之别。午夜那四扇钢筋加固的城门一关闭（至翌晨五时才开城门），似乎与外界更加隔绝了。在中国的奉天和外部世界之间，数十年来在思想和行动方面确实存在着很大差距。

月光苍白，万籁俱寂，寒冷的天气似乎把周围一切声音都冻结起来了。只有一名站立在我家花园小石门外的女乞丐在发出一阵阵冗长而怪诞的哭泣声。她一再带着哭声道：“愿上天保佑你家……祝你发财……。”直到最后，我们院里没有一家愿给她些吃的，她才悻悻地走开了。她走后，在这花园里所能听到的唯一声音就是那高高地堆在灰色石墙边的高粱秆上的干叶子所发出的沙沙声。

在我们屋里，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国妇女正在那里谈论着——谈论她的丈夫、警察、债务，甚至谈论所谓的法庭和张学良少帅。张少帅那座戒备森严的城堡式官邸离我家只隔两条街，在月光中也显示出它的封建威严。如果走近那里，你只能看到那两丈高的石砌围墙的阴冷墙面以及持枪肃立的、

本文原载《新共和》，1930年6月11日，第99—101页。

奉天（即今辽宁省沈阳市）是过去满洲的省会，三十年代时是日本的一个半殖民地。当地的军官军阀张学良名义上是依附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后来在1936年，张在西安逮捕了蒋（见本书引言）。

穿着灰布军装的士兵。

正在谈论着的那个矮小女人还很年轻，她那柔软乌黑的头发朝后梳理着，在颈后挽成一个发髻。在她的脸上和她那双机敏的黑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奇异的表情。我对我的中国朋友们说：“她很漂亮。”他们中的一人回答说：“不，她并不漂亮。”然后，他似乎另有所思，改口说：“是的，她是漂亮的……但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漂亮。”或许由于同她那位比满洲的思想先进半个世纪的丈夫长期生活在一起，给她脸上留下了一种机敏的表情，使她养成了一种长时间保持警惕和忍耐的性格，甚至在有人死去时也能保持欲哭无泪的沉着姿态。她安详地坐着，双手迭放在膝盖上，讲述起她丈夫的情况。九个月以前，她丈夫的一个朋友在奉天以北的吉林被捕了。在严刑拷打下，这位朋友供认了他自己是国民党员，并供出她丈夫在奉天也加入了国民党。嗣后，她丈夫被当作一个“共产党员”遭到逮捕。他的命运比起其他一些突然失踪了的人来要好一些。除了那个遭受酷刑的人的口供以外，对他提不出什么罪证来——只有他多年来从事社会活动的经历，比如在山东做过救灾工作。但是，所谓“罪证”是可以凭空捏造的，在满洲是没有一个官员会为找“罪证”而操心的。

为了要挽救她丈夫免受折磨致死，这位矮小而美貌的女人到处求亲告友，终于借到了足够的金钱以贿赂官员和狱吏。她和亲友们不断地借钱行贿，而官吏们的贪婪却永无止境。据说当时新的刑事法典在南京生效了——那么由谁来解释这一刑法呢，难道由贪污腐化的旧官吏或是由新的反动派来解释吗？——他们不得不借了六百元美金聘请一位律师来为她丈夫提出进行审讯的要求。根据新刑事法典的法律，规定要进行“公开审判”。我天真地说我想出席这次公开审

判，于是在我们屋里响起了一片令人震惊的抗议声：

“如果你要那样做，那我们都将被当作共产党员而遭逮捕……审讯通常都是秘密进行的……他们会问你，你为什么对这件事那么感兴趣，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此时，那个矮小而美貌的女人彬彬有礼地向大家鞠了一躬，说了声“再见”，就悄悄地离去了，但是她的面部表情告诉人们，她同我们的想法并不一致。她走了之后，室内再次寂静无声了，只有我家花园里那堆干高粱叶子发出一阵阵的沙沙声。

我的女主人是一位身材矮小的旧式中国妇女，身穿一身短袄长裤。由于生育过度，她显得十分虚弱——她生了十二个孩子，其中六个已夭亡了。她丈夫走进屋里时，她马上站起来给他让坐。她没有文化，终日足不出户。她的一双眼睛十分明亮而机灵，她经常一坐几个小时，滔滔不绝地提出一连串有关其他地方的妇女的问题。提出的问题说明她很有头脑，象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妇女。她经常缄默不语而暗自叹息，所想的问题使我感到惊奇。她说，西方妇女真是幸运，她们能独立生活，她们愿意要孩子时才生孩子。她并不了解她本国南方的当代妇女的情况。作为一个来自直隶省（相当于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东的小部地区——译注）的当年才十五岁的小姑娘，她怎么会嫁给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男人呢？苦难重重，岁月难熬，奉天远离她老家，她生活的唯一内容就是生儿育女和埋葬夭亡的孩子。

现在她衰老了，显得憔悴而难看，而她丈夫却打算去买一个十六岁的妓女来当他的第二个妻子。我那瘦小的女主人不敢反对。但是，她的长子是一位身穿黑长衫的现代学生，他反对父亲纳妾。竟敢对他父亲直言：一旦他父亲的第二个妻子进门，他就离家出走永不回家。

他父亲告诫他说：“你是儿子……应该象个做儿子的样子！”

但是，儿子不孝，头脑却非常清醒，在一周前挨了他父亲一记耳光。人家说，中国的儿子都孝顺父亲。据我所知，并非都是这样。至少我从未见过哪一个男人的眼睛像我女主人的长子那样充满着那么多的仇恨。他在客人面前很少说话，但是当他的目光射向他父亲时，他的一双眼睛就说话了。他们父子之间经常发生摩擦。

这位父亲还向我自夸道：“旧时候，公婆吃饭时，儿媳就得站在旁边侍候。”

儿子插嘴道：“这就是那么多妇女死去的原因所在！”

父亲怒斥道：“住嘴，你这个蠢东西！”

儿子始终不甘缄默，而父亲也就不敢把第二个妻子带回家来。

有一位留有男孩发式的、身穿蓝布上衣的青年女教师在坐着闲聊。她是从美国回来的一名留学生。我们试图进入奉天的女犯监狱去看看。当时，典狱长对这位年轻妇女说：

“请告诉这外国女人，典狱长生病了，而没有他的许可什么事情也办不了。”然后，似乎给她提供一些私下的消息，接着说：“不行，她不能参观这监狱。这里不够清洁，不便让一位外国记者进来参观。”

但是，这位女教师却可以参观那监狱，因为她是中国人，是作为一名福利工作者到监狱参观的。她告诉我说，满洲的女人都还过着半奴隶式的生活。男人们依然拥有三妻四妾。而女人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权利。离婚这个概念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一个男人可以随意“遗弃”他的妻子，或讨上几个小老婆，而他的发妻却不能反对。她还得装作是新来人（小老婆）的朋友那样温顺。

“这里的女囚犯都犯了什么罪呢？”我问道。

那位年轻女教师回答说：“杀人罪。绝大部分都是因为犯了杀人罪而关在这里的。”

“杀人罪！……为什么……杀了谁？”

她回答说：“杀了她们的丈夫。”

有些妇女是消极的，而有些却不是，我曾经见到过一个被认为是消极的女人。她是一个愁容满面、缠过足的农村妇女，从山东逃荒到此，在大街上要饭。一双小脚在冰冻的大街上蹒跚地跛行着，她一会儿滑倒在地，一会儿又爬起来席地而坐，一会儿又干脆伸开手脚直躺在街心。装着馒头的那个小布袋裂开了，馒头撒落一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呆呆地站在她的身旁。

街上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但没有一个前来帮助她，相反地，他们都在放声大笑，而在拐角上的警察竟袖手旁观，跟着他们一起大笑。三个身穿花缎长袍、黑色马褂、头戴瓜皮小帽的花花公子挤进了人群同大家一起狂笑。

那农妇一动也不动，只是用双手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前后左右审视着看热闹的人群，好象一位将军在视察战场似的。然后，她开始行动了。她冲着这人群破口大骂，从他们

的历代祖先骂起，一直骂到他们的子孙后代。她从上到下对周围的人骂个痛快。她一点一滴地、反反复复地对他们进行了系统而彻底的咒骂。在她的咒骂声中，这些男人们脸上的笑容都收敛起来了，似乎有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突然袭击了他们。他们开始匆匆离去，我想或许他们中有些人看来已被吓得半瘫痪。但是，不管他们是在狼狈逃窜或者是在惊慌爬行，那农妇的最高“颂词”的声音总是尾随着他们。一些新来的、完全无知的男人沿着街角拐弯过来，当他们看见她坐在那里，也开始大笑起来。她故意对他们破口大骂，就像一只九尾猫那样把他们脸上的笑容痛斥殆尽。他们的面容都变得呆板、僵硬了，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匆匆逃跑了。最后，街上几乎空无一人。

此时，怀着无限忧虑和痛苦心情的农妇重新用她那双小小的缠足爬行起来。一直站在她身旁的小孩帮她捡拾起撒落在地上的馒头。他们两人蹒跚前行，消失在远方。

大街上挤满了男人，几乎没有什么女人，偶而有几辆载着盛装打扮的贵妇人的小汽车或人力车招摇过市。有些坐在车上的贵妇人口中还叼着烟咀在抽烟。不时，有三三两两的时髦姑娘大摇大摆地走过，她们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两手插在口袋里，一双天然大脚，满脑子自由思想。一望而知她们都是些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满怀着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学生。

有一次，一位身穿普通蓝布衫的女学生陪同一位中年妇女登上了一辆电车。显然，她们是母女俩。在她俩身上反映出相隔数十年的不同的文化修养。母亲有着一双缠过的小脚，她那满头光滑的长发在她脖子后面挽成一个闪亮的发髻。那姑娘健壮高大得象是一个中国北方的男子，齐眉短

发，天然大脚，面露机灵与自信的神色。

电车上挤满了男人，座无虚席。那姑娘一手抓住了车上的木杆，而另一只手则搀扶着她母亲。在全车的五十多名男乘客中，只有一个青年人站起来给中年妇女让座。这个青年从其服装来看显然是个学生。这位中年妇女在惊喜之余迸发出感激之情。车上的其他男乘客竟用逗乐的目光注视着那学生，边吐唾沫，边放声大笑，似乎在嘲笑这个竟会如此懦弱的男子。那学生和高个子姑娘同时向他们（乘客）投以藐视的目光。在五十人中只有他们两人。就整个中国南方来说，这个百分比是太低了，但就整个满洲地区来说，这个百分比简直是太高了。

徐美玲

徐美玲是一位落后于时代的女性，具有一般守旧的老式姑娘所共有的那些美德和弱点。她是在一个封建家庭里受旧礼教熏陶长大的——从小熟读诗书，擅长丹青，精于刺绣，治家有方，而且还工于书法。如今，她年方三十，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但她还显得那样年轻、动人，她有着一般中国妇女（工农劳动妇女除外）所共有的那身娇嫩、白皙的皮肤。她那满头光泽的乌发从漂亮的前额朝后梳去，在颈后挽成一个柔软的发髻。在那小巧的发髻上，她经常戴着几朵香气沁人的鲜花。她那不加装饰而线条匀称的中国式高领绸旗袍笔挺地垂及脚踝，衬托出她那苗条的身材与高雅的风姿。她双脚总是穿着一双平跟的软缎绣花鞋。

她行走时步履优美、姿态动人，但有时却显得有点僵硬、蹩扭。假如你仔细加以观察，你就能看到在她长丝袜底下缠着的那一道道宽宽的绷带。原来她的脚踝是被绷带缠着的。旧时候，中国内地的小姑娘都因缠足而致残。后来革命爆发了，掀起了反对缠足运动，于是要求所有三十岁以下的妇女都解放她们缠着的双足。在华南与华中一带的妇女协会还派出专人走家串户去宣传鼓动妇女们起来反对缠足与反对留长发，但也发生过这样一些情况，即还有些保守而迷信的

本文原载《新共和》，1930年4月9日，第219—220页。这篇故事早先是周德文撰写的，原文发表于1929年12月25日《法兰克福日报》。

妇女竟拒绝响应这种号召，而那些掌握法律知识的新派妇女则乖乖地剪掉了她们的长发，并解放了她们缠着的双足。

徐美玲解放了她的双足，忍受了那种不下于当初缠足时所经受的痛苦，这一痛苦正如俗话所说的，“小脚一双，眼泪一缸”。但是即使把缠足解放了，她的双脚还是一拐一扭地寸步难行。所以至今她还得绑上绷带，保持一种半缠足状态。

徐美玲比她丈夫长五岁。她丈夫是一所美国教会中学的毕业生，后来又毕业于一所教会大学。他是摩登化的崇拜者之一，他把摩登同美国风俗习惯混为一谈。他熟悉美国的歌曲、历史和文学，他会用英文写一手好文章，甚至比用中文写得还好。他讲英语时常带有鼻音。他唯一的梦想就是要到美国的福特汽车厂去工作，以便将来回国后可当一名福特汽车公司的代理商。但因经济条件限制，无力出国，他只得在上海一家银行里当一名办事员。由于头脑发热，他竟让徐美玲带着孩子们从内地搬到上海一起同住，于是他开始熏陶他的妻子，指望她会变得像他自己那样洋气十足。

在他的眼里，老家那些野草蔓生的中国老式宅院、彩瓦覆盖的屋顶、装饰华丽而不坚实的窗户以及那些雕刻着奇特图案的一件件中国家具，都象征着各种应该摧毁的东西。他是一个摩登人物。因此他租了一套新式的小公寓，那里的窗户是方方正正的，雪白的墙壁上空荡无物，西方式的洗澡间里常用的那种白色瓷罩下，耀眼的电灯显得更为光辉夺目。他把这套房子布置得像一般教会人士的住宅那样，陈设着普通的朴素家具以及一些零星的小摆设。他买来了一些色彩华丽但笔调俗气的现代德国和瑞士的月夜风景画，以取代那些题有富于哲理性词句的古老的中国条幅，或那些以松竹为内

容的长条画轴。他把这些西洋画片一一安装在带有金色宽边的镜框里，并把它们挂在墙壁上。但是，他最最珍爱的是那张纽约中央火车站的大照片。然后，他购置了一架留声机和好多张美国爵士音乐唱片，给自己的小家庭增添生气。他那八岁的小女儿能非常娴熟地跳完查尔斯敦舞。有一点真是上帝保佑，他倒并没有强迫徐美玲去模仿当时在中国的那些外国女传教士的习惯，头上非得戴一顶后沿翘得高高的像鸭子尾巴似的外国帽子不可，就这一点来说，他是相当通情达理的。

徐美玲像是在早已被人忘却的中国古战场上游荡的一个幽灵，整天在这所陌生而又俗不可耐的公寓房子里无聊地来回踱步。她是一个旧式女子，留恋着中国的旧东西。她的整个生命都灌输着旧式女子所具有的那种保守、庄重和沉着。可是她又是那么的无知、迷信而多疑，她只懂得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上海的生活环境对她说来犹如突然向她袭来的一场灾难。她丈夫日以继夜地尽讲些现代时髦的东西——屈从丈夫的意愿岂非贤妻的美德？因此，她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那所公寓、那些爵士音乐唱片，而且每周还要陪她丈夫一起去看两三场电影。她凝视着那些电影海报，那海报上几乎千篇一律地都画着男人俯伏在女人身上想干些什么勾当的画面。她还极端厌恶地注视着银幕上所出现的一个个袒胸露臂的外国女人抱着男人狂吻的无耻镜头。所有的电影似乎都在表演这些玩意儿，不是在表演一个愿意这样做的女主角，便是在表演一个不愿意这样做的主角。尽管她丈夫对她日益不满而有点急躁情绪，但也无法克服她怕看这些丑事的畏缩心情。因此夫妻之间日益隔阂了，他常常把她单独留在家里跟孩子们在一起，而自己却整宵在外同朋友们厮混去了。

后来发生了他同一个白俄舞女的私通事件。这个满头卷发、洋娃娃脸的白俄女郎是上海一家夜总会里的舞女。徐美玲乍听到她丈夫同白俄舞女搞不正当关系时，她就扑到丈夫身上痛哭起来，并用双臂紧紧地拽住丈夫的外衣，不让他晚间出门。她丈夫的几个朋友在一旁会意地狞笑着，并说道：

“徐美玲是一个多疑而爱吃醋的旧式女子，也够老的了。”
因为在中国，人们通常认为凡女子年满三十就算老了。

徐美玲只会讲一点儿英语，即使她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也决不会在那些凝视着她的朋友面前讲出自己的心里话。但是，她的丈夫却像大多数办事员那样，一味追求时髦而同时又感到空虚。他遇到一件新事或碰到一点麻烦都会大惊小怪，小题大作。有一次，他痛苦地惊呼说：“当初我根本不想跟徐美玲结婚，她愚昧无知，土里土气，头脑里没有一点新思想。我从她那里得不到一点帮助，我打算不要她了。”

我争辩道：“遗弃妻子是落后于时代的旧做法，再说孩子们又该怎么办呢？”

“那不是我的过错！她喜欢孩子。她可以带着孩子们去我父母那里过日子。我可以把老家的全部财产都给她。”

“那么这个白俄姑娘……？”

“她很摩登，她决不会阻止我飞黄腾达。她也想去美国。”

“她爱你也许就是为了想去美国吧。”

他却争辩说，我对这个姑娘一点也不了解。但他是错了。因为有一次徐美玲曾经带我去过这个白俄姑娘跳舞的那家咖啡馆。不一定要问她本人才能了解她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徐美玲只希望见见她，体会一下她勾引她丈夫的那种生

活方式。我们两人走进那家咖啡馆，便在就近一张小桌旁坐下。徐美玲战战兢兢地默坐在椅子的边缘上，而双眼却扫视着这华丽而俗气的舞厅。她那双乌黑的眼珠发射出咄咄逼人的锐利目光，很可能她那双眼睛要比一般摩登女郎的眼睛能看透更多的东西。我俩仔细观察了在舞池内跳舞的每一个舞女的服装、面貌和双足。徐美玲面部毫无一点表情，眼里却燃烧着怒火。中国的爵士乐队在吹奏着“索尼娅”乐曲的节奏，时不时地唱出如下的歌词：

我沮丧而痛心，
因为你不再爱你的尼哥拉斯！

此后，日子照常一天天度过，徐美玲的丈夫要“抛弃她”的决心也随之日益坚决。于是，哭泣的次数增多了，吵架的次数增多了，他离家不归的次数增多了。后来，徐美玲反而停止了哭泣。有一天，她忽然剪短了头发，不久又烫起波浪形的发式。过去表现高贵身份的那种高雅简朴的风度和端庄的仪表如今一扫而光了，改之以一个悲惨可怜的妇女形象出现，为了一个没有头脑的丈夫，竟不惜同一个没有头脑的舞女相竞争。不久之后，我曾去拜访过她，当她走进房间时，我才发现她那件雅致的长旗袍已被改成中国时髦姑娘常穿的齐膝短旗袍了。她下面那双笨拙而蹩扭的足踝上还紧紧地绑着绷带，人们一般是不大会注意到这一点的，除非看到她走路。

那天，她打开唱机，并仰着她那张愁闷悲伤的脸，羞怯怯地向我恳求道：“教我跳舞吧。”唱机上的唱片开始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她甚至还买了那天晚上我们在咖啡馆里听过的那张唱片。

但是，要跳舞，必须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和一双轻巧而有弹性的脚。而徐美玲的心情却象铅那样沉重，她那双脚早在她童年时就已残废了。一瘸一拐地走了几步之后，她突然在地板中部停顿下来，接着就象一个小姑娘那样用衣袖掩面放声大哭起来。两个孩子站在门口瞧着母亲。他们那双瞪得大大的眼睛里充满着惊奇的神情。唱机在我们背后一个劲儿地高唱着这样的歌词：

那是在十一月 我喝足了伏特加，
是啊！ 喂， 是啊！
那正是在想念您的时候， 索尼娅！

行尸走肉

(一)

南京有一所古老宽敞的中国式住宅，主人是在政府里当大官的一名学者兼政客。凭他善于题词写对，写得一手好字而赢得了学术头衔。还由于他一向甘愿充当军阀的辩护士而跻身于政客们的行列。此外，他年事已高，如根据古时候论资排辈的标准，他那年龄正好有助于扩大他言行的影响。

他家里共有九个女人：八个姨太太和一个女儿。宅内的各个厅堂居室里，甚至连女主人们经常散步的小花园里，总是弥漫着一股略带甜味而令人恶心的鸦片烟气味。因为所有的姨太太都抽鸦片烟。如今连女儿也染上了点烟瘾。

可是女儿齐月却不像几个姨太太那样整天不停地抽鸦片，也不像一个失魂落魄的幽灵那样成天漫步于烟雾弥漫的房间和小花园之中。因为她过去曾经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还曾向抽鸦片烟、纳妾制度以及一切颓废的旧思想意识（如按年资或书法来承认一个人的政治地位或学术成就）作过斗争。那是五年前的事了，当时她还是一个高大而生气勃勃的姑娘，穿着军装随同革命军从广州进军长江流域。如今她却是一个身穿漂亮花缎长旗袍、身材消瘦得象一根枯竹竿似的憔悴妇女了。

本文原载《中国人民的命运》，第97—108页。

1922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这位姑娘同她年轻丈夫一起赴莫斯科留学。丈夫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他头脑敏锐，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象大部分中国妇女驯顺其丈夫一样，年轻美貌而又富于理想的齐月对她丈夫爱慕备至，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在莫斯科学习了大多数中国妇女（包括共产党人）想学而还没学过的课程——妇女同男子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是一种生产力，不论其家庭出身、父亲、丈夫有什么地位，她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齐月在理论上懂得了这一点。

1926年她同丈夫回到中国，内心燃烧着切盼新世界诞生的激情，充满着人与人互相敬爱之情，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怀有要为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去斗争、去生活的决心。他们立即奔赴当时的革命圣地广州，并随同革命军进发到武汉三镇，同席卷整个南方的巨大革命运动交融在一起。在那时，要成为一个革命者是不难的，尤其像齐月那样整天与数以百万计的革命者为伍的人，更何况身边还有着—位当农民运动组织者的丈夫。

但灾难深重的1927年终于来到了。反革命开始猖狂活动，国土被工农和象齐月与她丈夫一样的知识分子的鲜血所染红。处于反革命营垒中的齐月的父亲成了南京政府奠基人之一。他是一个头脑封建的人，必然对共产党人恨之入骨，因为共产党人对他的生存构成了威胁，自然他便成为当时南京政府的一个发言人。

在那夺去成千上万革命者生命的残酷斗争中，齐月的丈夫在同农民一起作战时幸免于战死或被俘。但有一天，一个剪短发的姑娘在九江被捕了。由于被指控是共产党分子，经军事法庭短暂的审讯后，她被判了死刑。这个所谓的法庭居

然手下留情，因为姑娘宣称她是南京那个封建老学究的女儿。死刑暂缓执行，以待口供得到证实，后来回音到达，证明她所供属实，对她的判决也就无限期地延缓执行了。

老人来到了九江，在监狱里见到了他那被判死刑的女儿。由于在中国好多事情往往是个人说了算，于是在他的要求下，判决竟被撤消。从此齐月开始进行比同白色恐怖作战更为可怕的斗争。脱离革命，丈夫又不在身边，姑娘只得单独面对那些培养她长大的所有一切封建势力。

他父亲几乎每天来监狱看她，经常含着眼泪，有时甚至跪下，恳求她悔过自新。他是她的父亲，他年老了，她是他唯一的孩子。是他给予她生存的机会，在爱抚中他抚养她长大成人，供衣供食，并让她受教育，而当时他家族中的其他女孩都未受过教育。她是他的亲生女儿，她的生命是属于他的。他请求她具结脱离共产党，并要求她公开保证永不参加革命工作。

随之发生了其他一些情况。齐月离开了那间污秽不堪的、黑暗潮湿的小牢房，而她的其他一些同志们还在那里等死。她在这种情况下搬迁入监狱中另一个舒适的单人牢房，在囚禁期间她父亲每天都来看望。在这样一个新环境里，尽管她父亲一再地恳求，齐月依然听到了远处传来她的同志们的声音，从而她竭力排斥了她父亲的影响。于是他不得不把她转移到苏州监狱去了，在那里她被囚押在一间条件舒适的特别牢房里。她一直被囚禁在那里，直至她改变态度，按照她父亲的意愿去做。从南京到苏州只是一段很短的距离，因此老人经常去探望她。

时光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流逝着。齐月对同志们的声音和他们那一双双警惕的日光的回忆越来越淡漠了，终于渐

渐地消失了，当她想到在监狱外边是多么自由和安全，又想到她有可能离开这舒适的特别牢房而重新跟她的同志们关押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头脑里矛盾重重、惊恐万状。于是她父亲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悦耳动听了。最后，她终于同意按照她父亲的请求行事。

她获释出狱后，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她确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此后她要同共产党切断一切联系，不再从事共产党的活动。然后，她随父亲返回南京，同父亲的小老婆们一起住在老家。

她那位当农民运动组织者的丈夫在报纸上看到了她那份声明。他心里怎么想，无人知晓，但是，大家知道他曾经强烈地爱过她，而且曾为她是一革命妇女而感到自豪。尽管如此，他还是了解中国妇女的优缺点的，他也了解那些把妇女束缚于家庭、旧思想和过去黑暗时代的旧制度的纽带，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他自己毕竟也来自这个颓废的旧社会。

齐月买得了自由之后，收到了她丈夫的一封来信——一封，只有一封。来信简短而又非常明确，信上签了他丈夫的正式全名，而不用她所熟悉的亲昵爱称。该信对她说，她已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值得为之生活和献身的共产主义；她买得了自由和生命，而这种自由和生命已成为毫无价值、令人厌恶的东西。恰恰在中国广大群众正面临要么争取解放，要么继续受奴役的时候，恰恰在他们生存的十字路口进行抉择的时刻，她竟做出这样的蠢事。怀着矛盾的心情——一方面由于绝望的爱情所带来的那种冷酷无情的辛酸，另一方面由于不可动摇的信念而产生的坚强意志——他给她加上了这样一些罪名：革命叛徒，祖国人民的叛徒，一个已在他心中永远死去的女人。信中毫无丝毫温柔体贴的感情或歉疚之意，只

有一句草率无礼的告别话。后来，齐月对他的情况仅了解到：他到江西去了，在红军里工作，后来成为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奠基人之一。

齐月住在南京她父亲的家里，足足花了五年时间一直沉思着她所买来的那个生命的价值。五年——并非是冥思苦想的五年，而是做了五年的梦，是躺在鸦片烟榻上所做的梦。她丈夫的那封来信也在她的枕头底下放了五年之久，就是她抽大烟和做梦时把她脑袋靠在上面的那个枕头。虽然，她后来一直没有收到过他的来信，不知他是否还活着。但官方报纸的报道中却不时提到过他的名字，称他是在华中一带为工农大众而战斗着的一名“赤匪”领导人。

齐月一边读着这类报道，一边纳头倒在枕头上抽着鸦片烟。她那一度健壮有力的体魄现在显得憔悴了，她那一度容光焕发的面貌如今苍白得像一张白纸，她那双眼睛凹陷得像老太婆一样。她像一个女幽灵那样独自默默地在她父亲家的小花园中漫步，或停下步来同她父亲的小老婆们闲聊一番。

在生气勃勃的过去与死气沉沉的现在之间，她建起了一座“鸦片烟之梦”的桥梁，至于到底做了些什么样的梦，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或者说可能是那气味难闻的鸦片烟已经把过去的种种回忆驱散殆尽了。

(二)

还有一个从前在革命队伍里呆过的女人也在南京懒散地徜徉着。她名叫帼南，她同丈夫一起赴莫斯科留过学。1927年4月回国时，正是反革命开始猖狂、在上海进行大屠杀之际，他们刚踏上上海的土地不久，她丈夫就被英国巡捕逮捕

了，他被引渡给中国反动当局后，即连同其余一百多名男女“犯人”一起被解送到刑场砍了脑袋。他的尸体像一具牲畜的躯体那样被扔进了那又长又深、埋葬着无数革命烈士尸体的，战壕似的万人塚里。

帼南获悉她丈夫被处决的消息后，她神经错乱了。她并不哭泣，带着干枯的眼神，不停顿地到处胡言乱语起来。她千篇一律地一再讲述她丈夫的生活情况，以及他被砍头而死去的情景。

“他们反绑着他的双手，硬要他跪下……但他高呼‘共产主义万岁！革命万岁！’……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我是一个共青团员。”

她就这样一个劲儿不停地讲啊，讲啊。如果她的朋友在她正讲得起劲时离开房间，她便站起身来紧跟在他们后面滔滔不绝地说：“他们紧绑着他的双手，硬要他跪下，然后砍下了他的脑袋，但他高呼‘共产主义万岁！革命万岁！’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我是一个共青团员！”

起初，她的朋友们不让她独自一人留在屋里，因为她使得他们胆战心惊，深怕她所讲的一切会给他们带来灾祸。长期以来，他们劝她不要出门，或劝她呆在自己房内。假如他们想要把她反锁在屋里，她便瞅着他们冷嘲热讽地说道：“你们以为我发疯了，是吗？你们要把我锁在屋里！因为我丈夫已被杀死，而我是一个共青团员！”他们担心她成为一个完全的疯子，便安慰她一番，没有锁门而让她自由自在地留在屋里。几个星期过去了，她便出门上街漫步、徘徊去了，有时走家串户，不停地讲啊，讲啊，讲啊。用她那双僵直而发亮的目光逼着大家来听她讲述有关她丈夫被杀的经过。有人这样说：“她是疯了。留神不要让她在敌人面前讲这些话。”

但帼南从来不在敌人面前讲话。她不认识什么外国人，似乎出于本能，在陌生的中国人面前她仍保持沉默，静静地倾听着他们所讲的每句话，默默地坐在她那椅子边沿上，似乎准备着向他们猛扑过去。

好几个月过去了，她缄默不语了。她在南京街头徬徨，有一天她忽然闯到了国民党党部，对一个官员说道：“好啊，你杀了我丈夫。那你也得杀死我，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我是一个共青团员。我没有什么活动能力，我是一个无用的废物。要么杀死我，要么给我工作，让我度过残生。让我整天加加数字，我就不去想什么了。”由于某种原因，这个官员把她安置在一个单间里，给她做些机械性的单调工作，每月付给她三十元工资，因为很显然她已精神错乱了，不值得让她饮弹而死。

帼南就这样在南京呆了五年，整天两眼直视着正前方，既不左顾又不右盼，从来也不看书，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也不探亲访友。一清早她去工作，晚上回到她那简朴空荡的小屋：她在一只煤油炉上煮些东西吃，然后上床休息。她的生活就是这样过的。她床边的小桌上放着一个劣质的黑色镜框，里面装着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一个大约二十五岁左右的表情热切而严肃的消瘦青年从那镜框里透露出他凝视的目光。年天早晨和每晚上床以前，帼南总是坐在床边默默地凝视着她已故丈夫的那张遗像。

有时，一位旧日的老朋友来访问她——那些背叛革命的老朋友现在都当上大官了。帼南往往用天真而直率的口吻来接待他们，结果把他们都吓跑了。她老是直率地说：“我是一个共青团员，可我现在不活跃了。要是我活跃的话，我不会在这里了，我也不会跟像你这样的人谈话了！”

当这些朋友向负责看管她的官员愤怒地谴责她时，那官员便回答说：“她是一个疯女人，她不会伤害人的。如果我认为她会……”他吞吞吐吐地留着半句带有威胁性的话，不说下去了。

一个革命者的妻子就这样在南京那个活人坟墓里度过了五年，而那个革命者的遗骸却在上海的万人塚里同新烈士的尸骨掺和在了一起了。

(三)

据士珍自称，在大革命时期她是一名共青团员。但对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就连她在莫斯科留学时认识她的人，都否认她是一个共青团员。他们说，她是一个轻浮浅薄的姑娘，有着一张傻乎乎的娃娃脸，经常同她的情人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消磨时光。

她那位情人倒真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还是一名杰出的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或许由于他个人的影响才使士珍能去莫斯科留学。至于学习，她不求甚解。她并不模仿当代时髦妇女那种落落大方的仪表，却紧紧抱着她的情人，学着贵妇人的姿态用婴孩讲话的口吻跟他噘噘地私语着，这些姿态或许会使女人变得更加“逗人喜爱”而对男人具有更大的迷惑力。士珍挂着“共青团员”的头衔，就因为她的情人是个共产党员，正好像西方有些大学的女学生在胸前佩带着她们情人的大学生联谊会徽章一样。她的情人是一个年岁较大，他在愚昧而封建的青年时代就已形成了对妇女的看法，因此，在他看来，象士珍这样一个离开男人就无法生存的女人竟是一个“共青团员”，那简直令人感到惊

呀！

当反革命开始猖狂之际，士珍自然而然地丢弃了她那“共青团员”头衔。她的阶级地位也不再时髦了。经过多少的犹豫不决与玩弄花招之后，她的情人也叛逃到反动阵营那边去了，居然还成了蒋介石的得力助手之一。长期以来对他有着这样一个奇怪的谣传：他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员，被党派去做秘密工作的。如果在白色恐怖的头几年里这还是真事的话，那末后来就不真实了。因为对一个革命者来说，生活中的每一步随时都会导致死亡——或比死亡还坏的酷刑折磨。所以要他放弃既得的权力、舒适、地位和财富，那是不合他的胃口的。他为反革命效劳已习以为常，甚至成瘾了，他当然不会放弃那个习惯。

士珍同这个男人秘密地同居了一段时期才同他正式结婚，一起住在南京一所高级住宅里。她在家里经常接待宴请那些在首都进进出出的军政要人及其夫人们。虽然岁月蹉跎，她仍然是一个傻乎乎娃娃脸的女人，还当着别人的面紧贴着她丈夫，装作小孩子模样，用婴孩学语的口吻跟他窃窃私语着。

尽管在她丈夫面前她故作姿态，装得像小孩那样孤弱无能、百依百顺，但有时她却会娇揉造作地摆起架子来。尤其当她昂首阔步以一个贵妇人的身份进入社交场合时，当她在麻将(牌)桌上同对手交锋时，或是当她遇见从前那些老朋友而她怀疑他们仍是共产党人时，这种时刻她便摆起架子来了。

作为一个官太太、社交场上的贵妇人，士珍也想沽名钓誉一番，诸如为某些爱国行动募捐金钱，捐款赞助某个学校、幼儿园或孤儿院，或为某一慈善团体筹组义演等等。在这些场合，她走出小汽车，身旁有卫兵或胸佩证章的公务员侍

候着，然后她当众发表一篇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为她所主持的事业吹嘘一番，或许她还为此而慷慨解囊捐献出五十或一百元大洋。

那些军阀或官僚为了争权夺利而聚集在南京开会之际，就是她最出风头之时。在这些会议期间，士珍的家便成为那些尚未赢得蒋介石完全宠信的军官及其夫人的宾馆。由于赌博是士珍及其同阶级的人的一种主要娱乐形式，每天下午及晚上她家的大客厅里摆满了一桌桌麻将，政府高级官员和军官太太们聚集在那里狂赌一番，输赢以数千元计。麻将牌的卡嗒声达于户外。

在牌桌上士珍不再是一个稚气十足、温顺恭良的弱女子，而是一个老练成熟的妇女，她是南京城里赫赫有名的一位女赌棍。但她并不老是赌赢的——因为输也罢、赢也罢，都是高超的政治策略。假如士珍的对手是一位未定局的军官的妻子，士珍便故意打错牌而让她赢钱。每当这位未定局军官的妻子走向房间时，不管女牌友们有什么看法而在低声悄语着，士珍总是立即停下赌博欣喜若狂地惊呼道：

“喏，您今天穿的旗袍多么漂亮啊——那双鞋多美啊！……您戴着一只新戒指——珍珠和绿玉镶的！值五百块钱吧，您说？当然，它值好多钱，但是买这些可爱东西的人，不仅要付得起这笔高价，还必须要有高雅的情趣来鉴赏、挑选这些珍品！”

牌局暂告停顿，用过茶点之后，紧接着是一顿丰盛的晚宴。士珍是一位周到的女主人，她自己不屑举箸进餐，却频频给同桌客人们敬菜。就餐的都是些雅致的上流妇女，她们不轻易品尝放在面前的佳肴，即使她们对某种食品稍感兴趣，也只是若无其事地举起筷子夹上小小一块，往自己那张涂满

脂粉的嘴脸送去。

晚宴结束后继续打牌，直至凌晨。等会议结束，酒阑席散，男人们都回来了。这些会议都是讨论如何打倒革命红军的问题。陪同他们欢宴狂饮的都是些上海的高级妓女，对她们“服务”给予每周数千元的报酬。这些妓女是专门包下来侍候那些未定局的军官的。

军官太太们一觉睡到下午，一起床便着手准备参加下一场牌局。士珍家里通常日以继夜地进行着牌局。但有时这些女士们却偶感兴趣坐着小汽车出城去兜风玩耍一番，有时她们竟强行征用玄武湖上的小游艇，斜靠着身子在平静的湖面上懒洋洋地划着小艇。那时候，所有的小艇都被征用了，再也不允许其他人在湖上划船。

在其他场合下，士珍又是一个成熟老练、机智灵活的女人。她过去在莫斯科和中国曾在中共党员的圈子里生活过一段时期，从而使她能承担起某种活动。她熟记她从前的男女同志们的名字和面容，还了解其中谁没有叛变。她密切注视着这些人在上海或南京的活动，她把所有了解到的情况汇报给她丈夫和他的主子。有时，她也会偶然地碰见她无法确定其身份的男人或女人。有时，她所碰见的人是她丈夫或他主子怀疑的对象，不知他们是否仍然保持着以前那种向党组织效忠的关系。对于这些人，她就盛情地请他们到她家里来喝茶，试图保持友谊。她会高高兴兴地大声对他们讲：

“我们以前都是共青团员，可不是吗？过去大家在一起的日子多么有趣啊！我仍然保留着我的同情心，而我不认为我们过去都错了！”

她也决不会粗暴无礼地问她的客人，此刻在想些什么，但利用她那种旁敲侧击与狡猾的本领，有办法使对方在交谈

中透露出重要的答案来。也有些客人具有和她相似的狡猾本领，从而得以控制住她所不知道的情报。对此她本能地有所察觉，于是她睁大了她那双圆圆的黑眼睛像蛇一样地盯着这样的客人，等待着对她的含沙射影作出回答。

有时候，她对于那些在白色恐怖中被捕、等待处决的男男女女表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在那些请求她援助或接受她援助的人面前，她显得仁慈、亲密、同情和慷慨。她说，这真是可悲的事件。这个人是谁，他干了些什么，谁是他的朋友，谁是他的家属——他们住在哪里？她眼睛盯着那客人的脸提出这一连串的问题。

在她丈夫或主子的幕后指挥下，她到处探听消息、窥测情况，然后回来汇报她所掌握的情况。这是她所听到的关于某些共产党员的情况，那是她所了解的有关他们的行动计划。这个男人是可疑的：他以前在莫斯科，而现在他却拥有较高贵的地位；他看来见多识广，但沉默寡言。或者，这里有一个可疑的女人：她衣着朴素，不施脂粉，从不赌博——但了解很多情况。这些人必定是共产党员！

有些人在她那戴着玉手镯的秀丽白嫩的双手指引下或许是可以得救的。如果被捕，那么等待着他们的只是刑具架、刽子手的大刀、执行枪决的行刑队，或是半死不活地被囚禁在那黑暗而封建的牢房里。至于像士珍那样的人，有的是财富、权力、地位。

在上海，有些外国人把她当作是“一位善良而坚强的男人的漂亮的妻子”来款待她。而在南京，这个噉噉喳喳的女人甚至听不到黎明时的鸡啼声，因为鸡啼声也好，击毙她以前的同志们的劈劈啪啪的枪声也好，都被她睡梦中的麻将牌的卡嗒声所淹没了。

贵柱的故事

我向在北京当教授的那个朋友讲完贵柱的故事之后，他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并不觉得奇怪。

他说道：“这在今日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中是有典型性的。贵柱是爱情的牺牲品。他生命中最重要东西就是自己的感情。当然喽！知识分子除此之外别无所有。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就连革命也只不过是一种感情，不象人民群众那样把革命看作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我感到奇怪的倒是贵柱并没有自杀——看来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自杀！”

是的，他讲得对。我回忆起满洲和华北的男女青年因失恋而自杀的情景。有一天，在奉天有个姑娘投河自尽了，因为她不愿在父母的强迫下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结婚。一周之后，北京有个男学生由于类似原因而自杀了。几乎每天都有年轻男女因爱情遭受挫折或威胁而自杀。他们在那封建旧家庭面前显得如此懦弱，不敢公开挑战，对那些令人窒息的旧礼教又不敢斗争，于是他们只得以死来结束自己的苦难。

贵柱与他们不同。他并没有自杀，却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贵柱十八岁时，他父亲就安排他同一个乡村姑娘结了婚。他在河南长大，从小在私塾读书，后来在小镇上一家老式学堂里念书。他从未听说有哪个儿子

本文原载《中国人民的命运》第146—158页。

竟敢违抗父母之命而拒不结婚的、成为他配偶的小莲香也没有听说过这种事。他俩青梅竹马，从小就在一起玩耍，而且想当然地认为，姑娘一出嫁就得住在公婆家中，就得象奴仆一样去侍候公婆。如果说，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之余会有一些幸福、愉快的话，那只是运气好，而决非应享的权利。

贵柱同莲香结婚三个月后，贵柱的父亲便送他去东京留学了。他认为，攻读商科会使儿子成为一个比他自己更大、更好的商人。尽管他父亲的鼻梁很长，据说是富人之相，岳父母选中当他们的乘龙快婿，然而他并没有发财。即使二十年之后，他父亲在他家附近只开了一家小店铺，在镇上一家店铺里拥有部份股金。他父亲经常去城里走走，以便长点见识；他希望受过新教育的儿子会比他更机灵，有助于在镇上发展他的生意。他还想买一个妓女做小老婆。如果他真的发财了，他可以讨更多的年轻小老婆。他把贵柱送到东京去留学，就是希望儿子将来能帮助他达到这些目的。

但是，贵柱却很像他那文静温柔的母亲，并不想去学什么商业，他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前往东京的。莲香的心情显得更沉重。婚后，她在家里承担起一个做媳妇的责任，操持家务比她原来想象的要艰苦得多。

她整天忍受着来自长辈们——姑母、祖父、祖母——的无休止的挑剔、责骂和吵闹，以及应付小孩子们的要求。她的公婆都是旧礼教人物，她不断地侍候着他们。他们吃饭时，她不能坐下，而只能站在一旁等他们吃完。贵柱的父亲在外面花天酒地应酬朋友后半夜回家时，莲香就得起床为公公准备夜宵，并默默地站在一旁侍候他。她经常要忙到午夜才能躺在贵柱身边痛哭一场。有一天，贵柱感到实在忍无可忍了。

他去店里找父亲，父亲正往纸盒里装糕点。这位老人把一些小块而不太新鲜的糕点放在盒子底层，把一些大块而新鲜的糕点铺在上层。一般朴素诚实的农民在回家打开糕点盒子以前，是不会察觉这种弄虚作假的伎俩的。儿子找他谈话，老人就停下手来听着。贵柱开始用一种恭敬的态度说，莲香劳累过度，处境不好，吃的是残羹剩饭，所以体弱多病，日趋消瘦，请求结束这种情况。他父亲的唯一回答却是一言不发，怒容满面地扭头跑出了店堂。儿子竟敢为他自己的妻子呼吁求情，这还了得！

由于这些缘故，贵柱在东京也难以安心求学。他的妻子曾写给他一封只有寥寥几个笨拙字迹的短信，有时她也偷偷出外花几个铜板请人代写家信给他。她来信中吐露出那单调悲惨的生活情景，经常呈现在贵柱眼前。因为贵柱对她怀有温柔体贴的爱情，从而增添他心中的惆怅和辛酸。有一次，他给父亲写了封字句尖锐的抗议信，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收到她的来信，而只收到过他父亲的一封短信，训斥他对父母出言不逊，理应感到羞愧！

贵柱想从他的同学那里得到一些安慰，可是他只听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着更困难的遭遇。他的同屋李君也是河南人，虽然只有二十四岁，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他的妻子是个愚昧无知的小脚女人，没有理想，没有主见，更没有什么抱负，像一头不会说话的牲畜，老是等着他来使唤。其他同学也告诉他一些同样苦恼的事情：旧式妻子们都认为“生儿育女”是她们的天职，心悦诚服地侍候丈夫和公婆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他的同学们花了好长时间在研究或讨论世界各国的新思潮。也就是通过他们，他才初次了解到有关自己祖国的革命运动的一些道理。

祖国的消息像一股强大的洪流向他袭来。因为那一年正好是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向北方进军，无数中国青年在战场上流血牺牲，唤醒了千百万中国群众。

中国革命在日本工人和革命学生的队伍中引起了强烈明确的反响。在那里，所谓的“危险思想”第一次表现出来了，贵柱自己也感到惊奇，他开始模模糊糊地理解到，这些日本人对待中国革命似乎比贵柱自己或他那些富裕的中国同胞们还要关心。

成千上万的示威工人，手持“中国革命万岁！中国革命必胜！世界革命必胜！”等大标语在东京大街上游行。他目睹日本警察攻击这些游行的工人，殴打、逮捕、囚禁他们。在大学里，日本学生遭到逮捕。一些公共场所举行了群众大会，贵柱也冲进会场，被警察抓住后进行了搜身盘问，并强迫他离开会场，不然就要逮捕。他便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了那里。

他曾经偷偷地穿越警察布下的警戒线，参加了其他一些大会，聆听日本工人、朝鲜人以及一两个中国人的慷慨激昂的发言。有时他觉得，日本人的发言中似乎流露出羡慕中国革命的情绪。有一次他听到一个日本人在宣称：“我们这里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然而以封建农业为背景的中国同志们却跑在我们前头了！多么可耻啊，同志们！”

贵柱曾向在东京的许多中国学生讲起过这件事。有钱的学生都憎恨这些日本工人和革命学生，说他们都是些危险的共产分子。危险——对谁危险呢？——这个想法朦胧而缓慢地透过贵柱的脑际。他不了解情况，也没有什么紧迫感，只是在脑海里激起这样那样的不同的想法。

但自从见到住在他和同学李君这间宿舍隔壁的那位日本

姑娘以后，原先的那些新思想在他头脑中渐渐淡漠了。事情是通过他刚来到东京时买的那只日本小提琴发生的，尽管他父亲指望儿子成为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而贵柱在商业方面却并未表现出有多大才能。他买了一只小提琴，他花于练琴的功夫多于学习。有一天，听到从邻近房屋里传来小提琴声，他就停止拉琴，仔细聆听，隔墙的琴声也停止了，似乎那位奏琴者也在听他拉琴。他一拉琴，那边也拉了起来！这样的情景在他看来要比整个中国革命有趣得多。从此他整天密切注视着隔壁邻居的动静。他从李君那里了解到有一位女学生的家就在隔壁。

某一天他见到了她！离他不远处有位姑娘站在阳台上，身材苗条，皮肤白皙，有一双细长而乌黑的眼睛，背上拖着一条粗黑的发辮。一阵清风袭来，吹弯了街旁的白桦树，并吹动了她那和服的长袖筒，象鸟的双翼那样在风中振翅飞舞。那身翠绿色和服上镶着鲜红色的花边，衣领口缝缀着一小块红布片。贵柱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生平从未见过的这一最可爱的景象。

站在阳台上的那位小姑娘发觉他在注视她。她对他的凝视报以腼腆的微笑，她必定看到了他脸部那文雅温柔的表情，她并没有羞怯地跑开。她甚至比他更勇敢大方，比他更开朗，她微笑地说：“你的小提琴拉得好极了。”贵柱的心脏似乎停止跳动了。他只是失魂落魄似地凝视着她。

从那以后，经常有机会与那位姑娘见面。有时他俩在大街上邂逅相遇，但又不象是事出偶然；有时他突然发现她在附近公园里的一条长凳上静坐着。于是他无心学习了，更不去想中国革命了，只是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同她见面。他知道她的名字叫木子，并了解到她不久将中学毕业。她的父母知道了

她同他来往的情况，对女儿的新相识日益不满。因为贵柱是中国人，而这一阶级中的日本人却把中国人看作是劣等人。木子则不然——不，不，她是一个现代姑娘。

每当贵柱倾听着她那低沉而甜润的嗓音时，他便会忘掉一切，脑子里只有她的形象。她像所有日本女人那样温柔恭顺，但是她仍然违背了她父母的意旨而暗中与他会面。他常打扮成一个日本学生去跟她见面，以免警察出来干涉。因为一位日本姑娘同中国人在一起时，日本警察往往会出来干涉。

贵柱起初并未告诉木子他已经结过婚。几个月的美好时光过去后，他自己也把这件事忘却了。他体会到自己对她渐渐发生了爱慕之情，这是一种他对莲香所从来没有过的爱情。这时他才清楚地回忆起自己已经结过婚。他知道木子也爱他，因为他曾经考验过她。有时候，他穿上一身中国服装同她一起在公园里散步，遇上一个警察前来盘问贵柱是什么人时，姑娘便愤怒地对警察训斥一番。甚至一些过路人用不赞成的目光盯着她时，她也毫不在乎。

贵柱还采用其他方式考验过她。他带她去参加一些日本人的集会，在会上她总是饶有兴趣地倾听着人家的发言，而且对“危险思想”表示同意。她总是心甘情愿地、毫不犹豫地跟着他去参加集会，她倾心信服她所听到的一切，以致贵柱开始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们两人将如何生活的问题。他俩将一起回到中国去，那里正发生着革命——但那时他又想起了莲香，像奴仆那样侍候着他的双亲，并渴望得到他的庇护。

有一天下午，正好没有课，贵柱约请木子在公园里老地方见面。他原来想告诉她关于莲香的事，但他见到木子把脸蛋向他贴近时，几乎失去了这一决心。不过，他终于强迫自己把事情讲了出来。他讲完后，他俩相对默默地站立了很长

时间。然后，木子微微鞠了一躬，一言不发地转身走开了。

此后，几个星期过去了，双方再也没有巧遇过。他整宵失眠，徘徊于曾经相会的那些公园，他的小提琴再也听不到来自隔壁的回声，他的生活无聊得像贫瘠的沙漠一般。在他自己的祖国，革命时起时落，而他只是在他自己那个悲惨、无援、绝望的领域里度日如年地生活着。

厄运闯进来了，初看起来似乎是为他解决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像是有人已替他写好了生活的剧本。他父亲打电报要他回家，说他母亲病了。由于他一向没有个人意志，只得遵照父命了。

他一到家，他母亲在门口亲自相迎。从他母亲口中，他才得知莲香不仅生过病而且已经死了。她在四个月前就死了，她的坟墓上已长满了青草。他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而他父亲这次要他回家，主要是为了要安排他的第二次结婚——家里需要有一个儿媳妇来承担莲香所做的家务。对贵柱说来，震动是很大的，因为他回想起过去几个月中他同木子在花前月下相恋之际，正好是他妻子在他那严厉粗暴的父亲手下劳累致死之时。

但贵柱毕竟在东京学到了一些东西，那是他认真地、甚至痛苦地学到的一些新思想，尤其那些对他切身利益有关的新思想。他终于面对父亲脱口说出了一些一般中国儿子不敢对父亲讲的话。于是，悲惨的生活就把他包围了起来，在他面前的似乎是一个对旧道德认真负责的父亲。最后，他突然大声叫喊：“我决不会找另一个妻子替你干活干到死了！”

话刚出口，他父亲便重重地打了他一记耳光，还抓起一根手杖猛击他的头部。

贵柱恢复知觉时，泪流满面的慈母正弯着腰趴在他身

上。他躺了一个月，好不容易才恢复健康。能下床行走后，他正式请求父亲行行方便，准许他回到东京去上学。作为答复，他父亲从店里的货架上取出一个手帕包，打开那小包，并拿出一小叠信件给贵柱看。贵柱一眼看出信上是笔迹秀丽的日本字，便知道那些信是谁寄来的。所有的信都已拆开了，儿子知道他父亲曾找朋友来帮他念过这些信。贵柱伸出手来要取信，但他父亲竟转身把信扔进火盆，站在一旁瞧着它们化为灰烬。儿子脸色惨白地凝视着。然后，他父亲警告他说，他必须马上结婚，要不然再也不让他去学习，无论如何不许他回到东京去。

贵柱用一个月的时间制订了他的行动计划，最后动身去邻近的小镇。他去找了两个商人，他们是他父亲的朋友。这两人知道他小时候虽曾有过越轨行动，但还是一个诚实的小伙子。他说他父亲需要钱花，他是来取钱的，他们把钱给了他，他就在借条上签了字。那天晚上，他带着三百块中国光洋只身乘坐三等火车向东京进发。

他到达东京后，从李君那里得悉木子全家已突然搬走了，并未留下地址。她父母曾为女儿安排婚事，但由于她拒绝而引起了种种流言蜚语。有人告诉李君，她家已搬到他们的故乡八濑去了。

当天下午，贵柱乘火车赶到八濑，他找了木子好几天。失望地回到东京后，他又开始寻找，一直找了好几个星期。起初，他到警察局去查询，然后再到她以前上学的那个学校去打听。他从一个女学生那里找到了一点线索。那个女学生告诉他说，木子已经从李君那里听到他妻子死亡的消息。当她父亲强迫她结婚时，她曾给他写过信。可是，他竟不回信，最后她得病住进了医院。

贵柱找到了那所医院。一个护士告诉他说，木子确实在这医院里住过好几个星期，她得了精神分裂症。她一直大哭大闹，使得她父母和医生们感到震惊，但护士们却感到有趣，因为她常常呼叫他的名字，还夹杂着一般情侣之间在相互谈情时说的那些贴心话。她喊叫道：“哦，我的生命！哦，我的生命啊！”但这位护士却不知道她家现在搬到何处去了。她请求贵柱多呆一会儿，听她再讲下去，因为这里难得有这种说闲话的机会。可是贵柱却转过身子，怀着沮丧的心情离开了医院。

此后，贵柱又找了木子好几个星期。他抱着一线想找到她的希望走遍了大街小巷，密切注视着从他身旁走过的每一个姑娘。全城似乎联合起来在反对这个中国人试图找到他所爱的日本姑娘。他不时看到在远处有一个苗条的身影，微风吹拂着她那和服的长袖。他便赶紧往前跑去，到她身旁一看，又灰心失望地扭头走开了。

希望像泉水那样在他心中渐渐地干涸了。有一天，他走进一家酒馆去借酒浇愁。从那以后，他拼命喝酒，越喝越多。心中盲目地、绝望地充满着怨恨。怨恨自己，也怨恨别人。他经常喝得烂醉如泥，躺在马路边上，直至人力车和汽车驶过时他才醒过来。他经常处于醉得不省人事的境地，衣衫褴褛，邋邋不堪，又胡乱花钱。他不顾世界上男人的尊严，却从属于劣等社会中的一个青年。木子是他生活目标的一个象征，此刻已经消失了。

贵柱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醉鬼。当他清醒时，朋友们就跟他辩论。有些人为他那种无法克制的“爱情”感到羞耻，因为木子毕竟是一个日本姑娘，而当时，谁都知道日本人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另一些人则告诉他有关中国革命的命运和

反革命开始猖狂活动的情况。他们问道，革命者正在惨遭屠杀，终止个人的一切愚蠢行为，难道不是他的责任吗？去参加日本工人与学生所举行的群众大会以抗议白色恐怖，难道不也是他的责任吗？

贵柱静静地倾听着这些善良的忠告。他那糊涂的头脑中稍稍渗进了一点自豪感。那么多的朋友和同胞竟然都在关心他，他们都在议论着他啊！他以往的思想或行动是从来不受约束的，现在他应该严格控制自己的个人感情。有一天，李君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约他去城外一个湖上划船，在那里他们再次对他进行了一番忠言劝告。他突然站起身来，一言不发，纵身从船上跳落水中。一个朋友也随之跳入水中救他，但贵柱拼命挣脱，只想死去。后来，有人用船桨把他打晕，才将他救上岸来。

嗣后不久，日军入侵山东，轰炸济南府。听到这个消息，贵柱头脑清醒了，倾听着朋友们议论一次抗议大会的情况。贵柱头脑里充满着旧恨新仇，他憎恨夺去他的木子的日本人。现在，同样是这些日本人，竟狂轰滥炸一个中国城市。一种比他对木子的爱情更为强大的力量控制着他。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喝酒了。这好像是经过一场大病之后，突然开始康复了。

每次举行群众大会时，贵柱总是坐在群众中间。日本警察站立在会场周围，有的甚至站到讲台上。发言人一个接着一个地上台演讲：首先是中国人组成的各个集团的“大联盟”同胞，接着是那些具有“危险思想”的日本人，然后，一个朝鲜人出来讲话了。台上两名警察分别站在这位朝鲜人的左右，但是他照样讲话。他明知他自己以及其他发言者都会被警察盯梢，或许在街上被打晕过去，然后逮捕入狱。但他仍

然严肃地绷着脸对听众发言，像所有在场的人一样。

大会结束了，听众平静地离开了会场，这时警察却发动了攻击。在警棍无情的打击下，男男女女纷纷向四面八方逃窜，而有些受伤的人倒在街上流血不止。有两个朋友看见贵柱，他脸颊上有一道伤口，衣服被撕裂成一条条的，挣扎着想从人行道上站起身来。他们抓住了他的肩膀，象一袋谷物那样，弯着腰拖着他奔跑，一直跑到公园的大树底下，默默地照料他一长段时间，然后把他带进一家酒馆。

“他不是老在这里喝酒的吗？”店主问道。两个朋友点头表示同意，于是他们三人便忙着擦洗他脸上的血迹，使他慢慢恢复了知觉。

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劝他离开日本。一个学生劝说道：“同我一起回家吧。”“我宁可一辈子不学习，也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学习！”所以，贵柱同他的朋友一起离开了东京。他们被一个密切注意他们的日本特务所跟踪，一直跟到北京。

贵柱现在住在北京，他是一个脆弱、温顺、潦倒的青年，但仍然具有一点顽强不屈的男子汉气概。衣服就剩身上穿的那一套，没有袜子，就把内裤裤腿拉得长长的，拉到脚趾头处再折叠过来。他睡在一张用三块薄板钉成的床上，上面铺着一条破棉被。他的伙食是小米粥和咸菜。他生活在骇人听闻的贫困之中，而他的一些学友们也分享着同样的命运。他们简直不懂什么叫做娱乐，花车钱是一种奢侈。那些有“危险思想”的书籍或杂志在他们中间一一传阅着。这些思想并不是那种奢谈空想的惹人喜爱的新思潮，而是一种招惹风险的、坚强有力的精神必需品。他们大部分人都充分理解这些新思想意味着什么，也非常清楚，如果一旦被人发现，

他们将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贵柱经常同他的朋友们交谈。他们有许多人都是坚强而头脑清醒的，知道自己应该走的道路。但是，贵柱则不然。他弯腰坐着，把胳膊放在膝盖上，讲出了他的心里话。

他说道：“我有时失眠。我的前程如此狭小。我看不到有什么出路。我没有钱上学，也没有一技之长。成千上万训练有素又富有经验的人尚且找不到工作……当然，我能够得到父亲的帮助，只要我同意和那个他为我选择的姑娘结婚就行。可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服从他呢？我恨死那个所谓是我父亲的人……家庭都是我们的沉重负担，家庭要把我们所有的青年人拖进深渊。我知道有多少青年人就是这样被毁灭掉的。你或许会说我们命该如此，或者要我们反抗……。在我的家乡，青年人甚至还不知道怎样反抗呢！这不能怪我们——这是制度所决定的。”

有人愤怒地插话说：“那就帮助我们消灭这种制度好了！”

贵柱凝视着自己那双脆弱而又娇嫩的手，似乎在研究反抗的可能性。

他下意识地问道：“怎样做呢？反正我看不到什么出路……我的路走不通了。现在我的脑子不灵了……我的记忆力太差……。过去那些事情使我震惊，也把我逼疯了，而现在我看不到有任何出路。但我只知道一点，那就是我将永不结婚……。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某种途径来为中国工作。”

有人插嘴道：“为中国！为中国！你意味着哪个中国——是群众的中国还是统治者的中国？是人民还是人民的屠夫？你是一个没出息的知识分子——毫无用处，毫无希

望！我们的道路是很明确的——非常明确！因为只有一条道路。你知道这是什么道路——你知道我们不敢对你明说罢了。告诉我们你讲的其他道路是什么！你已经走过另一条道路了——你走进了你自己感情的沼泽地，为什么还要继续走下去呢？”

贵柱无精打彩地回答说：“是的，你是对的。你是一贯正确的。但是……”他的声音逐渐低下去了。他的朋友都回去工作了，留下他一人，让他去反省自己空虚的生活吧！

有时候在大街上，几个日本女人从贵柱的身旁走过。他常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们，似乎还在寻找着什么。一位朋友指着刚走过的一个日本姑娘对贵柱说：“她非常漂亮。”贵柱好象突然从一阵沉思中猛醒过来那样，回答说：“不！她并不漂亮——那是个死气沉沉的美人！她的和服也不美。你可知道，有时候日本姑娘穿着绿色的和服，里面露出红色的衣袖，领口上缝缀着一块小红布。微风吹拂着长袖，把袖子吹得象鸟的双翅那样在风中飞舞。”

烈士的遗孀

邓寅初在南京的监狱里坐等处决，回想着与妻子度过的那段不安的、折磨人的岁月。她来探过一次监，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他们一直夫妻不和，不过事到如今，为了能够同他谈上几分钟的话，她竟肯花一百元大洋买通典狱长。她告诉他，她筹集了三万块钱营救他出狱，已经用这笔钱买通了典狱长和法官们，设法让他获释。他很兴奋，期待着她的诺言变为现实。

邓寅初回想起自己以往对妻子华川不够体贴，感到有点内疚，但他这样做也是事出有因的。多年来，他与她斗争不休，革命使夫妻俩分道扬镳：妻子是遵父母之言包办娶来的，但他仍试图理智地去爱这个妻子，这种爱一直持续到他被捕的前一年——1925年。他们的三个孩子曾经使她对他比较亲近一点。但即使他曾经爱过她，他也从未理解过她。她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喝茶和麻将桌上，她讲究穿着，喜欢梳妆打扮。但这一切或许就算是妇人之道吧。

她也爱钱，但这也许不算是什么坏事，因为她自己对金钱万能一无所知。婚后的十年里，他把工资统统交给妻子。她却用自己的户名把这些钱存在上海的一家银行里，并通过一个代理人出借高利贷，几乎使她的钱翻了一番。她以赌徒般

本文原载《中国人民的命运》第237—253页。文中所提的孙传芳是一个地方军阀。

贪婪的目光盯着钱数的增多。现在 邓寅初原谅了自己的妻子 说这是解救他全家困境的唯一保障，他确信她会用这笔钱来救他的性命。

他回想起，当初为了引起她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他买了许多书籍杂志给她读，并满怀热情地想把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传授给她。可她却把这些书和杂志扔在贮藏室里的一个破木箱中，让它们白白在那里发霉。当他试探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时，她却向他绷起了脸。

“什么治理中国，要你操什么心？”她抱怨道。“你有一个很好的职务，挣钱也不少，如果你卷进了这些危险的阴谋中去的话，那只会给我和孩子们带来灾祸。”

他有些男朋友来家里看望他，起初她感到疑惑，后来她听到他们谈论的事，就是邓寅初曾经试图灌输给她的那些事，于是就对他们产生了敌意，终于一个接一个的下了逐客令。

邓寅初希望她既是自己的妻子，又成为自己的同志和朋友。他再三把他的朋友以及他们丰富的思想和秘密计划告诉华川，企图说服她。他的朋友们则比较谨慎，一再警告他不要把自己的事对她讲，然而他爱她，要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夫妻间的冲突逐渐激化。只有在她泪流满面时，他才软下来，他搂着她躺在床上，被她的抚爱所制服。这时他会答应，为了保护她，他要同那些会危害她的朋友们或会危害她的活动一刀两断。她暂时感到满意，他们的生活又平静了。事过之后，他又恢复原先的想法，又从事原先的计划。于是 家庭的冲突又重新暴发了。这种冲突再一次被他妻子躺在他怀里流泪而宣告结束 他再一次被她的躯体所制服了，又给她新的许诺。

有时他半夜醒来，这种折磨人的斗争总是困扰着他。他的朋友们是对的，他的妻子错了。然而他没有力量去贯彻自己的信仰。此刻，他不禁追忆起第一个征服他的那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他父亲的姨太太，是他父亲花了几千块钱买来的。就是这个比他差不多大十岁的长辈，就是这个姨太太，使他懂得了什么叫做“爱情”的全部奥秘。

那时他已经是十七岁的青年，四年里，他暗中对她唯命是从，就象一条等着主人命令的哈叭狗。他用猜忌的眼光看着她，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陷入不健康的情感和内疚之中，逐渐变得愁眉不展。后来他的父亲似乎觉察到了什么，突然送他出国留学。不久，他就得知这个姨太太生病神秘地死去了，然而她对他的影响却始终难以消除，他从每一个他遇见的女人身上搜索她的影子。在他迎娶了家里给他包办的妻子以后，他只不过把她看作是第一个女人的化身，聊以自慰。

邓寅初回想到，他夜里经常突地从床上坐起，两眼凝视着妻子熟睡中的朦胧的面孔，想从她身上找到某些与过去那个女人相似的地方，但却没有找到。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皮肤细腻、长着一双小眼睛的女人，面部呆板，缺乏魅力，像一个洋娃娃，她极力保持着某种矫揉造作的姿态。然而那第一位女人却是个身材修长而苗条的女人，当他紧紧地搂着她的时候，她那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中燃烧着欲火，她的身体就象是一株在微风中摇曳的修竹，使他的欲望在一瞬间得到满足。他记不起她曾经说过什么话，或许她什么也没有说，她给予他一个女人所能奉献的一切，这对他来讲既是开端，又是终结。从妻子身上，仍有一些可以使他回想起那个女人的东西。当他们拥抱在一起时，他忆起了那如烟如云的往事，徬

佛又回到了那个姨太太的怀中。由于这些往事的纷扰，多年来使他疏远过朋友，干扰了革命事业。

邓寅初回忆起离家出走的那天晚上，就是那个晚上，一种新的感情取代了他那些陈旧的记忆。那是1925年5月30日的傍晚，上海大屠杀的消息传遍了全中国，所有的工作都停了下来，到处都在谈论着罢工、抵制和战斗。那天晚上他回家很晚，希望看到自己妻子同他一样激动和坚定。当她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时，她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她时，她毫无表情地注视着他的脸。

“这些人总是干坏事，”她不耐烦地说道，“他们总是找麻烦！”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困惑不解地、吃惊地问道。

“这些工人和学生就得在上海趴下。他们没有责任心，你的朋友也是一样，总要把你往坏道上引。”

他无力地低垂着胳膊，一动不动地盯着她那副冷冰冰的脸孔。

“我怎么啦？！”她又施展出老一套，嘴唇颤抖着，眼里充满了泪水，把双手放到他的肩头，两臂紧紧地缠住他的脖子。但是他仍然一动不动地盯着她，仿佛她是一个陌生的女人。他坚定地慢慢推开了她的双臂，一句话也没有说，扭头离开了这个家。

从此，他就秘密地从事他的工作，在她面前一声也不吭。她的烦恼、怨恨、泪水都被用来发泄他对他的朋友们和这场拯救中国的运动的强烈不满。她在南京的茶馆酒楼中逢人就讲她的伤心事，这些流言蜚语传到邓寅初的朋友们的耳朵里，邓寅初只是轻描淡写地对他的朋友们说：“她不知道我们的事，我从未向她透露过。”然而，他们还是对她的多

嘴多舌表示担心。

后来，一个姓吴的急性子的人决定去警告她。一天他来到她家，直言不讳地说：“我听说你到处乱讲邓寅初的政治活动，我警告你，你这样做会直接危害他的生命，如果你的闲言碎语传到军阀们的耳朵里，你的丈夫就要被捕杀头。”

她气得脸色发青：“你们都是赤色分子，是你们使他发生生命危险，你们有什么权力强迫他干这些事，他可是我的丈夫哪！”

“我要严肃警告你，军阀的耳目到处都有，除了你以外，没有一个人抱怨他。”

“你是个坏蛋——马上给我滚蛋！”她嚷道。

华川又在南京市到处散布新的流言蜚语，说姓吴的赤色分子冒犯了她。吴某听到这一新的攻击后，怕大祸临头，悄悄卷起铺盖一走了之。当邓寅初声色俱厉地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时，她就冲着他大嚷大叫一番，然后从房中冲了出去。

邓寅初接着就被捕入狱，几个小时之内，即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由于对邓寅初的怨恨和不满，华川并未感到多大的悲伤。邓寅初的朋友们找她，请她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去探监，并向官方机关商谈行贿数目。起初，她把他们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们只得硬着头皮等她把话骂完。然后直接了当地苦苦劝说她，他们请她考虑，即使她说的都对，现在的问题仍是解救她的丈夫。这点只有她能做到，除她以外，朋友们没有一个能冒生命危险替他去进行交涉。

“那么这笔钱由谁付呢？”她愤愤地问道。

“我们拿！”他们向她保证。

一说到由他们出钱，她的一肚子火气开始消退，终于答应了。

经华川在南京进行多处活动，最后讲定了一个可使邓寅初从狱中获释的价目——三万块钱。对于邓寅初的穷朋友来说，这可是一笔巨大的数目。华川在上海银行里的存款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但她却守口如瓶。这些麻烦既然是邓寅初的朋友们找的，那么他们就应该拿出这笔钱！于是，金钱开始流入了她的口袋。首先，邓寅初的老父亲从四川电汇了一万五千块钱，并且打算到南京救他的儿子。邓寅初的朋友们从这里借一千，那里借五千，这样一点一点地凑着数。

最后，所有这些钱都流到了华川的手中。看着这些钱，她想，把这么多钱都交给当局太不应该了！华川感到自己大权在握，金钱就是权力，她开始同法官们和监狱看守们讨价还价，就像同店铺老板们讨价还价那样。

“三万块钱太多了，我们很穷……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我给你五千块……要不就给七千块。”

在那些日子里，随着他们的要挟，她一个钱一个钱地加着，她答应拿出一万块钱。当局两次宣布处死邓寅初，而又两次推迟执行，因为他们等着这笔钱呢。可是他们要三万元，一元也不能少。官儿们遭到了冒犯，她象是对待街上普通商人那样讨价还价，而并不把他们看做是执掌生杀大权的达官贵人，这可真是让他们丢了面子。

朋友们不辞辛劳地东奔西走，出入华川的家门，把他们凑齐的三万块钱都给了她。当华川看到这些在一周前还对她气指颐使的人，如今也有求于她时，她得意地笑了。

“如果寅初出狱，”她说，“你们能保证不再打扰他，今后不再把他拉到你们的叛国活动中去吗？”这些人用不安和愤怒的眼光看着她。

“好吧！我们答应，”他们回答说，“我们答应你的任何

条件——只要你出面付钱，使他获得自由。”

“钱，我是要付的，”她说，“如果我们再拖延一下，这些官僚们会少要点儿，我知道怎么去对付他们。”

总而言之，华川对当时的情景既关心又感到紧张，就象她在小说中读到过的一些情景一样。她常常把自己想象成小说中的一位女英雄，一个用纤丽的手执掌着帝国命运的极其美貌的女英雄。她想起从前有些诡计多端的妇女们创建家业，成了名声赫赫的大人物，消灭了她们的敌人。她又想起了一本较新的现代小说，讲的是一个叛国者被枪杀的事。这个叛国者被他的朋友们救出来时，朋友们发现他只中了一弹，而且还不是致命伤。他们使他苏醒过来，并养好了伤。华川幻想着自己也能作类似的事，她要诱惑那些官员们，这样就可以省下一万到一万五千块钱，她不能便宜了那些对邓寅初入狱负有责任的人。如果到头来她丈夫还得挨上一枪，她就用汽车送他到医院抢救，护理他恢复健康。

华川做着黄粱美梦。一天，她讨价还价毫无结果，就从监狱回到家里，喝着茶，她觉得应该采取新的策略。她跑到丝绸店买了许多新衣料，坐人力车到她的裁缝铺，要他们赶快为她做好旗袍。她要身穿新衣突然出现在那些官僚面前，使他们神魂颠倒。可是她刚从裁缝铺出来，一想到回家，就要碰到那些日夜在她家门口转来转去不辞劳苦地向她催问、解释和赌咒的人，心里就是烦。她的生活可真够受的，每天都要听他们唠叨。她的肩上担负着既要救出邓寅初，又要省下一半钱的重担！带着满肚烦恼，她坐车到一家水果店，拣了一篮上好的芒果，到一个朋友家去。在那里，一边吃着芒果，一边讲叙她的烦恼和难题，用以消磨这个令人厌烦的下午。

第二天早晨，华川没精打采地起来，又要去应付她的种种难处。然而，南京市盛传邓寅初今天要被枪决的消息。有人给华川送了一张便条，告诉她这个消息。可是她漫不经心地把它拿过来，耸耸肩膀，心想：“这是第三次威胁，他们只不过是从我这里榨出三万块钱罢了！”

不到一个小时，南京的街道上挤满了人，人流仍不断地从各个方向涌来。一些外国人与好奇的人群挤在一起。街头有一长队士兵齐步走来，身材高大但很虚弱的邓寅初反绑着双手走在士兵们中间。他没有戴帽子，消瘦而生动的脸膛显得苍白，但并无惧色。面对着成千上万个眼睁睁地看着他而不能解救他的人们，他喊道：

“我要被处死了！我是国民党员！我为革命而工作！打倒孙传芳！打倒一切压迫者！”

人们凝视着他，不断地有人发出一两声冷笑。士兵背后的人挤压过来，争着想看看一个人是怎样被处死的。在选定的刑场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围成了一个半圆形，人们怀着相同的好奇心，注视着这场古老封建的行刑仪式。看到士兵们排成一行，大家就等待开枪的时刻到来。人们都想挤到前一排看得更清楚一些。

邓寅初走到士兵前面的一块空地上，一个人孤零零站在行刑队的面前。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他昂着头对着中国尚未觉醒的大地高呼：

“打倒孙传芳！打倒压迫者！革命万岁……”

一排枪声使他的声音嘎然而止，他的身体颤动了一下，然后卷缩成一团，倒在地上，脸部贴在地面的尘土之中。又是一排枪响，子弹穿过了躯体。之后，一个军官大步走上前去，用脚把这具尸体踢得翻了个个儿，使他的脸冲上，然后

拔出手枪，对准尸体的嘴又开了一枪。

人群中有一人昏倒在地，人们闪开了一条缝隙让他倒下，然后麻木不仁地站在一旁盯着他，有人发出一点笑声。甚至没有人弯腰去摸他一下，有人用脚踢了踢他，看他是否已经死去。一小圈人凝视了他片刻，然后又转过身去看那个更有趣的场面……

士兵们齐步走开了，邓寅初的尸体被扔在那里等着喂狗。因为他是个革命者，所以禁止收他的尸。人群向前移动着，想多看看这具尸体。之后人们散开了，将这一情节说给他们的亲友们听。

最后，只有少数几个好奇的人仍未散去，那个昏倒的人依然躺在那里。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木呆呆地站在那儿，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最后，这个木呆呆的人终于清醒过来，准备离去，他的目光扫到了那个昏死的人身上。他气喘吁吁地跪下身子，扶起这个失去知觉的人，喊道：“老吴！老吴！”这个昏迷的人仍旧扑倒在地。那个木呆呆的人只好叫来一辆人力车，把这个失去知觉的人抱到车上，拉走了。

在人群中有几个垂头丧气往回走的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邓寅初的妻子华川。当她最后听到邓寅初被押往刑场的消息时，她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她脑子里想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个被枪毙的人被他的朋友们救走了，并在照料下恢复了健康，她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解救她的丈夫！可是当她赶到刑场时，她无法挤过密集的人群。她听到的不是一声枪响，而是一排枪声。紧接着又是一阵枪声，就象是整个军队在行动似的。最后是一声手枪声。有人扒在另一个人的肩头上说：“完了，这个家伙彻底完蛋了！”心惊胆战的华川坐着汽车回家去。司机向她要四角钱小费，她对他喊道：“你发昏

了？！”

司机伸着手坐在那里，她走了。

那天夜里，天下着大雨，许多湿淋淋的黑影子在夜幕中爬到了邓寅初躺着的地方。他们停下来，低语着，扛抬着什么，向前爬去。邓寅初的尸体被安放进一个长长的干燥的土坑里，然后用周围的泥土掩埋起来。第二天，报纸报道说，这个叛国者的尸体在夜里被偷走了，南京的野狗失去了到口的一顿美餐。

两天后，邓寅初的父亲到了南京，他住了一个星期。在他回去前，来到了华川的家里。他拿着包裹，面无血色，对华川说：“是你害了我的儿子！”

华川又开始哭了起来：“这不是我的过错！是老吴、老蔡和老王他们那一伙人害的。他们把寅初引上了邪路，我想办法救他……我象奴才一样奔波着！他们指责我是很容易的，我只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寡妇。我拖着三个孩子，真是有口难辩呀！如果寅初活着，他们一定不敢这样欺负我！”

老父亲等她停止咆哮后，又说：“是你害死了我的儿子！我寄来搭救他的一万五千块钱，你根本就不想花费。”

妇人的眼睛哭红了，她呜咽着：“我就知道你现在想把那笔钱拿回去，你要把它从寅初的孩子们手里夺走！”

这位老人转过身去，缓缓地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她的家。

只剩下华川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从前围着她家转来转去的邓寅初的那些朋友们似乎也消声匿迹了。她向前来安慰她的少数几个女友哭诉自己的不幸，说杀死她的丈夫的就是与邓寅初一伙的那帮赤色分子。她反复地念叨着他们的姓名。当她的指责传到他们耳中时，他们一个个地收拾行装离开了南

京。

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邓寅初被杀的详情渐渐被人们遗忘了。但是，他的名字——一个国民党烈士的名字却没有被遗忘。后来华川成了一个知名的烈士的遗孀、烈士子弟的母亲。

革命的浪潮滚滚向前，南方的军队占领了南京，老军阀下台了。1927年过去了，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削壁上撞了壁。当年老军阀盘踞的地方——南京，新军阀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政府。除了军阀、地主和他们的御用文人外，国民党进行了全面的清洗，邓寅初的许多朋友成了被猎捕的对象。

新军阀将邓寅初定为他们的烈士之一，发给他的遗孀和孩子们生活抚养费，并给了他的遗孀一大笔钱用来举行葬礼和修一座纪念碑。她抱怨说，抚养费太少，只够维持一般生活水平，他们又给她增加了一些，使她的孩子以后能够出国留学。

华川这个寡妇变成了一个革命家的真正的、忠实的妻子，就好象当年坚定地和丈夫站在一起的并协助他工作似的。她自己也时常“回忆”往日的秘密革命工作的考验。官员们拜访她，礼物和关怀象雪片似的涌来。他们要求她出面——“继承邓寅初未竟之业”，以便为现政府涂脂抹粉。

有了新的官职，这位烈士遗孀就不能负起教养邓家孩子的责任了。她写信给四川的邓寅初年迈的父亲，建议他带走并抚养他的孙儿们。因为她现在只是一个寡妇，要她靠自己菲薄的薪水是不可能养活自己和孩子们的。她在信中写道，孩子们毕竟是邓家骨肉。就这样，有一天邓家派人到南京把三个孩子带回了四川。

现在华川可以放手“继承邓寅初未竟之业”了。为这一

艰巨任务作准备，她去上海购买许多新式旗袍，大批外国香水、冷霜、香粉和口红。她烫了发，借助于这些，她就能忘却过去的一切烦恼与不快。

她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使得一位老官僚用赞赏的眼光盯着她。此人早先是湖南的一个大官僚，一个老国民党员。他叫傅广春，他十分有钱，这一点使得华川一想到他的名字心里就扑扑地乱跳。他是新军阀的心腹，在革命开始时，他是帮助“清洗”湖南的那些要员之一。当时报纸上报道，“他在自己的统治区内亲手清除那些赤色分子，毫不留情。”

华川假装正经地回报傅广春赞赏的目光。他娶过一位旧式的太太，并把她留在湖南——这是事实；他有十个孩子——这也是事实。但在那革命的岁月里，对一个官员来说，离婚是毫不费力的事。

没隔多久，傅广春的司机告诉傅公馆佣人一些消息，这个佣人告诉了他的另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又告诉了一个低级官员。他说，有时老板夜里去拜访华川，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离去。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正巧传到华川本人的耳朵里。一天，她去会见那位有权势有名望的傅广春。她经过走廊时，许多粉刷走廊的工人停下了手中的活儿。有人发出笑声。她愤愤地转身走了。那个月底，两个被她那双不幸的眼睛看准了的工人被工头解雇了，理由是他们的工作干得太糟，以致他们不得不另找职业。那个无辜的司机丢掉了饭碗，而那个佣人则流落街头。

后来在上海出了这样一件事。傅广春办公室下属的一个处长去上海度周末，看过晚场电影，到跳舞厅和歌妓院去转了转。这天晚上，当他回到饭店时，恰恰碰到这位年老的大

官和华川两人，那时他们正要进房间，听到脚步声，转过脸来，正好同他打了个照面，他惊讶得目瞪口呆。星期一回到了南京，他那位有权有势的上司把他叫到了办公室。这个老头子稍稍讲了一点他们的前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表示他非常欣赏年轻人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在新的革命政权下，这样的献身精神是不会没有报偿的。这个年轻人被提拔当了部里一个重要局的局长。只要继续忠于职守，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奖励。

这位年轻的官员感激涕零，对他的上司保证，他愿将生命奉献给革命和党，并在任何特殊的情况下为他的上司效劳。

接着，该部的会计开始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每月的支出就象流水一样。上海几家为该部供应物资的公司不断送来一叠叠帐单，有时候还送来一些假帐单。有两张要他付款的帐单上详细列明了物品名称，一张上有三块钱一条女用手帕，另一张写着带餐巾的桌布两块，一匹丝绸和一箱长统丝袜。

这个老会计官看到这些帐单很吃惊，这里一定有错！他要调查一下。几天后，这位会计又被叫到上司办公室里，并给他两张新的帐单。有手帕的那一张变成了给本部购买一打擦手毛巾，另外那一张成了杂货帐单。与此同时，傅广春站起来讲了几句话。他对手下有一个忠于职守审理本部帐单的会计表示满意。正如蒋介石在他最近的讲话中说的那样，在这年月的官场中，这种诚实是罕见的。此后，这位会计每月加薪四十元，如果以后对工作尽职，将进一步给予同样嘉奖！

这位会计对加薪表示感激，他说，尽管他的工作不是为了钱，并且认为为党工作而谋取金钱是可耻的。但饥荒、水灾和共产党仍在内地“抢掠”，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赚钱。

今后他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忘我地工作。

华川这个国民党精心选择的花朵之一，通过许多途径“继续从事邓寅初未竟之业”。她碰巧在街上与邓寅初的老朋友老吴走了个对脸儿，他就是那个在她散布致邓寅初于死地的流言蜚语时，向她发出警告的人，也正是那个当邓寅初遇害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人。他穿着一套极不体面的旧西服，头戴旧礼帽，他的上唇有一条横的伤疤，好象有人抽打过他的嘴巴。她衣着华丽，象是从上海艺术照片上走下来的，她停住脚步，冲他媚笑着。他却没有以笑容回报她，而是用嘲弄的口吻叫着她结婚前的名字，向她祝贺道：

“我听说你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了，孙华川。”

起初她很吃惊，继而不满地看着他。“我正在履行我的职责！”她回答道。

“就象从前那样吗？”他问。

华川的不满变成了愤怒：“我听说过你，你还象过去那样，是个赤色分子，现在还在干着反政府的勾当！”

老吴笑了。华川为了显示她的权势和消息灵通，愤怒地嚷道：“说实话，我已经在政府要处决的名单里看见过你的名字。”

“或许你可以帮助他们，孙华川，就象过去那样。”老吴回答道。说完之后，他轻蔑地从她身旁走过，拐进了一条小街。

那天晚上，华川哭了，傅广春不忍心看到他的小宝贝流眼泪，这都是因为她在街上遇见的那个姓吴的对她污辱的缘故。她告诉他，吴仲华是个赤色分子，他是那些使邓寅初被捕人中的一个，现在他竟敢在街上当众羞辱她！

老官僚十分愤怒。他要一天之内把这个人抓进警察

局。但是他的宝贝不能因为这个恶棍而哭坏了眼睛。她应该得到翡翠的耳环，她应得到赞美，她还应得到她所想要的一切。

眼泪不断地从她的脸上滚了下来：“只因为我是一个可怜的寡妇，孤苦零丁，人们才敢这样对待我。”她哽咽着，“如果邓寅初活着，他会保护我……。但是对于你，我只不过是供你玩弄的一个寡妇而已。你的老婆有你的名声和地位作保护，而我却什么也没有。”

傅广春不同意她的说法，他喜爱她。而他的妻子确实很老了，已是十个孩子的母亲。但他再娶一个年轻的妻子，面子上总不太好看。

“是啊！”她哭泣着，“我不过是一个烈士的遗孀，我的生命能够奉献给革命，难道就不配跟你结婚！”

这个老官僚试图用亲吻抹去她的眼泪，最后他躺在她的怀里，被她制服了，答应满足她的任何要求。

另一次，华川对他抱怨说：“人们到处散布咱们的流言蜚语，我知道该谁负责，就是那个文富安教授。他企图否认他是个赤色分子，但邓寅初私下告诉过我，他是赤色分子。这就是他一直在造谣生事，反对我们的原因所在！”

几天后，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诫文富安，他应该马上离开南京，否则就会被当作共产党给抓起来。文富安十分震惊。他声称，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他的朋友说，是不是共产党这无关紧要，值得考虑的倒是谣言的来源。当文富安听到傅广春的名字时，他回想起邓寅初死于老军阀手中的情景。老军阀只是几十个几十个地杀人，而新军阀却是成千上万地杀人。那天晚上，他乘夜车去了上海。

华川为革命而“受苦”的漫长的岁月终于熬到了头。傅

广春与他的老妻离了婚。他分给前妻和孩子们各一份财产。他给了华川一大笔钱和他在上海的一些房产。在他们结婚之前，他就办好了这些事，因为她在他的怀中哭泣着，她担心地表示，如果她没有自己名下的财产，他的孩子们总有一天会剥夺她继承他财产的权力。她不愿假设他先于她死去——她更愿死在他之前，但是万一他先去世了，还是有备无患的好。

他离婚之后就和华川举行了一次新式的结婚仪式。这个老头子骄傲地站在她的身旁，声称这个革命烈士的革命的寡妇是属于他的了。许多人谈论着这种新式婚礼的好处，说这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还说这种结合象征着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在这种婚姻中，”一个诗兴大发的致辞人喊道，“我们用爱情来主宰革命，对于中国的将来，还有什么能比这一点带来更多的希望呢？”

其中有个致辞人是这个老头子办公室里的一个年轻官员，他用傅广春的下属捐来的钱买了一份贵重的礼物，代表他的同事们讲述了老傅在仕宦生涯中廉洁奉公的事迹。许多客人眼里噙着泪，甚至这个老头子自己也哭了。

婚礼之后，华川满怀深情地对前来向她祝贺的朋友们说：“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为革命服务了！”

难 民

1938年1月8日前往汉口途中

头天晚上，我们在陇海线上的郑州转车。列车驶近郑州时，我们看到沿途各个站台上都张贴着许多标语。有条大标语上写着：“万众一心，夺取最后胜利。”这个地区同整个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一样，到处都是军队。看来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人身着军服。

郑州火车站站台上有许多难民。他们把全部家当都装在独轮车上——包括木叉和饭碗。男人寥寥无几，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在半暗不明的灯光下，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大多数人一动也不动。我看到两个男子就象塑象似的站在那儿，裹着褪了色的长棉被。看到他们，我想起了美国的印第安人。在那两个男子脚旁，在站台的各个角落里，到处都是裹着棉被蜷缩成一团的妇女和儿童。有许多人根本就没有被子。

我们和难民们攀谈起来。他们都是来自河北西部一个小镇的农民，八路军和游击队正在那里同围剿他们的日军作战。我们和一位既没有大衣、也没有被子的瘦小干枯的老太太进行了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交谈。她的干皱的皮肤像羊

本文原载《中国在反攻》（纽约先锋出版社1938年版）第279—284页。节选自史沫特莱1938年1月8日日记，记于华中汉口附近。

皮，说话声音嘶哑而刺耳。

“游击队正在豫西同日本人打仗吗？”

“对！”她回答道，声音就象冰冻的河水。

“那里的人遭大难了吧？”

“对，大难！”她表情冷漠，似乎再讲别的话都是多余的。

“您高寿？”

“七十二。”

“你是怎么从豫西来的？”

“走来的，从去年十一月。”

从她的言谈、声调，无表情的样子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不屈的人。七十二岁的她，是北方结冰的道路上一个流浪者，灾难夺走了她的一切，甚至包括言语。

我们在一个裹着被子的妇女面前停了下来。被子里面从这位妇女的怀中传出了一个婴儿的哭声。被子外面坐着一个冻得缩成一团的不到两岁的孩子。我弯下腰把她放在被子下面，拉拉被子给她盖好。这个小东西仰起脸冲我们笑了，就好象成人似的感激地笑着，这张脸十分可爱、稚嫩。她冻得说不出话来。

“今天，我们就喝了点热水，别的什么也没有吃，”一个女难民对我们说，“我们什么也没得吃，给我们点钱吧！”

我只有六块钱，凭我们的军事通行证是否能搭乘去汉口的快车，还未可知。假如要我们付钱的话，六块钱还不够，我就得向一个同伴借钱，他的钱比我多一点儿。所以我不能给她们钱。把六块钱给一百来人，如同杯水车薪，是无济于事的。所以，我就象个吝啬鬼一样，没有拿出这六块钱，只

是向他们解释了我为什么不能帮助他们。

在这样的日子里，在中国乘坐三等列车需要预先周密筹划一番。

“让我们研究一下战术，”我们一行中有个人说，“火车进站后，我们让王希夫踩在我们的肩上，从窗口把他推进去。然后把行李递给他。之后，你帮我从车窗爬进去，你从车厢末端的门口上车。”

火车来了，车窗比我们的头还要高，每节车厢的两头都挤满了争着上车的人。要加入到这伙争着上车的人群中去是会被挤伤的。所以，我们让男人们踩着我们的肩头，从车窗爬进去，最后，我等着从列车的尾门进入车厢。车厢里如同战场一般，里面的人数是座位数的三、四倍。过道里装满了人、包袱、大大小小的篮子、盒子、箱子等等。每走一步就象是翻过一座小山。行李的主人们也不在乎你踩它们。行李架上堆满了行李，有人躺在行李顶上。

一户大地主从人群中穿过，有当兵的给他们开道。这一家有五、六个女人和六到八个孩子。他们耀武扬威地从我们身边走过，那个地主派头就象是一位带着姬妾的土耳其苏丹一样。当兵的给他们拿着行李，行李中什么东西都有。行李架上的行李被扔到了过道上，他们放上了自己的家庭用具，被褥、衣物、篮子、包袱、箱子。三分之一的车厢过道也堆着这一家的小山似的行李。占满了所有可占的空间之后，这个地主吩咐当兵的把其他的行李放在乘客们乘坐的座位之间。连“抬一下脚”之类的话都没说一声，他们就把行李放到了我的脚上。至于我们该把脚放在什么地方，这是与他们毫不相关的。

我站起身来，提起堆在我脚上的行李，把它们猛掷到过

道上和这些大家闺秀的脚上。这家人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举动惊呆了。但是他们这一家就象是一场大雪崩遇到了一点小障碍。他们又把行李转移到别的乘客那里——那些人无可奈何地承受下来，就象他们面对泛滥的黄河，束手无策。

等到战争结束，这些贫苦的农民和士兵们打败了日本人，这个地主可能重返家园，收回他的土地，而且还要农民付他一半或是三分之二的地租。

在这狭窄的、直直的木椅上是不可能睡着的，车厢里的空气污浊难忍。于是我就观察着和听着别的乘客们谈话。在我们前面的高背椅后，几个士兵在谈天，有一个是下级军官。他们的话题是中国政府从汉口撤退到四川，怎样撤退，等等，等等。

我的警卫员评论道：“他们只是谈退却，他们太悲观了，为什么只谈撤退不谈前进呢？”

我听到我身后有人在轻声细语地谈话，我站起身来，回头看见一个父亲抱着一个婴儿在说话，这个孩子正在牙牙学语，这位父亲教他的第一句话是：

“打倒日本鬼子！”

这个孩子奶声奶气地重复道：“打倒日本鬼子！”

“打倒汉奸！”

“打倒汉奸！”——尖细的娃娃腔。

过道的尽头，是另一家的情景，这是粗野的一家。一位母亲不停地咒骂她的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整个车厢里都能听见她的骂声。她长着一张苍白冷酷的面孔。我看见她打了孩子三、四个耳光。因为打的太狠了，一个男人站起身来，穿过过道，走到那里护住了孩子。这个残忍的妈妈接着去打孩子的头部。这个陌生的男子用手臂护着孩子，她就打这个

男子的胳膊。孩子伤心地哭泣着。

我在中国从未见过这样残忍的母亲，这是头一位。中国的母亲们一般是非常慈祥的，甚至溺爱她们的孩子，所以我猜想这个女人要不是有精神病，就一定是个后娘。

在我们后面另一排座位中，一位中国妇女在向她周围的人宣讲基督教义。她用“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来恐吓人们——这场战争就是世界末日的信号。

当这番话没有奏效时，她就用死后进入炼狱*来吓唬大家。这些话似乎也未引起人们的兴趣。于是她告诉大家，外国人并不想要中国人成为基督徒，他们所作的一切是为了引导中国人了解基督教的真谛。这时，我看到一个男子微微一笑，打个哈欠，蜷缩在角落里睡着了。这位聪明的女人感到气氛不对，也就闭口不言了。

在宗教问题上，中国人是难以对付的。要想说服他们中的大多数，唯一可采取的方法是在洪水或灾难期间收留他们，并给他们饭吃，这些人才肯接受“唯一的真理”。那个女人企图用战争说教来制服他们，可是她没有给他们饭吃。到头来，有钱乘三等火车的人毕竟还没有走上绝路。

我们在当天午夜到达汉口，为了多赚几个钱，洋车夫拉着我们在街上转了两个半小时，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外国人不识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后，我们来到了当地的八路军办事处，这所房子位于已被中国人接管的日本租界里。我们走进了一间空荡荡的屋子，打开睡袋铺在地上，睡着了。

* 炼狱，天主教义中人死后暂时受苦的地方。——译注

中国的显贵们*

正如在古希腊那样，在中国，“家庭妇女”从不与别的男子交朋友。虽然女学生中许多人公开同男朋友蹓马路，但只有少数女学生敢当女演员。也正如在古希腊那样，在中国，没有一个读过书的男子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一涉入知识分子的王国，就认为干体力劳动对他们来说是丢脸的事。

站在妇女的立场上，我就人们对大家主妇的陈腐偏见、纳妾制度和名妓等问题向北京的显贵们挑战。有人断言中国名妓至少要比西方的娼妓好。我坚信这是因为西方人把卖淫看作是一件坏事，而在中国，男人们却可以为所欲为。但作为一个中国女子，谁胆敢有个情人的话，就会被她的丈夫和家庭所“抛弃”，而男人则永远不会遭此厄运。

他们讲，在老式的家庭制度中，一个男子纳妾是件“体面”的事。妾可以买卖或是赏给下属。我的一个诗人朋友曾经声称，纳妾是男人恋爱的唯一机会。“无稽之谈！”我反对道，“小老婆根本谈不上选择爱人——她是被买来的。”

这个诗人与家庭断绝了关系，就象其他许多男子一样，他拒绝同那个由家庭给他包办的女人结婚。尽管她已经作为这个家庭的儿媳妇，被抬进了家门。他自己却按照现代的作

本文原载，《中国的战歌》（纽约阿尔弗雷德A.诺夫出版社，1943年版）第50—57页。

* 史沫特莱在本文中所用“显贵”一词，并非指当时的军阀和官僚，而是指知识界某些生活优裕的上层分子。——译注

法，同一个女演员结了婚。他的家庭不承认这桩婚事，不准这个新媳妇踏进家门。他曾对我说过，他不会爱一个二十多岁的，不漂亮也不苗条，或者体重超过一百磅的女人。我经常和他一起去茶馆、饭馆或是老北京的戏园，我要他从我们周围的那些妇女中指出他认为漂亮的女子。

“你白挑了，那是个娃娃脸的女人。”我对他说。

他很遗憾我是个妇女，因而不能私下带我到他一个有地位的朋友的外室家中去参加晚会。他自己没有名妓作情妇，但他的眼睛却不断地瞟着他人的妻室。

有些时髦的男子同有文化的女子结婚，但是他们的家庭制度不久就吞噬了这些妻子们。她们很理智地退居于丈夫之下。丈夫在外面寻欢时，她仅仅是作为孩子的母亲。我见过一个这种处境的妻子，问她看些什么书，她回答说：“咳，你知道，我毕业十年了，毕业后很快就结了婚。”

极少数才智与丈夫不相上下的现代妇女意志坚强。她们是有抱负有毅力的妇女解放运动者。这样的女人，如果她的丈夫想讨姨太太或是偷偷地嫖女人，那他是要倒大霉的！每当我倾听这些妇女讲话时，我总是感到惊讶，为什么古老的缠足陋习居然没有摧残这些妇女的聪明才智，没有迫使她们顺从！

有一段时间，我是显贵们的同事；他们中有几个一直是我的好友。对他们来说，我不是一个男人，不是一个女人，不是妾也不是妓女，我是一个外国人，年纪不轻，也不漂亮，自己挣钱，同男人们平起平坐。当老婆和谈恋爱都不是我的专长。

大多数显贵是人道主义者。有些人受约翰·杜威*的

* 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 美国哲学家, 社会学家, 教育家, 实用主义者, 提倡“儿童中心主义”和“教育即生长”。——译注

影响，是实用主义者。也有许多人受伯特德·罗素* 的极端敏锐的社会分析和他那浅显易懂的无神论的影响。他们和我都同意他的观点，如果不畏惧死亡，那么就没有不朽的信念了。（然而他们反对罗素所写有关中国的一本书，因为它颂扬中国的邪恶并且使青年人变得傲慢起来。）

从他们的实用主义出发，这些显贵们趋向于怀疑任何没有被证实是可行的运动。他们欣赏美国的民主而责难苏联的共产主义。我反驳说，苏联把握历史的新航向并不比美国逊色，就象当年革命的美国为抗击欧洲侵略者而战斗那样。可是他们断言马克思主义仅在苏联得到了实践，而且还未被它自身所验证。许多中国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中国南方有些农民、工人正在为之奋斗，但这些显贵却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有人坚持认为中国不存在阶级，并认为这种观点仅仅出于马克思的杜撰。有一个人对我说，应该把一个省交给共产党，在那里进行实验，如果证明确实可行，其他省份可以仿效。他们说，科学和教育是进步之道，请看，科学在西方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争辩道，自然，共产主义也采用科学与教育的方法。

有位有趣的很有头脑的显贵是一名人类学家，他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发掘“中国的灾难”——黄河流域的中国古遗址上。楼宇、器皿艺术品、卜骨甚至子安贝壳（这是一种作为货币的，形如女性生殖器官的贝壳，或许是上古时代母系社会的遗物）一件件被发掘出来。我承认这是财富与珍宝，但

* 伯特兰德·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数理逻辑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是，什么是现实呢？在他们工作的地区内，遍布战争的疮痍、黄河泛滥和饥荒。成百万农民一次又一次地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为了糊口，他们把土地卖给了军阀、地主或官僚。甚至他们最基本的“财产”——原始的农具——也不得不拿到市场上换粮食吃。他们的儿子为了挣碗饭吃而源源涌入军队里，他们的妻子与儿童卖身为奴，他们的女儿沦为娼妓或是卖给别人作妾。由于饥饿所迫，他们砍光了地面上的树和灌木，把它当柴卖掉，换点吃的。雨季一到，由于没有植被，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中国的灾难”之河大肆泛滥，使田园荒芜。风灾接踵而至，大堆的土丘被狂风卷走，沙漠渐次逼近。中国有些城市，人们可以在象城墙一样高的沙丘上走路。我说，它们不久也会成为被埋葬掉的古城。

“何必现在发掘那些废城呢？”我问道，“五十年以后，环境会造成更多的废城，到那时去发掘它们吧！”

当然，那就意味着牵涉到政治问题；当然，政治是腐败与危险的。有人对我说，即使是那些进入政界的显贵们，也会被吞没掉。他们说，他们必须等待时局好转，但我对此深表怀疑，谁能经得起等待呢？

在北京，我参观了一个火柴厂，除了工头和几个操纵机器的男工以外，都是童工，是从农民那儿买来的儿童。他们站成一长排，有的几乎比婴儿大不了多少，一天站十二小时装火柴。他们装火柴的小手，动作起来象闪电一样敏捷。一个工头手拿短棍在过道里踱来踱去。

这些孩子们每天吃两顿加盐的小米粥，有时加点青菜，有时有点油腥。为了暖和点，他们挤在一张长炕上睡觉，这是一个和房间一样长的土台子，台子内有弯曲的烟道可稍稍加温。我询问一个躺在炕上盖着薄被的小孩，他已经病了三

天，没有一个人过问也没有任何治疗，死活随他去。

在中国，死神象个君主那样横行无忌，它经常在贫苦农民的茅舍前徘徊；它通过肺结核或是心脏病侵袭矿工们和产业工人们；它打扰着富人的美梦，那些富人用洋枪武装自己，抵抗来自农民暴动的威胁，就是这种暴动，从前曾推翻过一个又一个的王朝。住在港口城市中那些豪华住宅里的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的每个进步都感到恐怖，不管这种进步是作为统治者的国民党所取得的，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所取得的。

死神也紧紧向穷学生们逼近，但他们对它毫不畏惧，并认为只能采用社会革命的方式。所以我对这些显贵们说：

“你们的死亡哲学是假哲学！学生们不怕它，他们为什么要造反？他们为的是寻找一条让全世界人民都过上好日子道路。”

在社会发生蜕变的这些日子里，显贵们争论着，说学生们不守纪律和不负责任，学校和大学的礼堂只是用来做宣传的中心。究竟是否如此，我就无从得知了。的确，有的学生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革命者。这不正是因为他们无法学以致用所造成的结果吗？由于传统上鄙视体力劳动，他们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人。尽管这样，许多学习刻苦的学生也变得善于批判和尖刻了。他们向死亡和恫吓挑战，不管它们是来自无孔不入的密探，还是来自警察的棍棒。

有天晚上，一些显贵们请我吃晚饭，我才懂得为什么许多外国人喜欢北京，喜欢与中国人交朋友和研究他们的语言。我们动身去一家当时是款待上层人士们的饭馆。离开我住的那个古老的中国式的大杂院，我顺手拉上朱漆大门，此时，一个苦力恰好从我身后经过，我的皮大衣似乎引起了他的

对童年的一些回忆。他面对苍天，哼起了一段摇篮曲。唱词是一只毛皮凶相的老虎，却有一颗善良的心。他一直唱到拐角处，走向那满地白雪的冰冷世界。然后，无疑地，象整个好闲逛的北京平民一样，他挤入一伙人中，冲着那些小贩们或玩杂耍的发笑，冲着那个笨拙的舞蹈者或沿街卖艺的山东武术班子的表演发笑。

我和朋友们会齐了。当我们进入这家古老的中国饭馆时，跑堂们大声吆喝，声震屋梁：“来了八位！”

卖唱姑娘们凄婉地唱着，在刺耳的胡琴声伴奏下，显然是跑了调——调门稍稍低了点。唱的是小段京剧。唱戏声与酒客们的划拳声（猜拳输了的人每次要喝光他们杯中的酒）以及新客人到来时跑堂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这种嘈杂声音一定使得饭馆的老板心满意足，因为他始终笑着，点着头。

几个跑堂的把一个没有加盖的炭火盆抬进我们的屋子，另外的人端着许多盛有各种酒的杯子，其中有一杯是冷而无色的烈性白干。主人们品尝过这些酒之后就开始点菜了。一盅盅冷白干和热黄酒很快地端上桌来，同时还上了许多拼盘。之后，经理进来了，满脸堆笑，点着头，他的身后站着一排跑堂的，拿着准备要烤的北京鸭，就是我们进来时看见挂在杆子上的鸭子。主人就像是鉴赏家一样选了他认为最好的一只，让他们拿去烤。

然后，我们坐下喝着已经斟上的酒，吃着菜，斯文地放下筷子交谈着。一个矮胖的客人举起酒杯喊道：“干杯！”这句话提醒了他的一个不太精通英文，而又想在外国客人面前卖弄自己的朋友，他举起杯子一本正经地用不伦不类的英语说：“现在，让我们的杯子底儿朝天吧！”

好一阵儿，轰笑声才平息下来，东道主之一声称：“我

再重复一遍，中国不存在阶级。阶级，是马克思杜撰出来的！当我的车夫拉着我在街上走的时候，我就象对待一位老朋友那样与他谈笑。”

“如果你不得不拉着他在街上走时，你会是他的朋友吗？”我打断他的话，“如果他反抗呢？只有在他甘居低下时，你们才是朋友。”

“我也是无产者，我是自食其力者。”我的同桌得意地回答。

其中的一位东道主用筷子夹了许多炒鸡肝放到我的碟子里。后来成为我朋友的那位诗人，要了纸、笔、墨，开始为我起中国名字。我反对用梅、莲、香之类的名字。最后他给我起了一个中国姓——“徐”，和两个音节的名字——“美玲”，在遭到我的反对时，他仅仅把我史沫特莱这个名字拉丁化为“徐美娣里”。一点意思也没有，但因为有四个音节，他们称我是蒙古人。为我的命名叫了更多的酒，还做了一首描写海浪的即兴诗。我似乎得唱支歌来回报，一定要唱“拉里多之街”，因为这是一首我真正理解的歌曲，它被誉为古典艺术之作。

鸭子端上来了！首先，我们坐着欣赏了一番，每个人都相信这只鸭子是我们选中的那一只。主人们非难地摇着脑袋，说这是最差的。随着一阵谈笑声，我们放下筷子，然后所有的人一起来撕鸭子，将焦黄的皮和肉放在我们面前的薄饼上，然后放上嫩大葱，抹上甜酱，卷成卷，咬着吃。我们闭了一下眼睛作祷告，然后象乞丐一样，用感激的眼光看着主人，接着大嚼大咽起来。我们喝着，吃着，只是友善地就中国的妇女、显贵和无产者的问题辩论着。菜不断地上，酒杯总是斟得满满的。

最后，当我们起身离开时，一个跑堂的走到院子里高喊“送客”；当我们走进院子时，另一个跑堂的接着喊。我们就象是军队里的将军一样，从立正敬礼的士兵行列中通过。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面子”，也鼓励其他的客人更慷慨些。所带来的麻烦是，一个跑堂每喊一声的小费是两块钱而不是一角钱！

我们坐车穿过白雪满地的寒冷街道回家，我后面有人开始用假嗓子唱着一个犯人拒绝出狱的歌曲，因为他喜爱这个监狱。我发誓，我永远不愿离开北京，永远不愿！如果我在北京生活一辈子，我也会成为一个显贵。这个誓言使我的思想变得模糊起来。我的人力车夫在我前面象一匹疲劳不堪的马儿那样奔跑着，一阵阵咳嗽声打断了他那气喘吁吁的呼吸。突然间，他那宽大的肩膀不禁使我想起我父亲的肩膀，我是狗，我们全都是狗！

“你们听着！”我用毫无显贵气息的语调向我的主人们嚷道：“下车！把你们的车夫们拉回家去！让我们都下车，拉着我们的车夫回家去！让我们证明：中国不存在任何阶级！”

宋美龄与萧红*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来城里治疗背部旧疾，我在她的姐姐——孔夫人宋霭龄家中与她首次会晤。几位外国人士曾有意安排一次我与蒋夫人的会面，但我不愿接受在侍者如云的场合中的那种恩赐性的会见。一次她的侍从没有在场时我会见了她，我发现她很有教养，极其聪慧，具有一种魅力而又举止优雅。她很讲究仪表——似乎只有中国的富家女子才能做到这点——显得高雅而又华美，我想这一定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坐在她身旁，我感到有一点象瑟伯尔**笔下的忧郁者的样子，她的谈话语意清晰，完整，很自信。当岁月的流逝使得她的另一个姐姐、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日渐衰老和伤感时，蒋夫人的信心和能力却与日俱增。

住在香港的埃米莉·哈恩，刚刚完成了一部关于宋氏三姊妹的书，她们确实值得大书特书一番，但我与某些外国人士的观念相反：她们并不是中国仅有的女中之杰。同时，我总是认为把她们孤立于世的这种宣传是不适当的。我时常这

本文原载《中国的战歌》第523—524页。故事发生在1940—1941年的香港。

* 萧红和她的丈夫萧军(田军)从东北避难来到香港，他们后来成为鲁迅的亲密同志。他们两人都是有才干的作家。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萧军成了主要的小说家。他的《八月的乡村》是第一部被译成英文并在美国发行的现代中国小说(纽约：1942年，史密斯和德雷尔)。

** 瑟伯尔 (James Grover Thurber, 1894—1961), 美国作家及漫画家。
——译注

样想。如果宋氏家族出于微贱与贫困之中，象那些在战区尽责的中国人一样，那么这个家族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想到那些中国妇女们，她们作为医生、护士、政治组织者、教育家在军队中服役或是深入于人民之中，有的人尽管是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工作，她们的雄心和才干却逐年增长。同时我也想到了那些在斗争中失去了青春和在不起眼的岗位上献出了生命的中国妇女们。

一代新的中国女性正在战争中锤炼成长。她们在许多方面比美国女性要先进得多。我同这样一个妇女在霍尔主教*乡下的家中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她的名字叫萧红。她的经历是很典型的，1931年日本侵袭了东三省之后，她从家中逃走了。她的出逃不完全是由于日本人之故，也是由于她富有的双亲逼她接受为她包办的一门亲事。她恰恰赶在日本人进占之前逃离了魔掌，开始时住在北京，之后又相继到了上海、汉口和重庆。只有鲁迅先生第一个把她的处女作《生死场》推荐给中国公众，并称之为一个中国女作家所著的最杰出的现实小说之一。在这以后，这个女孩子出版了她的其它三本著作，其中有一本描写战争的小说是她住在我家中时完成的。象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一样，她的生活始终很贫困。象她这样的作家所挣的钱，只能使他们维持贫民阶层的生活水平。因此萧红象她的大多数同行一样，也得了结核病。我把她送进玛丽皇后医院住院治疗，并且在香港沦陷之前一直供给她所需的费用。她在日本占领这个岛屿几天之后就与世长辞了，享年只有二十八岁。

*霍尔主教就是罗纳德·欧·霍尔主教，他是一个思想开明的神职人员，史沫特莱在他的乡下（沙堤）的家中养了几个月的病。

日本人在中国得到了足够的教训，他们懂得了需要玩弄政治欺骗手段。因此他们在占领香港而感到狂喜的最初的那些日子过后不久，就开始施用这种手段。他们自命为把中国人从白人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的救世主。当萧红的丈夫申请将她的遗体火化，并把骨灰带回上海，葬在她的导师鲁迅墓旁时，日本人批准了这个申请。在英国统治政策对香港华人的影响逐渐减弱时，日本人在某些方面的手段却是如此“精明”，以至许多中国人选择定居在日本人统治下的香港而不是回国。

缫丝工人

1930年盛夏季节我刚抵达广州时，又一位将军被他的护兵刺杀了，这个刺客是与死者敌对的另一个将军用五十块现大洋收买的。这类事件开始使我感到吃惊，似乎是一种嘲弄。广东省政府是半独立性的政府，那些执掌生杀大权的将军们考虑的只是如何分享他们在南方所得到的利益。他们坐在防弹汽车里，脚踏板上站着全副武装的卫兵，满城里兜风。这就是那些将军们和依附于他们的官僚们的气派。

我与这些人都会过面，他们的话都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因为外国人绝少在这样炎热的季节到南方去，他们就用豪华的礼仪接待了我，还拨了一艘官船归我使用，并有一个政府官员充任向导带我参观工厂、新铺的柏油马路、新建的自来水厂和孙中山纪念堂。我通过几位中国大学教授，通过一位偶然结识的新闻记者(或编辑)，通过几位教师和作家，通过驻广州的德国领事以及我自己的耳闻目睹，了解了真实情况。

我在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到南方去，真正目的是要了解在丝绸工业迅速从美国市场转入日本大亨们手中时的成百万

本文原载《中国战歌》第86—92页，这篇故事还有一个更早的简写本，载《中国人民的命运》第116—119页。对于这一问题，当代的学术著作承认史沫特莱的观点是准确无误的（请看玛乔里·多普莱《广东农村的抗婚》一文，载玛格丽·沃尔夫和罗克森·威特克合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妇女》一书〔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67—88页）。

蚕农的景况。但我不愿作为势力强大的广州丝绸同业公会的客人去各地观光。因为这个同业公会毕竟象一个巨大的笑面弥勒佛，袒胸露腹，裤带已经快系不住他那肥硕的大肚子了。最后，我找到了一群正在从事丝绸工业研究的岭南教会大学的教授们。一位年轻的专家即将启程去顺德养蚕区进行六个星期的考察旅行。我同他一起到了广州丝绸同业公会，在那里他与一个满腹狐疑的公会官员争执了一番，最后才获准乘坐公会的内河汽艇进入那百万农民辛苦劳作的蚕区。在那里，南洋的百万富翁兴办了许多缫丝厂，缫丝工都是些年轻的妇女。

第二天，那位年轻的专家和我上了一艘内河汽艇，同行的其他旅客中只有二、三十名商人参加公会。这艘汽艇护以钢板并带有机枪，这是为了防止“土匪”袭击商人们。所谓“土匪”，我认为是指那些为了生存，每年都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里铤而走险的农民。

我曾经设想过，假如这些“土匪”袭击并占领了我们这艘汽艇，他们有把握搞到够全村人吃上几个月的食物。开饭时，商人们围着桌子大嚼，把鸡骨头扔了一地。他们谈论着丝绸、金钱、市场以及他们的商行赔了多少钱，丝绸工业确实为本行业的生存而斗争着，即使有损失，也很清楚，并不是由于这些“土匪”造成的。我倒有点想见一见这些杰西·詹姆斯。

我的年轻的同伴对这些人感到敬畏，但是他一谈到蚕农或是缫丝厂的女工，声音中就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一种轻视和敌意。他特别恨的似乎是那几千名缫丝女工，这点或许只有我能了解其中的奥秘。他告诉我，那些女工都是闹同性恋的女子，臭名扬遍全中国。她们拒绝结婚。而且假如她们的

家庭强迫她们的话，她们便以她们工资的一部分贿赂自己的丈夫，并劝说他们纳妾。象这样的绝大多数已婚妇女所想要做的只是生育一个儿子，然后返回工厂，从此拒绝同她的丈夫再生活在一起了。政府刚刚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妇女通过贿赂手段逃婚，但是她们不理睬这条法令。

“她们太富有了——这就是招惹麻烦的根源。”我的年轻的同伴解释道。“她们每月收入达十一块钱之多，所以她们变得十分傲慢。”他补充道，用这笔钱她们可以维持全家的生活，包括她们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祖父母。“她们大手大脚地花钱！”他嚷道，“我每次去电影院都几乎无一例外地碰见她们成群结伙地坐在那里看电影。”

直到1927年她们被禁止逃婚时，在缫丝厂中出现了共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他指责道，现在这些可鄙的女孩子们依靠着秘密组织——“姐妹会”的支持而逍遥法外。她们竟然敢为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而举行罢工。不时有两三个女孩子干出集体自杀的蠢事，这是由于她们的家庭强迫她们结婚的缘故。

在这几个星期中，我和我的同伴靠步行或乘坐小船遍游集市与村庄。骄阳当空，烘烤着我们，使我们的衣衫粘在身上，好象是外科医生粘腻的手套那样糊得不透气，我们的帽沿边和鞋里浸满的汗水都烤干了。晚上，我们在村里小店中借宿，或者在祠堂中搭起帆布床，床上支起蚊帐。路上和小巷里到处都可见到一排排赤膊的农民，他们弓着背，挑着大竹扁担，扁担两端悬挂着装满蚕茧的大箩筐。集市上充斥着蚕茧的臭烘烘的气味，一绞绞的生丝堆放在货栈的货架上。每个村子都有一大摞浅盘形的蚕床，由一个赤膊的、瘦削羸弱

的农民日夜照料着。

我起初感到好奇，继而觉得十分有趣，我问这些农民的生活和劳动情况，我的同伴就开始为我翻译。他们的家都是空荡荡的草棚子，脚下是泥土地，床上是铺着旧席子的木板，围着曾是白色，但如今已分辨不出是什么颜色的棉布蚊帐。多数还有一个粘土制的小火炉和一两件炊具，一条狭窄的长凳，有的还有一张古旧的、快要散架的桌子。对于几百万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家了！极少数人拥有几棵桑树——有树的就被认为是富户了，大多数人为了得到钱或食物，在收茧之前就得预先卖掉他们的蚕茧，假如蚕茧歉收的话，他们就成了欠债者。我们所到之处情景都是一样：蚕农总是被商人的债务所逼，永远也脱不了身。

只有当我们靠近大集市时——那里的缫丝厂喷发着臭气——我们才发现了一些较好的住房和营养稍好一点的脸膛，这类家庭的女儿都是缫丝工人。就是在那时，我开始懂得了产业主义对那些女工们是如何的刻薄，同其它地方如出一辙。这个地方是全国唯一的喜欢生女儿的地区，因为这里的女孩子是养家糊口的主力。她们的价值观念反映在她们能够独立承家这一点上。我开始明白了那种指责她们是同性恋者的原因。她们在家中尊贵的地位是那些已婚妇女的卑下的位置所不能相比的。她们的独立性对官僚们似乎是一种人性的嘲讽。

我的同伴对这些女孩子们所抱的敌意，在我们访问缫丝厂时表露得更为明显了。她们身穿有光泽的黑衣黑裤，一长排一长排地坐在装满蚕茧的沸水缸前，她们烫得半熟的手指在抽缫的生丝中闪动着。有时，她们队列中的谈论引起了整个作坊里哄堂大笑，我的同伴的脸上浮起了怒容。

“她们称我是资本家的走狗，而你是帝国主义洋鬼子，她们在取笑你的衣着和头发、眼睛。”他解释道。

一天晚上，我们两个坐在一个古老的祠堂门口，我们在这个石头砌成的空荡荡的祠堂里支起蚊帐、帆布床住宿。祠堂的另一边耸立着缫丝厂的高墙。不久，那边就涌出了身穿黑衣的女工们，每人手里都拿着锡饭盒。她们都穿着木屐，这是一种只用一根小皮条拦在脚趾上的凉鞋，走起来发出清脆的、咯噔咯噔的声音。她们黑亮的头发向后梳成一条垂至腰际的大辫子，颈后辫根处用红头绳扎住，缠绕成两到三英寸宽的一节——色彩鲜艳夺目。

她们排成长列走过横河道上的那座石拱桥。在路过祠堂门口时，我感到自己从未看过这样漂亮的妇女。

我尽力劝说我的同伴为我口译，但他拒绝了，说他听不懂她们的方言。他感到十分烦躁，因而站起身来向镇上走去。他走后，我步下台阶，一群女孩子围了上来，盯着我。我拿出些麦芽糖送给她们，她们露出闪亮的白牙，用清脆的断续的方言发出一阵阵惊叫。她们接过糖，开始咀嚼起来，然后打量着我的衣衫并且盯着我的头发和眼睛。我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她们，不久，我们彼此都大笑起来。

她们中有两个人用手臂挽住了我，把我拉到石板路上。其他的人在后面跟着，快活地喋喋不休地说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女孩子的家里，受到了她全家——父母和两个长着大眼睛的小弟弟——的欢迎。他们身后的小房间里已经挤满了其他的女孩子和好奇的邻居。房间正中的八仙桌上点着一支蜡烛，桌子四周的长凳上坐满了人。他们把我让到上首坐下，并献了茶。

接着，一场奇异的谈话开始了。即使我能够听懂大部分

纯正的中国官话，我也听不懂这些女孩子们的话，因为她们的声音和中国任何其他地区的语音都不相同。我曾间断地学过中文——在东北，在北京，在上海——但是每当我刚刚取得一点进展时，我又不得不搬往新的地区。而我原先学到的话语几乎都用不上了。上海有它自己的方言，我在那里所学的话，到了北京就出了笑话，而到南方就彻底用不上了。只有那些传教士们和领事馆的官员们花得起一年的时间入北京语言学校学习。但新闻记者到处奔走，却不具备这种条件。

因此，我同那些缫丝女工们用手势比划着交谈。她们指着那些小孩子问我有没有小孩。没有？难道还没有结婚？她们似乎感到惊奇而有趣。在解释中，我取下自来水笔，从兜里掏出笔记本，试着把我想的表达出来，我把她们仔细地扫视了一遍就开始写起来，这引起了很大的骚动。

站在离门不远处的一个男人用中国官话向我发问，我能够听懂他的意思。他告诉挤在屋里的人们说，我是一个记者，是美国人。是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我曾经当过工人。当他翻译了这些话时，她们看来似乎认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姑娘们挤在长凳上，其余的人站在她们背后。用我少得可怜的几句官话和手势，才得知她们中的一些人每月挣八或九块钱，极少数人能挣十一块，她们每日工作十小时——并非如我的同伴所说的八小时，她们曾经一天干过十四小时。

我会说的那点词用光了，我在本上划着粗糙的画来补充说明我的意思，她们是如何赢得十小时工作制的？我画了一张缫丝厂的草图，在它上面有一个大胖子站在那儿笑着，第二张图同它一样，只不过那个大胖子哭了，因为一长排女孩子手拉着手围着工厂站着。她们叽叽喳喳地把这些画议论了

个够，有个女孩子突然喊了两个字，她们全都明白了这是指“罢工”。她们挽起了胳膊，象是拒绝去工作，一些人抬起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低着头，好象是表示毫不动摇。她们大笑了，开始携起手来并且把我也拉到这个圈子里。我们都站起来拉着手排成紧密的一排，笑着。是的，她们就是这样争取得到十小时工作制的。

当我们站在那儿的时候，一个女孩子突然用高亢而甜美的声音唱了起来，她的声音停住后，全屋子的人用合唱来回答她，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她与她们一唱一答。当时，我站在那里，十分激动，我被这样一个事实弄得无所适从——因为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奇异的歌声结束了，她们开始要求我作点什么——她们要我唱支歌！我想到了《马赛曲》，唱了它。她们叫着还要我唱，我又试探着唱了《国际歌》，并仔细地观察着任何微细的反应，但她们一点儿也没听出来我唱的是什么。所以我想，说这些女孩子中有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这不是真实情况。

屋子里掠过一阵轻微的骚动，我看见门口站着 一个男子，手中拿着一根长笛，他把它放至唇边，轻柔地吹奏起来。接着，笛声逐渐高昂，那个嗓音高亢而甜美的姑娘随着笛声唱起来。她的声音中止了，笛声更加激昂，一个男子的声音加入其中，他在唱着什么掌故！他的歌声停下后，那个姑娘的声音复起，来回答他。他们唱的一定是些民谣，是这些人民中流传的古老的歌曲，它带有民歌的普遍特色。

就是这样，我与那些语言不通的人们度过了一个晚上。我返回住宿的祠堂时，很多人送我，有个人提着一个很大的马灯为我引路。我穿过寂静的石板铺就的院子，进屋上了

床。这一整夜，更夫敲着铜锣报着时辰，他的锣声由远而来，经过我们的墙外，又渐渐远去，如此周而复始，同时还高喊着“平安无事”。

我躺在床上，浮想联翩。我想起那些古老的事，想起那些普通的人们，想起全世界普通人民的美德和团结……。

青年与妇女委员会

一天下午和晚上，青年与妇女委员会召集了一次有关妇女问题的会议，某省许多地区的代表到了会。我是会议的主要演讲者。由于我是一个外国人，大家希望我能以国际妇女运动为题作一个内容广博的报告。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困难的一次演讲。对于这一题目，我手中只有一些零散的资料。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我知道，我向中国内地妇女们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她们要向外国妇女学习的东西。房间里挤满了妇女，其中有许多孕妇。她们中大多数受过教育，也有一些是农民和工人。她们用标语布置会场，标语上写着这样的口号：“中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与世界妇女们联合起来！”甚至有一张标语友好地称我为“中国伤员的母亲”。

一群战争孤儿，身穿小号的军装，特地从山上采集了野花献给我，并向美国儿童们致以情意深长的、简短的祝词，以表明中国儿童坚持战斗直至中国解放的决心。纺织厂和从事纺织工作的女难民送给我两双白纱袜，青年委员会的妇女们写了一首欢迎诗，诗中讲到妇女们被男人们践踏压迫了几千年，她们期待着解放的曙光。

从这些妇女身上，我再次了解到中国妇女在可怕的境况中艰辛劳动的状况。许多人表示，中国革命不胜利，她们永不结婚。因为家庭生活给予已婚妇女的沉重负担，使她们难得

本文原载《中国的战歌》第353—354页。故事发生在1939年的华中地区。

参加社会活动。这听来真是件新鲜事儿，因为“女大当嫁”对每一个中国女孩子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假如她们拒绝结婚，那末家庭给予她们的压力会使得她们的生活十分不幸。年过二十五岁的女孩子就被认为是“老了”，超过这个年龄几乎没有人认为她们还有缔结良缘的机会。

她们告诉我妇女群众仍是文盲，未受过教育，缺乏思想修养，并且仍为封建习俗所束缚。在安徽的一些村子里还存在着“婴儿塘”，那些“不受欢迎”的女婴在呱呱坠地时就被溺死在塘里。女孩子们在很小年纪就订了婚，送到婆家养大成人，然后结婚。婆婆们残酷虐待童养媳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以致于妇女委员会不得不拯救这些小女孩，甚或将她们留在委员会机关里。

妇女委员会书记朱青霞女士是个二十多岁的有文化的已婚妇女，有一次对我说：

“在大别山区，有一些苏区的妇女曾经放了脚，剪了短发，进了识字班并参加了社会活动。但是现在她们又留了长发，因为剪短发的妇女被国民党军队称作共产党而惨遭杀害。当我们作为组织者第一次到那儿去时，我们建议妇女们剪短发并参加抗日组织。他们就唯恐白色恐怖再次降临。

“令人惊讶的是，绝大多数中国苏区女干部不识字，但她们能够理解所有关于资本主义的问题和国际事件，并且在会议上讲得头头是道。当我们使她们确信参加社会活动不会被杀害时，她们和村里的男人们就不需要我们的任何帮助，便能妥善处理本地区抗日联合会的工作。

“我们教育妇女时，发现妇女工作很不好做。我们的爱好、习惯、文化水平与这些农村妇女相去甚远，以至于很难找到与她们相互沟通的渠道。因此，我们带了一些农村妇女

到这里来进行训练。

“还有另一个奇特的问题。苏维埃政府禁止强迫婚姻，男女通过自由选择对象即被允许成婚，并且哪一方都不要彩礼。国民党称之为‘自由恋爱’，但是现在苏维埃政府不再存在了，有些男子便重新要那些依照古老习俗在童年时与他们定亲的女子结婚。这些妇女有时从自己的家中被强行抢走。她们的丈夫或许是那些在民主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或许正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战斗。但是，童年的婚约被看做是法律契约，因此，我们的妇女委员会在强迫那些男人们把他们劫去的妇女送回家时总是遇到许多困难。”

女 雇 农

红军终于沿着环山的小径迂回到了宁冈，鲜红的军旗迎风招展，宁冈人民倾乡欢迎红军，就连小店主和小商人们也无例外地置身于欢迎的人海之中。

就在那一天，宁冈召开了群众大会，远近许多村子里的工人和农民都来参加了这个大会。出席这个集会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赶集和乡间剧团演出的时候，真是盛况空前。这次会议是井冈山地区一带群众革命运动的起点。

从到会的男人和妇女中，选举产生了各种委员会，以便建立各种协会和群众团体：农会、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以后几天，又由这些新协会中选出代表担任管理该区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后来改成苏维埃政府。

在宁冈地区有成千上万的未曾缠足的女雇农，她们给地主扛活，每年挣得一些稻谷和四、五块银圆。她们之中有些是奴隶，是被买来在地里干活或替富人家当丫头的。

农民协会成立时，女雇农们纷纷入会，人数占压倒优势，组织赤卫队时，有些女雇农抢前一步说道：

“瞧我们这双大脚！从来没有缠过！我们走路、干活，

本文原载《中国红军在前进》（纽约先锋出版社，1934年出版）第54—58页。此文讲的是1928年华南江西省的事。毛泽东和朱德在该省创建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政权。蒋介石后来摧毁了这个苏区，从而发生了1934至1935年著名的长征。

哪一点都不比男人差！我们壮得跟男子汉一样！发给我们枪吧！”

因此，宁冈的赤卫队就是一支由武装的男人和妇女组成的混合队伍，他们的胳膊上佩带着红色的袖章。

在镇上，大约有两百多名妇女，她们是编织袜子和内衣的针织工人，她们用老板们的最原始的针织机干活。那里还有许多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妇女。这些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长达十五到十六小时，而且他们中有些在店堂里工作，一旦老板吩咐，就得象个奴仆似地干各种活计。许多妇女同时还要照料自己的家庭，纺线、织布、做鞋、打草鞋和织席子，有的还要干地里的活儿。

当这些妇女看到那些女雇农组织起来时，她们也要求得到加入农民协会的权利。因为，在她们看来，农民协会是一个妇女的联合会。红军进驻宁冈还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三千名妇女坚持要获得这种权力。但后来实际上为她们组织了一个一般的妇女协会，她们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改变女工的工作环境，把她们自己从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另一个新的思想席卷了宁冈。共产党——它是群众组织的领导者和红军的指挥者——提出了这样一条口号，要求没收地主、宗法祠堂所霸占的一切土地，并把它们平分给穷苦的农民。

这条口号受到了农民们的热烈拥护，他们立刻开始了土地的没收和分配工作，这些女雇农带头干了起来。

但是，当没收土地和分田的问题提交农会正式讨论时，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阶级斗争开始出现了。因为在这些农会中，不仅有贫农和中农，也有富农。这些富农花钱雇工，有时也把土地租给佃户耕种。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有文化，而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主持开群众会议或担任了农会的领导。在公开选举时，他们互相推荐当农会的委员。在开始的那段时间里，贫农、雇农和那些苦工们都耷拉着眼皮说：

“好吧！当他们的委员去吧！咱又穷又笨，也不会讲话，也认不得那些字码子！”

不久，当分田的问题提出后，富农挺着他们的胸脯说：

“革命就是为了平等，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分到同样多的土地。”

现在，这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不管他是老人还是婴儿，都应分给同样多的土地。

贫农和雇农们不断听到富农口中的辛辣的评论：

“哎哟，聪明的鸟儿搭窝会找树嘛！”

贫农的家庭人口少，他们的大多数孩子都因缺衣少食，在乳儿期就夭折了。能活下来的有限，而活下来的男孩子们也都离家流浪到城镇和沿海城市去寻找一个卖苦力的活计，有的甚至进入部队给军阀们当炮灰。而女孩子们则卖给人当了丫环。这些贫农家中一般只有两、三口人，最多不过四口人。但是富农家里却人丁兴旺，因为人越富，他们的子女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多，而更可肯定的是，他们的兄弟和儿子们也不会流入城市中作苦工，或者出去当雇工，象牛马和机器一样，在别人的田中干活。

贫农至今与富农还不平等。这条分田的口号是如此地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火，以致使他们象陶醉了一样。但不管怎样，田是分了的，这总比他们过去做奴隶要好得多，假如他们分到五亩田，这似乎就不少了。

实际上，使他们感到辛酸的是：富农们拥有二十、三十，甚至五十亩土地，富农们事实上是些小地主，而且唯一

的事实是，他们钻进了农会，使自己免遭地主的命运。他们狡猾地左右逢源，借革命之风驶船。宁冈周围的地主的土地都被没收了，而且按每家有几张嘴的数目分掉了。贫农和雇农仅分到一点点，或是分得了五亩好田，或是分到六、七亩中等的田。但是，富农不仅保住了他们原来所有的土地，并且还多得了一些。

在分田后，贫农们叫苦连天，因为那些富农照旧雇工，他们照旧拥有牲畜和劳动工具，而且不许别人使用，说是他们自己要用。在一些贫农的思想中，泛起了仇恨的波澜。有的人劝说，这是老天爷赐予的，一个人要知足。同时，在农会中的富农甚至也这样表示，他们自己给了贫农土地。群众的问题是如此之多，红军的任务是如此艰巨，共产党的担子是如此沉重，在土地革命早期的这些日子里，分配土地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红军在宁冈一直驻扎到四月中旬。冒着霏霏的春雨，他们突袭了远处的集市，驱散了白军，缴获了弹药，并从富商那里没收了稻谷。政治部在土豪家里张贴了告示，写道：

“××镇的父老乡亲们！自即日起，中国革命的先驱——中国工农红军，从欺压掠夺穷百姓的大土豪家里没收了如下物品：稻谷五百担；盐一百担；火腿三十五只；现大洋五千块；白布二十四匹；带电池的手电筒一百五十支；生产子

* 1928年湘赣边区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这是一种错误，后来改“没收一切土地”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农村中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故事实上在红色根据地长期都是按人口平分土地为原则。史沫特莱本文所反映的是土改早期的群众情绪。——校者注

弹的机械；药品三十六箱。红军不拿工农群众和小商贩们的一针一线！署名：红军政治部，1928年4月12日。”

那是四月里的第二个星期，从北方来的交通员带来了一条消息：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向此靠拢，并将与朱德部会师于井冈山麓。

军号声响彻了整个城镇，余孔生气勃勃地吹响了他的军号，几乎震得树上的叶子都在微微地颤动着。红军留下了一个连队增援宁冈的赤卫队之后，主力开始向井冈山进军。他们看上去军容整肃，战士们的衣服被宁冈缝纫组的妇女和姑娘们浆洗缝补得干干净净，他们的脚上穿着新草鞋。红旗在他们身边飞舞，部队沿着山腰的小道阔步前进，越过山顶，向井冈山的主峰挺进。

妇女参加抗战

我第一次会见年迈的蔡妈妈时，她已是河谷地带涌现出来的妇女领袖了。对于一位中国江南的妇女来说，她的身材是异乎寻常的高大。她的皮肤黝黑，苍老的手背上青筋暴起，象是隆突的山脊一般。她瘦削而又结实，说话时声音坚定，稍稍有些沙哑。她的略显花白的长发，从高高的额头向后梳理着，在颈后盘成一个发髻。作为一个农妇和许多孩子的母亲，她的一生饱尝艰辛，但她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一切。她的白布大褂的钮扣一直扣到颈间，深色的棉布裤子看上去总象是刚刚浆洗过的。虽然这些人从来没有一个熨过他们的衣服，但她的衣服必定是用什么方法在重物之下压平的。她是坚强与庄严的化身。

很难相信她有六十八岁了，因为看上去她似乎要年轻得多。她告诉我，她是一个拖着四个孩子的寡妇。她的三个儿子中，两个年长的都在新四军里。那个年幼的十五岁男孩帮助她和她的儿媳们在田中耕作。

抗战爆发之前，农村的生活是单调和乏味的。但当新四军去年进驻这一河谷地带后，整个外部世界仿佛被他们带了进来。许多女学生加入了军队的政治部，当她们去敲响村妇

本文原载《中国的战歌》第270—272页，故事取材于1938年后期史沫特莱在华南游击队中亲身的经历。最初以《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为题刊登于美国《时髦》杂志1942年4月15日号（第48、49、87页）。

们的家门时，旧的世界在这个声音中崩溃了。大户人家的闺秀们拒绝接待她们，她们让家里的男人替他们应付，并且认定这些女孩子是妓女之流。但当这些女孩子敲蔡妈妈的门时，她从她们的眼睛中看出她们绝非坏人。她邀请她们进屋，把一碗碗的茶端到她们面前，并且叫自己的儿媳们和邻家的妇女们来和她们坐在一起。这个河谷地带的妇救会就是这样诞生的。它逐渐成长壮大，成员已超过了一百人。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蔡妈妈瘦高的身影出现在一个村子通向另一个村子的乡间小路上，她鼓动妇女们参加识字班，参加讨论组，去了解战争的情况和她们能出哪些力。在结束一天的劳动之后，可以看到妇女们坐在门口台阶上做针线活儿。我问她们在做什么，她们回答说：“做军鞋。”

越来越多的妇女去地里干那些先前是男人们干的活儿。年轻些的男人参了军，而年老的男子和男孩子们帮助干些农活或是给战场搬送物资和抬回伤员。每逢节日，妇救会成员们都要带着礼物和食品去慰问伤员，并给这些战士们唱歌或是与他们交谈。在病房里，总是由蔡妈妈发言，她对伤员们说，他们都是她和妇救会的儿子。她每次讲话都向伤员们宣传妇女的权力，并鼓动他们劝导自家的女人参加妇救会。一些人以前从未听过这样的谈话，他们充满敬意地听她说。对于这类事情，各处的中国男人似乎比西方的男人更文明、更宽容，而且只有极少数人反对新的运动。

在军队中的女干部来给她们授课以后，这些妇女变得更有信心了。其中有一课涉及日本的密探和他们在战区搞破坏的方法，并且鼓动妇女们作“军队的耳目”，去反对投降主义，提高警惕监视密探和汉奸，并抵制日货。一个警句“保卫我们军队的后方”便概括了所有这些活动。从那以后，每

当家里的男人们摆学问的时候，她们再也不只是坐在那儿光用耳朵听了，她们也加入谈话之中，去宣传几乎世界上的每一件事。她们出去参加群众大会，而且盘问路过她们村子的每一个陌生人，盘问他的家庭情况，甚至查问他家祖宗十代。

有时候有个把男人出来反对这些“新式妇女们”。有这么一个例子，一个姓张的商人说，妇女们这样干，把男人留在家中忙得人困马乏。他说，蔡妈妈是其中最坏的一个，满脑子都是坏主意。自从蔡妈妈查获他收买所有蜡树上生长的小白豆以后，他变得更加讨厌她了。人们用这种小蜡豆做蜡烛，但这个姓张的却大量囤积并拿到芜湖去卖掉。此时，芜湖市被日本人占领，不久妇女们要弄清楚为什么有人要做这种买卖。她们追问，那个姓张的商人怎么能够通过日本人的防线？为什么月月进出能够通行无阻？他为什么要囤积河谷地区的小蜡豆而且突然找到了这样大的一个市场？或许是日本人用它们来榨油？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人尊敬这个姓张的。因为人人都知道他插手这个河谷新开的一家鸦片窝，这里是这个地区地痞们的老窝，甚至有些良家男人也在那儿鬼混。

有一天，蔡妈妈闯进他的店铺，并追问他。商人用极度蔑视的口吻问她，她是否想他的小蜡豆。这不仅是一种轻视，而且是挖苦这个老太太的穷苦和整个河谷每一个庄户人家的穷苦。这个姓张的不久就知道藐视人民的意愿所意味的是什麼。没有一个人与他做任何买卖，当他在街上行走时，人们把脸转向别处。一次一个男孩在他后面丢石头，大声喊：“汉奸！”有一天，他经过一处农舍，他明白无误地听到有人正在放狗咬他。

终于，姓张的商人怒气冲冲地去找地区政府的官员，这个

官员招请蔡妈妈来友好地谈谈。老太太去了，但不是一个人去的，所有妇救会的正式成员送她到了官员的门口。她的儿子、儿媳和几个与此事有关的人也陪她径直地进了官员的房间。其他村民跟在后面，看上去就好象是倾村出动了，他们等候在这个官员处所的外边。这个官员本身不是个坏人，事实上，他是个爱国而思想开明的人。但当他看到人群的时候，他比平时更加思想开明了，他请蔡妈妈解释一下她和姓张的商人的谈话，她对他谈了那个商人与芜湖的生意，说到了那个鸦片窝和赌窝。她指出，鸦片烟是从本省西边较远的一支中国地方部队的某些腐败的军官手中弄来的。在这一河谷地区，原先根本没有吸鸦片的私窝！妇救会要求一定要封闭它。

这个官员承认吸鸦片和赌博是罪恶的，但是他说：一道有关吸鸦片的新法不久可望公布，现在还没有一条可以取缔它的法律。他还力劝妇女去同那些吸鸦片的男人辩论时要“有善心”。蔡妈妈回答：“我们妇女是用善心同他们争辩的，但男人们不听，他们让我们滚回厨房去，少管男人的事！”

蔡妈妈用这样两句话结束了这次会见，她向这个惊愕不已的官员宣布：“我们妇女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绝不允许富人们藐视人民的意愿！”

这个官员对那个姓张的商人也是束手无策，因为没有掌握他与日本人做买卖的证据。而他回答说，人们在芜湖街上见到过我，这不假，但我象其他人一样——可以溜过日本人的防线。没有一条法律禁止这样做呀。

三月八日，事件发展到紧要关头。这一天是国际妇女节，整个中国总是要庆祝一番。河谷地区的人们匆忙地为群众大会作准备，会议在一个古老祠堂的大院中召开。男领导人

被邀请参加，并致了简短的祝词。因为这是妇女们的节日，在大院里所有的前排位置都是留给妇女的。战士们、军官们和文职官员们应邀前来开会，他们被请到后排就坐。一大批招贴画上印着许多国家的女科学家、女作家、女革命领导人的名字和面容，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她们中有许多人要求妇女们“发扬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的精神。”

这天早上，蔡妈妈领导妇救会的全体妇女去部队医院给伤员们送礼物。在去病房前，她们来看我，并送我十个鸡蛋和一只鸡。蔡妈妈直率地坐下，并要求我转告西方国家的妇女们，中国妇女是怎样为了解放自己而进行斗争的。她说：“你的崇高的妇女精神，表现在你与我们同甘共苦这一点上。”她的称颂深深地感动了我。

我同她们一起到病房去，我见她们带着大竹篮子，里面装满了鸡蛋、蒸饼和一扇猪肉。她们的丈夫们自豪地把礼物抬到走廊里，让战士们欣赏和惊叹一番。这些事情结束后，妇女们集合在一起唱起了“慰问伤员之歌”，并称这些战士是“崇高的人”，他们“为百万妇女和儿童而忍受伤病的折磨”。

这是一个美好而动人的场面。在它结束以后，我与蔡妈妈和她的同伴们谈天。她们很想知道她们还能伤员们做些什么，我建议她们做些枕头和枕套，并在每一个枕套上绣上“民族英雄”或“夺取最后胜利”这样一些口号。她们热烈地接受了这个办法，同时，我捐赠一些钱买棉布和丝线，去

* 南丁格尔（1820—1910），英国人，近代护理学创始人。1854—1856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率领38名护士赴前线参加护理伤病员工作，使伤病员死亡率迅速下降。1860年在伦敦创办第一所护士学校。——译注

开展这个活动，并请她们一定不要谢我，这也是我的战斗，同她们是一样的。那天下午的群众大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蔡妈妈开始有点怯场，但终于战胜了畏惧心理，滔滔不绝地讲着妇女的权力和她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任务。在结束讲话之前，她宣布，她的妇救会准备根除河谷中的一切罪孽，包括赌博、鸦片和二流子。在结束时，她透露了刚接到的一条消息，她的一个亲生儿子在前线负了伤。作为一个在这样伟大的事业里负伤的战士的母亲，这是一件光荣的事，她说，这使得她的责任更加重大了。

她要离开讲台了，但又止住脚步凝视着台下，因为所有的战士和指挥员都站了起来，把枪高举在空中，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中，这位老太太缓缓地走下讲台。

几天以后，一个军医把我叫到医院的对外门诊部里。我很惊愕，我看到年迈的蔡妈妈受了伤，躺在担架上。当我向她俯下身去，她用微弱的声音向我讲述了事件发生的经过，这都是由于鸦片和赌博窝子。她说，妇救会去封闭它们，与那里的男人们争论了很久，他们拒绝封门，她和其他妇女们闯了进去并且断然下令让那些男人们回家去。那伙流氓大声辱骂她们。最后，蔡妈妈抡起一根大柴棒横砸在桌上，震得桌上的钱和麻将牌飞了一屋子，其他的妇女也照样行事，男人们与她们打了起来，发生了一场混战。几乎每一个妇女都挨了打——蔡妈妈伤势最重。

几天里，整个河谷地区陷入混乱之中。父亲们、丈夫们、儿子们、战士和指挥员们狂怒地奔走着。妇女们团团围住了蔡妈妈的床，她们每人都带了几处轻伤，但她们所有的人都快活地、喋喋不休地说着。因为这个鸦片窝子终于给封闭了，姓张的商人和那些动手打了妇女的人统统被抓了起

来。“一个伟大的胜利——伟大的胜利！”妇女们不住嘴地说着。

老妈妈向我呼吁：

“好了，美国同志，写信给美国的妇救会吧，告诉她们这些事。告诉她们我们的胜利，并且跟她们说，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

当我说到我可以照办时，我感到自己的声音在微微颤抖。但我坐在那里，想着美国的妇女们——她们穿得好，生活得好，她们信服上千部影片中所说的，“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她们中的许多人是否能欣赏和理解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和战斗的中国妇女呢？

那是在蔡妈妈返回她的战斗岗位前的几星期，一天，我坐在书桌旁，无意中抬头一看，见她正站在门口，身后有几个年轻妇女——她们都微笑着。我同她们一起走出门去，我见男人们、妇女们和孩子们都在搬着枕头，每个枕套上都绣着花鸟，每个枕套的另一边都绣着我曾建议过的那些口号。接着，妇女们挨着床向每个战士赠送一个枕头。战士的惊讶和喜悦就是最好的报答。

枕头毕竟是太少了，因为刚刚又收进了几个伤员，其中包括两个日本战俘。蔡妈妈劝说两个中国战士把他们的枕头让给日本人，并许诺再给他们另做。她拿着这件礼物，就妇女的权力为内容发表了一席讲话，这两个日本人以惊异的目光盯着她，脸上带着窘迫的笑容。

“伟大，真了不起！”我冲一位医生喊道，“这位老太太使日本人躺下了，而且他们除了躺着，听她讲有关妇女平等的事，别的什么也做不了。这对于他们是多么好的一剂药啊！这恰是他们应该得到的！”

我的中国儿子

我初到新四军暴风游击队时，他们派一名“小鬼”给我当勤务兵。同样也派了另一名小鬼给同我作伴的那位女记者。虽然这是游击部队的规矩，但我还得面临一个老问题——这不仅仅是有一名儿童替我当勤务兵的问题，而且是要把儿童们带上战场的问题。

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期的人民革命运动中都有儿童参加。1911年的中国革命和1925至1927年的“大革命”中，都有儿童参加。1927年中国发生内战，正在崛起的红军曾经面临过这个问题，成千上万的少年儿童踊跃参军，规模很大，有时候，男女老少全家都同士兵们一起打仗。

在新四军主力部队中，儿童承担的工作较轻，如每天早晨打洗脸水，替军官或政治领导人打扫房间，以及送信等任务。每天有许多时间要他们读书写字或者听老师讲课。学习“毕业”以后，有的当警卫员，有的当战士，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战场上的司令员。有了他们，一支崭新的力量进入了中国社会，这支力量是在战争的环境中长大的，这支力量具有根深蒂固的革命意识。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现象是令人悲痛的，但是这些儿童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如果说，军队生活对于儿童来说是过

此文原载《中国的战歌》第463—475页。文末提到的新四军司令员李先念，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篇故事最早曾以《最后胜利以后》为题刊登在美国《亚洲》杂志1942年2月号（第119—122页）。

于艰苦的话，那么这种艰苦程度还抵不上在工厂和小作坊里做工的童工们的一半。除了富裕家庭的少爷以外，在遍及整个中国的各种不幸的打击面前，儿童总是首当其冲的。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呆在中国的外国人说，游击部队中收留“小鬼”，是为了让军官们发泄同性恋的肉欲。那是坏心人编造的鬼话。也许可以说，我是天真的，容易受骗，但是在—支军队中要隐瞒这样的事情是难以办到的。军队的生活是集体的，说实话，大家都象在一只巨大无比的金鱼缸内生活，一切都清清楚楚。在中国士兵们中间绝对不会有流言蜚语，战争的环境使他们保持极端的忠诚坦率，即使有一人对你说谎，第二个人一定会把真相告诉你。

派给我的那个小鬼，同参加游击队的大多数小鬼完全是一个样子。他的名字叫沈国华，虽然他告诉我自己大概是十岁或十一岁（他弄不清楚自己的年龄），但看上去他还不到十岁。他具有中国儿童们所特有的那种智慧。他告诉我说，因为他当过“小乞丐”，一直吃不饱，常常生病，所以才长得这么矮小。他解释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时他很小，在河南省，土匪闯进他贫困的家，烧了房子，杀了他父亲，打伤了他母亲。那时他的两个哥哥为了活命已经出去当兵了，这场灾难发生以后，他只能当小乞丐了，靠乞讨来养活他自己和他的母亲。

那时候他是几岁，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母亲告诉他，拿一只饭碗站在一家富户的门前。就这样，他整天都在一个有高大院墙的门前三脚猫地走几步，又站一会儿。由于他不知道怎样哀求，怎样哭喊，怎样在满是尘土的地上磕头，谁也不会看他一眼。到了傍晚，大院里走出一个人来，问他为什么不回家。沈国华告诉那人说，他家的房子烧掉了，父亲被人杀

死了，母亲受伤了。他说自己是一个乞丐。那人就给他几个铜板，打发他回家。

每逢风雪交加的日子，那位女记者和我们的两个小鬼常常整天呆在我的房间里，因为暴风游击队中只有少数几个人的屋里有一盆炭火，我就是其中一人。与游击队里的每个战士一样，两个小鬼也长了一身虱子。一天我决定替他们消灭虱子。两个小鬼在屋角的一只小木盆里洗澡，我把火钳在炭火中烧得通红，把他们两人军装的潮湿的接缝处烫了一遍。沈国华洗完澡后，光着身子过来站在桌旁，一边看我烫衣服，一边向我诉说他参加游击队以前的情景。

“到了冬天，老百姓们全都长虱子，”他说，“我当乞丐的时候长虱子，给大地主干活的时候也长虱子。要是虱子长得不多，那你就得整天挠痒痒，要是浑身都是虱子，那就不觉得痒痒了，不过你就会整天头疼。昨天，我们又有一个战士得这种虱子病死了。他临死的时候，好多好多虱子从他的身上爬进了稻草。”

沈国华对于缺医少药全然无知。他说他当小乞丐的时候就常常闹病。他就找个地方躺下，慢慢使自己感到好一点，再爬起身来。有时候，有人放狗咬他，有一条狗在他大腿上咬了一口，留下了一个长长的伤疤。

“我怕狗，”他说，“我怕那些狗全来咬我。”他左边的脸颊上也有一个伤疤，不过这个伤疤是土匪放火烧他家的时候留下的。

沈国华没有时间的概念，所以不知道自己当了多长时间的乞丐。他眼巴巴地看着这些“富人的小孩”去上学，他们朝他掷石头。他也想上学，但是他上不了学，因为他不是“富”孩子。他在沙地上临摹从纸片上看到的字迹，学会写

“一、二、三”这样的简单汉字，但是比三再大的数字就不会写了。他请别人教他写自己的名字，但人们冲着他大笑，问他一个小乞丐学写字有什么用。他是在参加游击队以后才学会书写自己的名字的。

他六岁左右的时候，母亲求一个小地主作保，让他给一个大地主放牛。地主管他的吃住，每年只给八毛钱，此外偶尔也把自己儿子们不要的衣服和裤子给他几件。每逢新年他得到八毛钱，就交给母亲，母亲就买点布来替他做一双过冬的鞋子。

我把沈国华军服上的虱子烫完以后，他穿上衣服，然后对我说：“你又是我的爹，又是我的妈。”

我把他拉近身边，用双膝夹住了他，替他梳头发，帮他扣上军装的钮扣。我把他搂在怀里，我以前从来也没有搂抱过一个孩子。本来是派他来照料我的，而不是我去照料他。

部队就是沈国华的一切，部队是他的救世主，他学到的一切也都是在部队中学来的。但是他解释道，他参加部队的时间还不长，只有一年，因此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听着他的讲话，望着他那张同我相对而视的忧郁的小脸。那位女记者不禁低声的叹息道：“可怜的孩子！”

沈国华说话的时候，屋外朔风呼啸。他走到窗户前，从贴在窗格子上的薄纸的小孔中向外窥视。他满有把握地告诉我们，风暴不会持续太久了，因为此刻的风力已经不能把地面上的积雪刮得满天乱舞。风暴不久即将停止。他在大地主家放牛的时候见到过许多次这样的风暴，他懂得这一点。

我们问沈国华，他是怎样参加游击队的。他说，有一次主人派他到京汉铁路线上的确山去，正好有一支军队开过那里，他就停下来观看。突然他看见军队的行列中有他的一个

哥哥在内！但是，沈国华说这是他的“坏哥哥”，他有一个“好哥哥”在抗战开始时在芦沟桥牺牲了。他的“坏哥哥”同他说了几句话，但连一个铜板也不给沈国华或他的妈妈。相反，他说沈国华是个笨蛋，做一年工只赚八毛钱，他劝沈国华找一份赚大钱的差使干干。

从这些士兵们的嘴里，沈国华听到了八路军的名称。士兵们说，八路军是一支好军队，是穷人的军队。当官的不打骂当兵的，人人都学习读书写字，还有俱乐部和歌唱组。沈国华打听哪里可以找到这支“穷人的军队”，他向士兵们解释说，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穷人，所以要参加这支穷人的军队。士兵们冲着他发笑，告诉他这支军队离他们很远、很远。后来他又向一个警察打听，可是警察的话只能使他吃惊，因为他说八路军是一帮“土匪”。

不久以后，他碰到一个穿着破旧军装的满脸胡子的老兵，又向他打听这个消息。这个老兵的名字叫王老汉，他对沈国华说，参加军队，你的年龄还太小，不过要是你朝北走上几个月，那边就有八路军。后来，老王又告诉沈国华，他自己也是从一支穷人的军队中来到这里的，那支军队并不远。这支军队就是暴风游击队。听到沈国华要参加游击队，老汉笑了。“你知道吗？”老汉回答道，“游击队的生活很苦，没有吃，没有穿，还要整天行军打仗，有时候他们穷得连一文钱也没有。”

整整一天，沈国华跟在王老汉的后面，一边走，一边替自己辩解：因为他一直饿肚子和常常生病，所以个子长得小，不过他不是为了钱才想当兵的，他可以走很远的路，背很重的东西……在这里，地主的狗腿子打他，强迫他替他们干许多活……没有人教他怎样写自己的名字……那天傍晚，王老

汉被他唠叨得没有办法，终于答应带沈国华一起去试试游击队的生活。沈国华跟着王老汉进入山区，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勤务兵。

那位女记者常同两个小鬼坐在一起，帮他们温习功课。每个孩子都有一本识字课本，那是游击队自己印制的。课本开头是“人”字之类的单字，随后是“工人”、“农民”、“士兵”，再下面是“新四军”的名称，日本军队的名称，然后是句子。每一页最后有一个讨论题。下面是其中几个讨论题：

“农民种田，工人织布。为什么农民种田没有饭吃，工人织布没有衣服穿？”……“富人和穷人有什么不同？”……“现在为什么要富人和穷人一起抗日？”……“是什么妨碍人们互相依赖互相帮助？”……“为什么说日本军队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军队？”

我感到，这些问题正是那些反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人最最感到害怕的。

“我长大以后要当骑兵，去打日本鬼子。”沈国华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每一次，我都想到虱子和伤寒病会不会让他健康地长大成人，领导人民去打仗。

不久以后，我有机会可以随同一个野战团中的一排部队一起出发，开往汉口西北部湖泊地区。女记者决定与我同行，但我们都觉得把小鬼带在身边是有危险的，而且我一想到要离开他们，那虱子和不断使他们反复发烧的情景就萦绕在我的脑际。我实在舍不得他们，于是就写了一张申请书，请游击队司令员允许我把小鬼带在身边。沈国华拿了这份申请书飞快的跑到司令部去了。但是我后来听司令员讲起，当时他并没有把我的申请书交给司令员，而是一头闯进司令员的屋

子，行了个军礼，报告说是我要他一起出发！司令员有点惊讶，但是小鬼笔直不动地站在那里。他说他经常整夜地跟部队一起行军，他能背很重的东西。此外，他还说，因为他知道我的生活习惯和需要什么，所以我需要他一起去。

司令员回答说，既然我真的希望这样，沈国华当然可以跟我一起去。小鬼要求司令员把这个意见写在纸上后，就带着这份书面许可跑回我的屋子。我吃了一惊，但心想这是部队中的规定罢。

就这样，我把沈国华带在身边，前往湖泊小区。第三天晚上，我们在离开汽车道大约五英里处的小村子里停了下来。有批还没有武器的新兵也到村子里同我们集合在一起，还有许多手提篮子的过路人也在那里等待着我们。我们计划在午夜时刻穿过这条汽车道，因为这条汽车道是日本人用来向太行山前线运送增援部队的，所以他们在附近一带较大的村子里都派出了警卫部队。

夜色浓暗了，我们排成一行向前行进。许多农民前来为参军的儿子送行。我看见有一位老妇站在一个小土丘上抹着泪水，一位怀抱婴儿的少妇跟在部队中一名男子身边奔跑，口中唤着：“快点回来呐！”从村边的一间屋子中，传出了一声呼叫她儿子名字的刚毅的声音。接着那妇女走出屋子，我们行军的速度很快，但是她追上了我们，打量着每个人的脸孔。我们这才知道，他的儿子不愿参加游击队，逃跑了，她是想把他找回来。我们的队伍中没有人出来回答，过了好久，她才落在我们的队伍后面，但是她的声音仍在夜空中回荡。

几小时以后，我们沿着一个村子的外墙绕行，打算穿越前面的汽车道，可是我们刚刚能够看清那条道路的时候，大

家都停下了脚步。在一百码左右以外，有十多个日本兵背着枪，围立在一幢房子前的一大堆篝火旁。我们正在看着的时候，有几个日本兵从房子里走出，抬着几张桌子和椅子，把桌椅掷到火堆中燃烧。他们都围着火堆，自在地烤火取暖。

我们藏身在村子围墙的后面，游击队的领导们聚在一起轻声商谈。女记者和我也参加了他们的谈话。他们打算把这十几个日本兵消灭掉！我们两人都表示反对，争辩说，我们刚在一英里以外走过一个日本警卫哨所，他们会从后面攻击我们的。我们还指出，我们不知道在这幢房子里还有多少日本兵，也不知道他们装备有多少。而我们自己却只有二十五支步枪和一挺机关枪，机关枪也只有二十四盘子弹。

最后，我们劝他们稍稍迂回几百码在另一个地方穿过汽车路。我和女记者两个人都骑着马。我们走近汽车路时，听到了几辆卡车正隆隆地向我们驶来。队伍里立即小声地传来命令，士兵们跑步前进，非战斗人员全部隐藏到小土丘后面。我看见沈国华瘦小的身影迅速在我的前头穿越了汽车道。在昏暗和迷茫中，我骑着的那匹马竟向一条矮矮的破桥头猛冲，蹬腿一跳，我们跳上了一条大路，路上尽是向四面八方奔跑的人。我的马夫抓住缰绳，抽打着我的马，向一片稻田奔去。走在我们前面的，是三个穿长衫的去参军的人，他们飞快的奔跑着。我的马夫狠狠地对我小声说：“抽马啊！抽马啊！敌人来啦！”

我们跃马跳上了一条路堤，脚下是一片昏暗的田野，我们的身后传来了嗖嗖的子弹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哒哒的机关枪声。我们听到敌人的卡车马达声停止了，然后又有一辆卡车隆隆地从汽车道上向远处驶去。

“站住！”我叫住马夫，“敌人没有来！我们不要迷了路！”

“抽马啊！”马夫在后面喘着气，还是向前跑着。我开始觉得自己象一个懦夫。我们不是在当逃兵吗？何况我还是我们这一批人中唯一佩带一支小手枪的人呢！我翻身下马，同那个怕得发抖的马夫争辩。

“我们应该回去！应该找我们的部队！”我叫唤道。

他气喘不止，四周奇妙的子弹声仍在呼啸。

“日本鬼子！鬼子！”他喘着气，但不再同我争辩了。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他拽到一座古墓的坟堆后面。两个参军的人已经跑远了。

战斗停止了，四周象死一般地沉寂。没有月亮，只有满天星斗，撒下了一片微弱的星光。我的马开始啃着我脚边的青草，剩下的那个参军的人轻声对我说：“你的马是白色的，敌人看得见，它在啃草，敌人听得见的！”他说完这几句话，一转身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此时我的马夫已经完全安静下来，轻声问我：“现在该怎么办？”

“等一等，”我回答说。于是我让他留在坟堆下面，自己爬上了坟头，伏身在坟上，注视着面前的昏暗中有什么动静。前面是一片宁静。汽车道上空是一排排土丘的黑影轮廓。我侧耳细听，前面没有一丝人的声音，于是我就走下小土丘，对马夫说：“我要向游击队发个信号。”

“不行！不行！”马夫说，“鬼子也许知道这种信号！”

“一定要发！”我不理他，又爬上坟头，俯伏好身子，然后举起双手，轻轻地拍了几下。没有回答。我又拍了几下，这次稍稍拍得响一点，身后，马夫小声对我的拍掌声表示不满。还是没有回答！我又一次响响地拍了几下。远处传来了一个回答信号。我又试了一次，回答信号也重复了一

次。我拉住马夫的手，牵着马缰绳，开始朝信号的方向走去，马夫不时对我说：“说不定那是敌人！”我们向前走去，不时小心地拍几下手掌，回答的信号声越来越近了。不久，彼此十分接近了。我们停下脚步，藏身到马匹后面。我抽出手枪，打开保险，等待着对方。

在昏暗中，我们的眼前晃过了三个黑影。“口令！”他们严厉地发问，我看见他们用步枪对准着我们。

“驴子！”马夫惊喜地答道，飞快地跑过去同那三个人拥抱。

三名游击队员把步枪挂回自己的肩上，一边笑着，一边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背，差点把我拍翻在地。

“找到啦！找到啦！”他们欢呼着。于是大家挽着手穿过了那片稻田。有一位游击队员高兴地吹起了口哨，又停下了笑着对我们说：“哎呀！我的手榴弹正好掷在卡车的车身上，鬼子们炸飞了！鬼子们炸飞了！”他转脸又对另一名游击队员说：“听着！要记住！卡车开着的时候，手榴弹不该朝卡车上掷，要掷在卡车的前面！第一辆卡车跑了，就是这个道理！”

“他妈的！”另一个游击队员骂道。“当然，我们的机关枪就得这样打！不能耽误时间，我们只有一挺机关枪啊。”

就这样，一路上谈着机关枪和对日本士兵的母亲们骂些不好听的话。我们终于来到了离汽车大约三英里处的一个市镇上。日本人在这个市镇建立了伪政府，但没有派驻军队。不过每个伪政府都是由我们的人组成的。整个政府都出来欢迎我们，政府的长官就站在我们的部队中同大家热情地交谈着。

进村以后，我惊奇地发现沈国华丢魂落魄似地站在那里。他一见我就飞奔过来，两只小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抬头盯着我的脸孔。队伍散开的命令传达下来的时候，他同女记者和一个年轻诗人（陆凡——当过我的助手）一起跑开。后来得知，我不见了，他就在黑暗中四处奔跑，叫着我的名字，打听我是不是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女记者拉住他，要他安静，但是他说他一定要出去找我，他说只有我熟悉他的声音，会回答他，别人不熟悉他的声音，不会回答。别人告诉他，他还是一个孩子，会迷路的，他停止了叫唤，环顾一下四周的小山和树林，说：“我要把她找回来！她来到我们部队的时候，领导要我照顾好她，我也说过我一定要照顾好她。这是我的职责。”

湖泊中升起一片浓雾，笼罩着汉口以西和西北的一大片土地，浓雾中开始透出一线曙光。我们穿过了一个个村庄，村庄中的人以为我们是穿着中国军装的日本兵，都逃空了。雾散了，天色大亮，我们进入一个大湖边的城镇中。镇中只有三四个老翁老妇和几个儿童，其余的人都划船躲到了湖心深处。一个老妇拿起一面铜锣，一边敲锣，一边高声向湖中的人们呼喊：“回来吧！回来吧！”

人们都回来了，兴高采烈地同我们聚集在一起。但是他们见到我的时候，却显出了极大的紧张神色。他们成群聚集在我的周围，我听见有一个人在猜说我究竟是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是美国人、德国人还是英国人。一个妇女害怕地把她的小孩拉走，说：“她的眼睛象猫！”

我的小国华可受不了啦。他站在人们的面前高声说：“她的眼睛不象猫！她是一位妇女，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照顾我们的伤员！她在丁家镇找到一个伤员，给伤员喂饭，给伤

员洗澡。她还帮助那个伤员做事。”

人们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我的“儿子”话不停口：“瞧瞧她这只缠着绷带的手！”他拉起我的手让大家看。“有一次她替一个伤员洗澡，拿热水锅的时候把手烫坏了。她是我的爹，又是我的妈！你们有谁生病，她会替你们治病。”

最后，我决定离开暴风游击队，因为这时伤寒和打摆子（疟疾）发烧的病情老是缠着我。我也决心把沈国华收养做我的儿子，只要游击队和他自己愿意，我就收养他。说实在的，我自己常想，象沈国华这样的孩子决不止一个。我听说，在华西，有一位美国出生的搞儿童教育的教授，创办了一所学校，主要教科学知识。那里的生活很简朴，因为经费很少，儿童们必须自己料理生活，但是可以吃得饱穿得暖。我曾经考虑好久，心想由一个外国人带大一名中国儿童是否行得通，因为这样做会把这个儿童同他本国的人民隔离开来的。然而我让自己的思想想得更远一点，我想将来有一天我可以把沈国华送到外国去学习高级科学。不过，此刻我自己的生活尚且如此的不安全和到处漂荡，难道我竟敢设想这样一个计划？可是我应该试一试。

于是，我就去找暴风游击队的司令员李先念，当时有许多人站在他身边，我把我收养沈国华的事同他谈了。李先念曾经在红军中当过司令员，在这以前，他原先当过木工。对于他和他的部下来说，生活一直是艰苦的，个人问题在他看来并不一定重要。他问我为什么想收养沈国华，我想把我的理由讲得科学一点。我说这个孩子有一副科学的头脑，我注意到他会观察虱子，他会观察风雪气象，他学习读书和写字都很敏捷，他会凭夜间的星星识别方向。李先念说：那好，

只要妳愿意，孩子本人同意，妳就可以收养他。

靠在门框边的一个壮实的小伙子说，我讲的沈国华能做的那些事他样样都会。他认为他比沈国华懂得的事要多得多，问我愿意收他当儿子吗？李先念听到后淡淡一笑，对我说：如果你能把所有这些小伙子都收养做儿子，那倒是一个不坏的主意！这场谈话引起了一阵小小的喧闹。

但是，这个问题对沈国华来说却是十分严肃的。他向我打听华西那座学校的情况，他说他怕富人的小孩。他说自己是属于新四军的，可以在那座学校里试读一段时间后，再回到部队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教给别人。我说，部队需要许多教员。他默默地思考了一会，然后要求我允许他同另外几个小勤务员商量商量。第二天，他同另一名勤务兵一起进屋，向我陈述了他的决定。

“我们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留在前线，”他说，“等最后胜利以后你再收我当儿子吧。”

我们无法使沈国华改变主意。

不过在我离开湖泊地区以前，我安排我的“儿子”参加了暴风游击队的儿童剧团。有一名年轻的女教员负责这个剧团的工作，剧团半天学习，半天排演爱国剧目、歌咏和民族舞蹈，这些节目都是准备向士兵和老百姓们表演的。

送我离开湖泊地区的那条小船从岸边划开时，我最后一次看到了沈国华。他同另外两个男孩一起在岸边的湖水中洗衣服。他向我叫唤，朝我挥手，然后静静站在那里，目送着我的小船消失在迷雾之中。

白色恐怖片断

由东固通向东南方向的要隘九级关上，走下一个农村少妇和一个赤脚的男孩。少妇提着一包衣服，用一大块蓝色方布包着；男孩的左臂挽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鸡蛋。少妇长得很俊，年龄还不到二十二岁。上身穿着一件新的蓝布短褂，褂子拖到她的臀部，一排钮扣高高地一直扣到颈部。下半身穿着一一条黑色长裤，裤腿与她那壮健的脚踝相齐。少妇没有戴帽，一头浓密的乌发从她那宽大而光滑的前额向后梳去，下垂到颈后，打成一个油光光的大发髻，发髻上横插一支用硬竹制成的单尖发簪。竹簪一头是钝尖形的，另一头宽大，雕有花纹。

在少妇那双乌黑的大眼睛里，在她的整个体态中，有着一一种说不出的优美感，甚至还有一种满怀希望的神色。只有细心观察的人，才能辨觉她的这种感情。如果再细心一点，也许还能看出，在这个少妇体内，一个新的小生命正在成长，这个小生命必然寄托着她的钟爱，因为只有这种钟爱，才使她的容貌显得那么优美，那么富有满怀希望的神色。

不过，她显然不是只把自己的心完全寄托给正在她体内成长的小生命的那种少妇。她的眼神是那么的机智，只要山

本文原载《中国的红色风暴》（莫斯科：外国工人合作出版社1934年出版），第255—264页。该书是《中国红军在前进》的另一版本。这篇故事的背景取自三十年代华南江西苏维埃地区。封锁该苏维埃地区的白军是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

路高处浓密的树林里发出一丝声响，她就会迅速转脸环顾。她不时下意识地用手摸摸插在发髻上的竹簪，好象里面隐藏着什么东西似的。

只有三个人知道这支竹簪的秘密。一个是她自己，另一个是东固红军通讯处的同志，还有一个是她年轻的农民丈夫孔辽，他是红军的一名连长。他们都知道，在这支竹簪的空心竹管内，装着一些无色的液体，那是一种隐写墨水，还有一支很细的毛笔，供她写字之用。他们也知道这次派她到吉安去执行什么任务，知道在那个衣服包裹中还带着一封信。

东固山区四周被白军团团围困了，这封信就是她通过白军防线的通行证。信封上写着她收启的名字。信件内容读来就象是由她丈夫从吉安发来的，她丈夫是吉安这个白军据点中一家绸缎铺子的伙计。信中写道：“立即离开赤匪地区，抵吉安后速往碧潭找汝祖母。汝居危险赤区，吾常为汝之生命及贞操忧虑不安。”

“你能闯得过去？”丈夫孔辽和通讯处的那位同志问那个少妇。

“我不是已经干了两年了吗？多少难关都闯过来了！”她自恃地答道。“这一次嘛，同以往一样，他们难不倒我的。”

他们懂得她的意思。她是一个将要做妈妈的人了，一定会小心行事。

少妇从九级关朝下走的时候，脑海里回想着上面这些情景。她边走边同身旁的男孩说话，她瞧着男孩又瘦又黑的身子，他光着一双黝黑的脚在她身边缓步而行。他穿着一件褴褛的褂子，敞开前胸，露出一个不满十三足岁的农村男孩的消瘦而结实的躯体。那条破烂不堪的灰色裤子只能遮到他的

双膝，有一条宽布腰带缠在腰间。他虽然不知道这条腰带的秘密，但是他已经用手摸到，在这条腰带里肯定藏着一截铅笔头和一卷软竹簾纸。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在青塘红军学校中学过文化。四个月来，他为红军东奔西走，用贩卖鸡蛋作掩护，搜集情报。

他讲话的时候要抬头看她。这是一张消瘦而严肃的脸，有时候甚至是一张庄严的脸。下巴发圆，一脸稚气，颧骨却是高高的。一双十分明亮而机智的眼睛，机灵地眯成一条缝冲着她微笑。

“你从来就不害怕，弟弟？”少妇问他。

“害怕？不！有一次他们在离开青塘很远的地方抓住了我，揍我。我说我是一个孤儿，赤匪毁了我的家，杀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我现在只是孤身一人，穷得没有饭吃，只得出来贩卖鸡蛋挣钱吃饭。鸡蛋是贵的，不过因为我太穷了……大哥们，买我的鸡蛋吧！我就这样对他们说。”

“我一遍一遍的对他们这样讲，后来他们相信了，我就在他们中间卖我的鸡蛋。那时我还是红军学校的新学生，我还不认得所有的枪枝。不过我认得白军部队的各种旗子的不同式样，也认得某几种枪。我数哨兵的人数，记住他们站岗的位置……现在我已认得许多字，把看到的记下来就不会忘记了……等我长大以后，我还会懂得更多的东西……我要象毛同志那样——你可知道，不声不响，小心谨慎，可是他心里面老在想啊，盘算着大事情。”

男孩讲话时神情严肃，双眼盯着那个少妇。两人的目光碰在一起，热情而诚挚，就象青年们向前去迎接胜利。

“你也不怕？”男孩问少妇。

“有时候碰到白匪军官，有点怕。还有那些在几个将军

手下当过差的兵油子，他们象畜牲一样。”

“可是我们要继续战斗！”

“是的，我们要继续战斗！”

男孩突然停下脚步说：“现在我要绕过崖底朝北走了。再见吧，姐姐同志。”

“再见吧，弟弟！”她回答说，然后站在那里看着，一直目送那男孩的身影消失在崖底小道远处那片密密的灌木丛中，然后她走下关隘。

从关隘的底下，她可以看到远处隆丰村中那些低矮的屋顶和横跨在河上的那座木头吊桥。她知道，村子里已空无一人，农民们全都上山或住到东固去了。河谷那边只有一批白匪军在守卫那座吊桥。

当她走近吊桥时，十几名白匪军注视着她。她不安地走向前去。其中有两个是持枪的哨兵，其他的都没有带枪，蹲在那里聊天，掷铜板*赌钱。她走近时，他们全都站起身来。少妇的心头突然一沉，因为她看清他们都是一些年纪较大的人，全都有一脸兵油子的神气。那个哨兵的一只手上戴着三只戒指。

“什么人？打哪儿来的？”一个哨兵粗声粗气地问。

“我叫兰英，从东固逃出来的，我要到吉安去找丈夫。我丈夫怕赤匪，这是他给我的信。”

她把一个印有红色线框的长信封递了过去。哨兵拿起信封，但没有看它一眼。另一个人出来把信封拿去，翻来复去的照着。后来他们把信笺抽出，虽然他们都不识字，不过却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辅币，一角以上是银币，一角以下是铜币，俗称铜板。
——译注

装模作样的看起信来。

“山上有赤匪吗？”一个哨兵问她。

“我不清楚。也许有吧，所以我丈夫才叫我到吉安去呢。”

有一个兵油子开始装出他能够读信的样子。其他兵油子的脸上都露出毗牙咧嘴的凶笑。那个兵油子念了一连串下流的两性关系的脏话。念信的词越来越淫猥，把少妇羞得用双手掩住自己发烧的脸颊。

“这不是我的信！”她叫道，“把信还给我！”

一个兵油子向前抓住了她的胳膊。她挣脱了。

“干吗把裤腰带束得那么紧？”他一边问一边用胳膊抱住了少妇的身子，粗暴地狂吻起她的嘴巴来。其他的男人们在一旁呼唤助兴，兰英挣脱身子，揍了那个兵油子一记耳光。

“那你应该使我们相信你并没有私通赤匪！”那个兵油子恼怒地说。

“跟我来！”哨兵朝她咧嘴一笑，说：“我要到那边帐篷里去看这封信。”他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朝道旁背阴处的一座供休息用的小帐篷里拖去。其他的男人们都跟着他，看着少妇挣扎发笑。有一个男人又抓住了她一条胳膊，把她架进了帐篷。

进了帐篷以后，男人们开始争论应该由谁第一个占有她。她在惊恐之中，看到他们又在那里掷铜板，决定谁先谁后了。她的嗓子好象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的嘴内感到干巴巴的。

那个男人走近她的身边，她开始同他撕打。那个男人剥去她的衣服，剥得她一丝不挂，其余的男人们在一旁狂笑。她

继续同那个男人撕打，但是他抓住她的胳膊，使劲往后一拧。一阵剧痛穿过她的胳膊和全身，使她眼前一阵发黑。她感到有人扯散了她的发髻，她本能地抓住了那支珍贵的竹簪。然后，她完全昏死过去了。

男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轮奸了她。她四肢伸开，躺在帐篷内肮脏的土地上，一头乱发沾满了尘土。她的一条胳膊被拧歪了，折断了。从她的嘴里，流出一股带有泡沫的鲜血。

一个兵油子怔怔地看着她赤裸裸的躯体和苍白的脸孔。他的视线在她那微微隆起的肚子上停了下来，在肚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活动，好象在向他表示强烈的抗议，过一会儿，肚子里的活动停止了，就象少妇整个躯体一样，一动也不动了。

哨兵走上前去踢踢少妇的身体，看看她是否已经断气。接着另一个男人戏谑地用脚踢踢少妇的肋骨。可是她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她唇间的血泡凝固了。

“不能把尸体留在这里。”一个男人说。

他们捡起她那身被撕碎了的衣服，把她捆成一团，然后把那支竹簪随随便便地插在捆她躯体的衣服结子上。一人把她背到河边，掷进了河水中。少妇的躯体溅起了一阵水花，然后顺流飘去，终于在远处消失了。在飘流中，她的躯体有两次飘出水面，一头浓黑的长发就象漆黑的夜空在那里撒开。

男人们从桥上弯下身去看了一会，等少妇的躯体消失以后，就回去了。哨兵们站在桥上放哨，其余的人蹲在一起聊天，继续掷铜板赌钱。

山上，那个男孩“弟弟”在通向北边的山路上出现了，他开始沿着一条山间小道向前走去。他走了没有几步，就听见山顶上传来一声命令：

“站住！”

他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白匪军官带着五名警卫兵向他走来。

“什么人？”军官凶恶地问道。

“小名南由，我到香铺去卖鸡蛋。”

“从东固下来的？”

“我是到东固去买鸡蛋的，那边的鸡蛋好。”

“东固有多少赤匪？”

“我不清楚，我不找他们。”

“跟我来，你这个赤匪小骗子！这个礼拜你已经从东固下来过两次了！”

卫兵们把男孩包围了起来。他安静地走着，高昂着头，一双黑眼睛中显示出一种警惕而无所畏惧的神情。他发现他们正在把他带进一个没有老百姓居住的村子，村子里只有白匪军。他们走进一条肮脏的街道，又穿过一扇大门，来到了一个铺有石板的院子里。院子里有许多士兵坐在石头长凳上，靠里边，还有一间堂屋。

那个军官同另外几个抽着香烟的白匪军官交谈着什么。有四个军官正在靠近窗户的一张小方桌上打麻将，每人的手肘边都堆着一小叠银元。

两个白匪军官开始审讯南由，打麻将的人就一边听着，一边抽香烟，把香烟头掷在地上。南由重复地讲着他那段买鸡蛋的故事。“我对东固的赤匪一点也不清楚，”最后他说。

“没有赤匪的同意，你怎么能在东固的关隘口上上下下呢？”一个军官凶狠地盘问他，伸出手来敲敲挽在他胳膊中的那篮鸡蛋。

“我只做买鸡蛋的生意。”他回答说。

这时有一个人走上前来搜查他的身体。男孩的腰带被撕开了。一个小铅笔头和一卷薄薄软的竹簾纸掉了出来。

那个军官脸色发青。“你是土匪的探子！”他伸手打了男孩重重一巴掌。南由摇晃了一下，但很快又站稳了，立在那里一声不响。院子里的士兵们聚集到堂屋的门口向里张望。

“枪毙这个王八蛋！”麻将桌上有一个军官说，说话时的神情若无其事，就象在牌桌上打一张牌一样。

南由看了看敌人们的面孔。他看见站在门口的士兵们。他们也是农民——他想，等到这些士兵懂得为什么群众会起来战斗的道理以后，他们也会投奔红军的。于是，他转过脸来，朝那些军官们说：

“你们才是土匪！你们是人民的敌人。你们杀死了我的父母亲，烧了我们的家，烧了我们的粮食。你们是地主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闭嘴！”有个军官火冒三丈，狠狠揍了男孩一巴掌。男孩有几分钟眼前发黑，什么也看不清了，后来又感到嘴里有股又热又咸的滋味。他伸手捂嘴，手中就沾满了鲜血。他听见官军发出了一个命令，于是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往外走，他再次走到了那条肮脏的小街上。突然，他发现自己正站立在紧靠城墙外的一小块坟地上。在他面前，站着一小排士兵，举枪向他瞄准。在这小排士兵的头顶上，他看到了东固那些绿色的高地，他的父亲是一位红军的司令员。

“红军万岁！”他用高亢的童音呼唤着。

一排子弹打响了。细长而黝黑的躯体随着枪声震颤了一下，然后倒在地下，就象深深、深深地睡着了。一小股鲜血从他的身下流出，同另一股流出的鲜血汇合在一起，然后渗

入那干渴的坟地。

那一小队士兵肃立不动。一个士兵转过脸去，同旁边一个士兵的目光相遇。两人都从对方的目光中看出某种迷惑的神情。另一个士兵凝视着男孩的尸体，象是要把它看透似的，他的喉咙在颤动。

然后，士兵们又重新齐步走进那条肮脏的小街，穿过大门，进入那个石头铺地的院子。列队散开后，他们又坐在石头长凳上，彼此不敢正目而视，只是盯着他们脚下的石板。后来，有个士兵低声说道：

“你听见那男孩说的话吗？”

“听见了——他们全是这么说的。”

“他不怕死。”

“不怕——他们全都不怕死。”

其余的士兵默默地听着，屏声息气。

“为什么红军不怕死，就连他们的小孩子都不怕死？”

“因为，因为——你不是听到他说了吗？我们才是罪人呢——地主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有个白匪军官听到了他们的低声谈话，走到门口，向外张望。他站在那里，不声不响地盯着士兵们。刚才说话的那个士兵站起身来，挑衅地提了提他的裤子，走出了院子。另一个士兵也跟着走出院子，就象是紧急集合一样。那个军官默默地看着他们走出院子，然后向其余的士兵瞥了一眼，恼怒地回到堂屋里去了。

窗口处，四个军官继续在打麻将。一小堆一小堆的银元叠在他们的手肘边，他们抽着香烟，把烟头掷到地上。

共产党员单菲

这篇故事讲的是中国湖南省一个富绅的女儿——单菲。她上过学堂，穿的是绸缎绫罗，还有一支自来水金笔。但是她后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且同一位农民领袖结了婚。在以后的年代里，她就……不过，故事还得从头讲起。

开头要从单菲的母亲讲起。她是一个不寻常的妇女，守旧，缠小脚，对她古板而封建的丈夫简直是百依百顺。但是她必定也有不顺从丈夫的地方。她把几个儿子带大，送他们去上学。儿子们回来的时候就带来了新思想。新思想中有一些是谈妇女问题的——大脚妇女，同男子一样进学堂上学，按照自己的心愿选丈夫和确定结婚的日期。

儿子们谈论着这些问题的时候，母亲就坐在一旁听着，两眼看着小女儿单菲在摇篮中踢腿伸臂。她想得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她最后是为了女儿的自由而死去的。

这场斗争是在围绕她家的那片高高的石墙后面发生的。敌人是她的丈夫和几个叔伯兄弟。母亲的武器是妇女们专有的古老武器：眼泪、恳求、哄骗、做作。最初，她只赢得了一件事：丈夫答应她让单菲读书，但教师是一个旧式的塾师，只许请到家里教单菲识字。但是单菲必须缠足，必须按

本文转引自《中国人民的命运》第35—42页。单菲的故事是作者在三十年代初记录下来的。此文最初在美国《新群众》杂志1931年5月号上发表，见该期刊物第3—5页。

古老的习惯凭父母之命订婚。就这样，孩子的脚被缠了起来，并且许配给富邻的一个瘦弱不堪的少爷，这个富邻是一个生活腐化的老人，家里妻妾成群。

单菲的父亲象暴君一样统治着整个家庭，到单菲十一岁那年，他突然去世了。也许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寿终正寝，也许单菲的母亲也真心地哭了一场。但是，没等丧期结束，母亲就把缠在这个小姑娘脚上的裹脚布取掉了；坟头的新土未干，就送单菲到一百里路以外的一所学校中去念书了。

裹脚布虽然取掉了，但这双经过五年紧缠的小脚已经残缺了，几个半死无用的足趾折曲在她的脚掌下面，象石头一样，给这位姑娘带来了终生的不便。

不管怎么说，裹脚布已经没有了，而缠带裹脚布就是一种被奴役的象征。剩下的问题就是同那个富邻的儿子的婚约了。在中国，这种婚约是合法的，一方家长如果毁约，就会被告到衙门里给予重罚，就象是犯了重罪一样。不过，单菲的母亲似乎具有那种被封建头脑的人称作“犯罪”的倾向，因为有人怀疑她正在策划解除单菲的婚约。

比这更坏的，还有谣传说，她不但没有教育单菲要遵守妇道，却鼓励女儿去追求自由和叛逆。后来有消息传来，说单菲为反对学校当局的腐化曾领导过一次学生罢课，上面这一谣传就象烈火一样四处传开了。单菲已将近十六岁，年方二八，正好是当时的结婚年龄。然而她被学校以品行不良为由开除了，她理直气壮地转回家来。她母亲不但没有管束她，反而私下同她计议一番，然后把她送到一个更为新式的学校中去读书。学校很远，在长江边的武昌市。单菲到了那里以后，又有谣传说，她的名声越来越不好了，因为她居然当上

了学生运动的一名领导人。此外，还说武昌的男女学生是一起上课的。

事情愈来愈坏了，最后，那个地主富邻告了单菲的母亲一状，把她传到法庭，控告她企图撕毁婚约。可是这位老太太辩驳得非常机智，她使法庭相信，她的要求只不过是把婚期推迟两年。

她说服了那个法官，但是没有说服那个地主。按照习惯，地主把自己的管家和武装乡团召集起来。待单菲学校放假回家时，他们就用武装抢亲。第一次抢亲失败了，单菲逃回武昌又过了一年。第二次回家时他们又再次打算抢亲。在母亲的帮助下，单菲又逃脱了，她躲避在农民们的家里，几经周折，又回到了武昌。

单菲到达武昌的时候，她母亲去世的消息早已寄到。母亲的去世也许是自然的死亡，也可能不是。单菲却说是自然的死亡，是因为她母亲由于家庭不和和长期的斗争焦虑过度而死亡的。“她是为我而死的，”她说道，说话时的神情不象要伤心痛哭一场，而只是一种引以为豪的激动。

单菲的同学们劝她不要回家参加葬礼。但这不仅仅是一位母亲的逝世，而且是一位为争取妇女自由的先驱者的逝世。因此，年轻和无所畏惧甚至有点自恃的单菲，心想自己曾经两次逃脱了旧势力，这一次一定能再次击败他们。为了应付不测事件，她同本校学生会里的同学们制定了计划，如果过了一定的时期以后她仍未回到武昌，同学们就到她家乡找她，帮助她逃出。

老母亲的尸体尚未入殓，单菲的祖居就被武装乡团包围了，人们粗暴地把她抢到她公公的家中，把她关在一套新房中，让她回心转意。她没有回心转意，相反，她绝食一个星期

期。此时由于这个地主家庭中另一名妇女的反叛行为，才打断了她的绝食斗争。

这个妇女就是地主的大老婆，中国人称她为“太太”，以便同地主的几个小老婆有所区别。老妇看着这位陌生的、叛逆的富家小姐，听她诉说自己的遭遇，知道多年以来在这位小姐的周围发生过一场战斗。于是，老妇就利用古老故事中的妇人之计为单菲增加一点自由。这种自由仅仅意味着允许单菲在家里和院子里活动，不许走出那高高的围墙，这一点终于得到了那个地主的准许。

在中国，要保守秘密是极其困难的，单菲被抢亲的消息飞快地传了开来。那时正好有一个女学生和两个男学生从武昌路过附近，也许是听到了这一消息，他们就买通一个仆人捎了个信息给单菲。最后，有一天深夜，单菲设法爬上墙头，跳出墙外，在昏暗中消失了。就在那一天晚上，她和朋友们顶着星光朝武汉方向乘车逃走了。

这是1926年夏末的事，当时中国已刮起了强烈的革命之风。不久以后，北伐军围攻武昌城。单菲放弃了学习，投身到群众之中。她成了一名共青团员。在工作中，她结识了一位深得农民们爱戴的农民领导人，她爱上了他。于是她不顾已同富绅儿子订婚的旧习惯，毅然宣布她要同自己相爱的人自由结婚。从此以后，她的生活就紧紧地同为争取土地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了。她过着最最贫苦的农民工人的生活，同他们穿得一样，吃得一样，工作得一样，在前线战场上多次同他们一起面临着死亡的考验。就是在她怀孕的时候，她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革命事业；孩子生下后，她背上孩子继续工作。

在国共合作的日子里，单菲是最积极的女革命家之一，

组织上把她派回老家当国民党的妇女部长。她在家乡被选为革命法庭的一个成员，革命法庭审判革命的敌人，³没收豪富地主的土地，把它们分配给贫苦的农民。她帮助大家没收了她本家族的全部土地，也没收了原先那个未婚夫一家的土地。

当革命发展为一场社会革命时，共产党同国民党分裂了，可怕的白色恐怖开始了。军阀和封建地主重新掌权。单菲本家的家族和她未婚夫的家族要求国民党通缉她。国民党发出了通缉令，这意味着要把她和她的孩子置于死地。⁴同她一起工作过的两个妇女和三个男人被逮捕了，他们把妇女的乳房割下，然后在大街上把这五个人一起枭首示众。但是工人们弄来一口棺材，棺材下钻了几个透气孔，把单菲和她的孩子装在棺材里，抬出了重兵把守的城门，安置在城外的坟地里。她从坟地里出来，又开始向武昌进发了。由于她的一头短发，她又被当作一个革命党再次被捕；她怀抱婴儿，再三申辩。终于被释放了。

她到达武昌以后，共产党命令她回到湘西参加秋收起义的激烈战斗，农民们自己武装自己，抗租抗捐，开始没收地主土地。在那些日子里，单菲同他们朝夕相处。晚上她睡在山上的树林里，在她周围都是那些不敢在自己家里过夜的人们，惴惴不安地躺在那里。后来，国民党派军队来攻打他们。农民们被击败了，成千上万的人惨遭杀害，余下的被缴了枪。

单菲又一次回到了武汉。党再次派她回去参加斗争。不过这一次她是以一个国民党员的身份被派到一座由军阀统治的城市中去工作。城墙外面是农民军队。城墙里面，单菲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妇女部长，她在部队中和工人中进行秘密宣

传。城里的一个审判厅长见了她，向她求爱。他是一个有钱的军阀，单菲一边谨慎地听着他向她求爱的话，一边不忘问他怎样打败农民军队的计划。他把计划告诉了她，她就把消息送到城外农民军队的手中。城外这支农民军队的领导人里，有一位就是她的丈夫。

最后，农民军队攻城了。单菲非常勇敢，她到白军的部队中进行宣传，不幸被捕，并被判死刑，人们把她送到爱过她的那个审判厅长手中。他听了她的否认词相信了她的话，把她释放，终于使她能够逃离该城。但是那支农民军队却被击溃了，在活下来的人员中也有她的丈夫，后来他们又在武汉相遇了。

此后，单菲又受命负责党内的技术工作，从事排字和印刷。她在工作的时候，可以把孩子放在身边的桌子上，一面哼着催眠曲，一面工作。有一天，一群士兵搜查他们的家。那天正好她丈夫出门了，她也正好在几分钟以前刚刚离开家门。她在远处看见士兵们包围了她的家。几小时以后，她潜回家中去找自己的孩子。发现士兵们已把孩子掷在一个水桶里让他自己淹死，她和她的丈夫再三抢救也无法使这个小生命复甦过来。单菲的丈夫用他的脸颊擦去她脸上痛苦的泪水——单菲转过身去又开始工作了。

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也轮到单菲的头上。有一天去看望她学生时期的一位校长，决定在她家留宿一夜。第二天清晨，她被许多叫唤声吵醒了。她似乎听到其中有她丈夫的呼唤声。她坐起身来侧耳细听，清清楚楚地听到这样的口号声：“我们愿为共产主义牺牲！革命万岁！”她的朋友用枕头蒙住耳朵说：“他们每天都把共产党拉到这里枪毙杀头。前面这块空地就是刑场！”

一排枪声响了，口号声停止了。单菲爬下床铺，不顾一

切地走向刑场。士兵们已经齐步走开了，只有一小群围观者呆呆地看着长长的一排尸体。单菲蹒跚地穿过人群，扑倒在她丈夫那还有余温的尸体上。

白色恐怖的罗网越来越逼近单菲，组织上命令她离开武汉。她沿着长江，从一个城市赶到另一个城市，她到工厂里做工，把妇女和儿童组织起来。她无论到甚么地方都不能久留，因为她那残缺的脚趾使她无法站在机器前每天做工十二小时或十四小时。

1929年夏天，她再次来到湖南的农民中间。有一天组织上派她到长沙去，不幸与另外两个男共产党员一起被捕，其中有一个是农民领导人。她坐了六个月的班房，后来被释放了？那是因为新军阀推翻了老军阀，用释放犯人的方法来报复解解气。但是他们并不释放那位农民领导人。单菲贿赂一个狱警，让她在离狱前去看看这位农民领导人。他的颈间、手腕和足踝上都戴着铁铐，铁铐之间还用铁链连在一起。据说，在中国，这样的囚犯活不到两年。单菲自己并未上过镣铐。但是她出狱时已有皮肤病、胃病和混身脓肿，她的皮肤因贫血而显得格外苍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是回到农民中间，继续进行战斗。

1930年春天，她被当选为代表，出席了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后来，朋友们把她送进一家医院，为脓肿病动了手术。在养病期间，她在枕头底下放着一本研究马克思主义论文的中译本，她说：“现在我有时间学习理论了。”

有人也许会问：“单菲年轻吗？长得漂亮吗？”

单菲今年二十五岁。她皮肤黝黑，脸面开阔，颧骨很高。她的眼睛乌黑，但这双眼睛里闪闪发光，好象可以看透比中国漫漫长夜还要黑暗的昏天黑地。她身体结实，象个农

民，看来很难把她同泥土分开，这是她的命根子，她牢牢地扎根在这片泥土中。说她漂亮不漂亮？我不知道，但是，难道泥土不漂亮吗？

矿工家属

今天，我又访问了几个矿工游击队员。我同三位矿工交谈，他们都曾在光阳镇协助八路军同日本人打过仗。有一位矿工向我介绍了自己的身世。他曾经在冯玉祥将军手下当过兵，后来到河北省唐山市开滦煤矿当矿工。日本侵略中国后，他失业了，只得到山西省大同煤矿可怕的矿井里做工，一天只挣二、三毛钱，生活过得猪狗不如。共产党开始把矿工们组织起来的时候，他就不幸被捕，判刑十二年，被关进了太原监狱。日本侵华后，中国组成了民族统一战线，他被释出狱，来到正太铁路线上的阳泉，把当地的矿工们组织成游击队。那时煤矿已经关闭，还有二百名矿工留在那里。他就把这些矿工同铁路工人一起组成了一支武装游击队。日本兵进攻的时候，他们把铁路炸毁，还在其他许多地方帮助八路军炸毁铁路线。后来，他们于11月2日到4日参加了阳泉西南的光阳镇战役，配合八路军于11月4日下午和晚上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

游击队员们带着家属。周立波同一位游击队员的老妈妈聊天。她已经六十一岁，头发灰白，身子骨硬朗，斗志很

原载《中国在反攻》第155—158页。此文是史沫特莱从她1937年11月10日在晋东地区时写下的日记中摘录出来的。文末提到的两位作家都是她的旅伴。其中徐琛来自东北，后来不知去向。另一人是周立波，四十年代后期已成为一个知名作家。史沫特莱当时所看到的社会现实，后来在《暴风骤雨》等小说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旺。她告诉周立波说，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在这里当游击队员，还有一个参加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不要光顾着照料我这老妈妈，”她对儿子们说，“我要你们去打鬼子！”她现在同大儿子住在一起，替所有的游击队员缝缝补补和编织袜子。她是整个游击队的妈妈。

他们从阳泉往南走的时候，一路上见到许多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青年的尸体。日本人每到一处总是挨家挨户找出一个、二个或三个青年人杀来杀掉，有时候日本人把全村的青年人都杀光。他们把青年人用绳子捆在一起，然后用军刀把脑袋劈开。他们的理论是：活着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是“危险分子”。矿工们说，有许多人开始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开进中国，但现在他们懂得了血的教训，也尝到了“日本占领”的滋味。现在，他们正在同日本人战斗。

简直难以令人相信，除了语言不通之外，我居然能够比比划划地同中国的矿工、同他们的妻子姐妹和女儿们交谈起来。全世界的矿工们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外貌一样，他们的动作一样，他们都有一双沾满煤屑的粗糙的手掌。他们都具有一种神彩：一张带有善意的笑脸和一副令人尊敬的敏捷的头脑。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几乎也是相同的，只是中国矿工们所遇到的问题比美国矿工们更大更困难。他们倾诉自己苦难的生活，谈论自己为组织起来而进行的斗争，讲述自己所受的监狱之苦和经受的折磨。不过，尽管这样，当日本开始侵略中国时，他们就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祖国。但是，他们同其他国家中的受压迫者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条件：他们有八路军这样一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八路军帮助他们，训练他们，把他们组织成能够打仗的队伍。

我们遇到好几支矿工武装游击队护送妇女到后方去。这

些妇女大概也与美国矿工或欧洲矿工们的妻子女儿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同男矿工们一样，她们也面带笑容——也许比男人们笑得更多一些。她们那种有点发粘的头发衬托着各自的脸蛋，稳稳地站在那里，有时候她们把双手背放在臀部后面或者交叉放在胸前。

我离开矿工们以后，再一次感到自己仅仅是一名作家，一个袖手旁观者。我看到矿工们粗大的、青筋突起的双手，我看到他们的布鞋磨破了，或者光着双脚，我看到他们沾满尘土的衣衫。我体会到，自己永远也没有机会去真正理解这些矿工和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我依然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把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物写成文章的作家罢了。中国的真实故事只能由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自己来编写。目前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我的旅伴虽然是中国人的，但是我相信他们现在也写不出中国人民进行斗争的真实故事。中国也有真正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同我一样，并不了解群众的生活。徐琛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最感兴趣的就“风格”。

如果你问他某一本书写得怎样，他首先告诉你的就是这本书的风格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你才能从他嘴里掏出几句关于这本书的内容的评语。周立波比较关心内容，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他的生活太艰苦，经常精疲力尽，无法发挥他的才智。我想，不久后他会被这种生活方式锻炼得坚强起来的。我这里所写的，不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实质，而只是一位旁观者的记录。

后 记

弗洛伦斯·豪

由于我在报关单上填明我从妇女解放出版社带来了一批图书，作为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朋友们和图书馆的礼物，北京机场的一位年轻官员微笑着帮我把散放在柜台上的书籍装进提包中，友好地问：“您是一位教师？”他笑着问我。“是的，”我也笑着回答，“我教的就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大地的女儿》是史沫特莱的自传，也是她唯一的一本长篇小说，但中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本书。不过，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了说清楚这样一件事：对于史沫特莱本人，中国对她的了解比美国还要胜出一筹。在中国，大家知道她是一位美国作家，受人尊敬，特别是因为她在前线同人民军队一起做了人道主义的工作。三十年代，她的大部分岁月是在献身于护理伤病员、为医疗用品募集款项、从印度和其他各国邀请外国医生等事业之中度过的。整个三十年代，她不断为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报刊撰写文章，报道中国革命和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人对她的评价很高，因为她正确地报道事实，而且不顾自己的健康与安全甘愿与红军一起到处奔波。今天，中国把她的名字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诺尔曼·白求恩、埃德加·斯诺和其他人士列在一起，作为革命事业的许多外国朋友中的一员，给予纪念。

而在美国，直至她去世二十六年以后的今天，人们才因

《大地的女儿》这本著作而开始知道史沫特莱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这本著作最初发表于1929年，无人注意，后经妇女解放出版社发现，于1973年重印出版，才将它从湮没的困境中拯救出来^①。《大地的女儿》很快就成为美国文学课程中一本重要的教科书，在自传体文学的新设课程中以及在一般妇女问题研究课程中，都攻读这本著作。我提到我自己也是“教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当然也是指这本自传体小说，因为这本书是她作品中唯一可用的教材（不算她写的《朱德传》）。

《革命时期的中国人》一书又增添了“更多的史沫特莱”教材，无论是对于那些需要更多地了解史沫特莱的人来说，还是对于那些对中国感到兴趣的人来说，都是如此。这部新著是为了扩大史沫特莱作为一名作家的声誉，是为了说明她的才华横溢、见识广博，同时也是为了把她关于中国人的大部分著作汇集成一本文集。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妇女人物和史沫特莱的生平（特别是她在中国时期的生活），麦金农已经有了权威性的论述。从他们撰写的序言中，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史沫特莱用优秀作家的简练笔法，在她的短篇小说和杂文中深刻地抓住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在这里要写另外一个方面：谈谈史沫特莱作品的文学价值——作品的生命力有多长，它能向作者的后代子孙们提供什么启示。我还要探讨一下本书和《大地的女儿》的主要题材，把着重点放在妇女解放运动方面。

“不要把文章弄得‘文学气味太浓’”

三十年代后期史沫特莱从前线写给出版社的一封信中，在结尾时她要求出版社给予帮助，她写道：“所以我要求你帮助我编好我的手稿，但是不要把文章弄得‘文学气味太

浓。”^②毫不奇怪，“文学气味”这个词对于史沫特莱是没有吸引力的；她不喜欢强调“形式”美，而喜欢那些着重研究“内容”的作家^③。她之所以会采取这种态度，理由也很清楚：她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具有三十年代左翼人士所共有的许多政治观念和艺术观念。史沫特莱把“文学气味”和“形式美”都看作是特权阶级的东西，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毫不相干。因为这类词藻不属于一个由农民、士兵、地主、苦难和战争所组成的世界，而属于一个由生活放荡、衣着时髦、汽车豪华的人们所组成的世界。史沫特莱谈起过一名中国的当代作家，并把自己的作品同那个作家的作品进行对比，她说那名作家是一个“同我一样的、脱离中国人民大众生活的”知识分子；史沫特莱还谈起过另一名中国当代作家周立波，说周能同群众打成一片，他的生活“太艰苦，经常精疲力尽，无法发挥他的才智。”^④作为报道一场革命运动的外国记者，史沫特莱了解自己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尽管她常常生病，而且即使身体稍好也需要在难以置信的艰苦环境中进行工作。但是她的职业要求她进行写作，要求她必须在既有的环境下进行工作，甚至要上前线。

总之，她是一位工作勤奋的记者。此外，她认识到，在自己的作品中，除了如实报道以外，还承担着更大的使命。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她报道的范围十分广泛。象吉卜林*青年时代一样，她的作品主要是在各种报纸和新闻刊物上发表的，但许多作品却是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撰写的。尽管她不赞成讲究文体风格，但她不失为一名文风严谨的作家。本书所收

*吉卜林 (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英国小说家和诗人，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1865年12月生于印度孟买，青年时期在印度从事新闻工作，到过南非、锡兰和新西兰。1898年定居英国。——译注

录的多方面的题材就足以说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她在中国度过的十年也是她认真探索各种写作方法的十年,这种探索不仅增进了她的政治觉悟,也增进了她的艺术意识。虽然我们还没有读过她的全部文稿,其中包括报刊文章底稿和笔记本,但是仅仅从已见的内部材料即可说明,她的作品都是经过反复修改和重写的^⑥。她的创作并未受到文稿期限的约束,尤其是在中国度过最初几个年头以后,她有一段空歇时间,可以随着某些事件的意义日趋明朗而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和重写。

但是,史沫特莱之所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并不仅仅是由于她到今天还对我们产生影响,也不是由于她是一名在独特环境下由几种因素造就的作家:一名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者,一名工人阶级出身的妇女,在中国度过了十年革命生涯。作为一名妇女解放运动作家,史沫特莱目前之所以对我们具有如此珍贵的价值,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她用自己的艺术专门描述那些当事者没有时间、场所或工具来倾吐他们心声的人们的生活。她作出了政治抉择:尽可能地长期留在中国,这样,她就可以使自己的艺术立足于革命的一边。为了做到这一点,她必须使自己的报道没有错误,没有虚假;实际的情况也要求真实而正确地报道旧中国的苦难和争取建立新中国所进行的奋斗。但是,怎样才能把小说写得能反映出一场革命的光荣(或痛苦),而不是反映少数几个小说主人公的个人荣辱呢?

即使在史沫特莱的自传《大地的女儿》一书中,作为一名作家,她也试图打破这个难题:书中的主人公是不是超越了她的社会阶级而显得过分特殊了?书中主人公玛丽·罗杰斯是她自己的化身,是一位刚强而罗曼蒂克的人士。她受尽人

间辛酸，但是她成功地摆脱了她的母亲、姐姐和姑母所经历过的那种生活。诚然，她在小说的开始就提出，她不是属于那种“为美而死的人。”

我属于为了其他原因而死的一类人：为贫困所折磨，为财富或权势所欺凌，为了伟大的目的而奋斗的人。我们中间也有少数人的死是由于经历了爱情的痛苦或幻灭而感到失望，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说来，“地震反而开辟了新的泉源”。因为我们是属于大地的，我们的斗争也就是整个大地的斗争。^⑥

史沫特莱打算通过这部长篇小说说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尽管玛丽·罗杰斯的为人与众不同，尽管她的几次出走都因工人阶级妇女所面临的种种条件而告失败了，但实际上她并没有把别人撇在一边，她具有美国传统上第二代人所具有的那种品德。她并不蔑视自己的双亲、姐姐和兄弟，也不蔑视她那位当妓女的姑母。她为她们的痛苦和贫困而呐喊，她的眼前始终显现着她们的悲惨生活情景。

四十年代后期，史沫特莱在美国度过她一生中最后几个年头时，她撰写农民将军朱德的传记。这本书是在她去世以后才出版的，但出版社写道，这是“一本初稿，她本来打算进行修改和补充的”^⑦。她是不是会对此书的风格进行修改，我们无法知晓。史沫特莱撰写这部著作时采用的是传记作家的笔法，她把自己也写了进去，下面一段文字足以说明，她在写自己的时候也把她那种祖传的或阶级的意识写了进去。朱德叙述着自己的身世，告诉史沫特莱他的相貌长得象自己的母亲，他母亲生了十三个孩子，最后五个因为“家里太穷养不活他们，一生下地就活活溺死了”。

“对于地主来说，农民是不是够吃，地里是不是忙得不能分身，那不是他的事，”朱将军气愤地说道。“不但家里的男人要去，就是我的母亲和养母也要到‘阎王’的厨房里帮工。回家时，有时候用衣服遮掩着带一些好吃的东西回来，给孩子们尝一口，还给我们讲一些听来象神话一般的事。”

朱将军用这种语调叙述当年情形的时候，我的笔时时不由得无法写下去。他使用惊疑的眼光望着我。

“有些时候，”我解释说，“我觉得似乎你讲的就是我的母亲。我们并不曾给封建的地主打工，可是我母亲也是专替有钱人洗衣服，或是在假日中到他们的厨房干活。母亲也时常给孩子们偷带出点好吃的东西，给我们每人尝一口。母亲的双手操作得多了，也几乎是黑的，头发也是在后颈挽个发髻，又黑，又蓬蓬松松的。”

“你的父亲呢？”他惊愕地追问道。

“我小时候，他是个穷苦农民，光着脚板耕种，不过，大部分时候还穿得上皮鞋，他恨透了这种生活，三番两次地撇下母亲，离家出走。他并不象你们家里男人那样有规有矩。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干粗活的散工，我们的肚子也就永远没有吃饱过。然而苦头倒是没有少吃。”

“天下穷人是一家啊！”他用粗哑的声音说完后，我们默默地坐在那里，好久好久^⑧。

史沫特莱同朱德会见的时间和地点是三十年代在中国的

前线附近，她打算介绍朱德的生平。他对朱德说：“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没有一个中国农民向全世界讲过自己的身世。如果你能把自己的身世告诉我，那就是第一个开口讲话的农民。”她继续以她独有的那种神情说道：“我……见到过许多比朱德更具有戏剧性的人物，他们的生活都是写作伟大文学作品的素材。但是中国的农民并没有戏剧性可言，我坚持我原先的看法……”。^⑨她在中国期间所创作的短篇小说，全都说明这位作家是抱着始终如一信念和一贯的努力来检验这样一个问题：怎样使小说中的人物具有个性，同时又保持人物的共性？怎样使小说保持其独特的真实性，同时又使其对其他人物也能产生影响，超越只描写个性的范畴？怎样遵照“新闻采访”的原则，既要写出活生生的事实，同时又要使写出的作品能在它的文字情节以外具有更大的生命力？

在《奉天五女子》和《徐美玲》这两篇短篇小说中，她试用了两种不同的写法。《奉天五女子》写的是1930年北满地区几个不同年龄和不同阶级的妇女：一个为被囚禁的政治犯丈夫到处找钱进行营救的忠贞的妻子；一个去看望因谋杀亲夫而锒铛入狱的妇女们的教员；一个满口怨言滑跌在地的农妇和她的幼儿；一个旧派的妻子；以及一个慈爱的母亲和她的当学生的女儿——每个人物（或每组人物）都是用来反映一小段社会史，不是仅仅写一个人，而是写社会集体。例如，最不引人注意的是电车上那对母女的形象，作者用两段简短的文字抓住了“几十年的文化”把中国两代人分隔开来这个要害问题，结果是造成了一条鸿沟：上年纪的男人同新一代的男学生之间（以及同革命者之间），对立情绪不断增长；而男女学生之间的团结也在不断增进，他们对于中国妇女受压迫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

在《徐美玲》这篇小说中，史沫特莱试用一种非常不同的方法，这是一种可以认为是比较具有“文学气味”的写法，或者至少更象是我们惯于阅读的那一类短篇小说的写法。也就是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有名有姓，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是一个特殊问题。她有软弱的一面，也有坚强的一面，她稍稍搞点小动作，试图使自己的丈夫同他的“白俄舞女”割断关系。她的丈夫也是一个由作者专门塑造的人，他喜欢摩登，“他把摩登同美国风俗习惯混为一谈”。他俩有几个年轻的女儿，其中有个女儿只有八岁，会跳“查尔斯顿”*。徐美玲的丈夫并不打算把那个俄国舞女领回家来；他想的是一种摩登的办法，把自己的妻子“送走”——或者叫做离婚。

在妇女解放运动者史沫特莱的心目中，她关心的只是徐美玲的内心斗争，对于徐的性格，史沫特莱既同情又厌恶：

“她的整个生命都灌输着旧式女子所具有的那种保守、庄重和沉着。可是她又是那么的无知、迷信和多疑，她只懂得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尽管她处于从属于丈夫的地位，但是却拒绝陪同丈夫每星期去看几次美国电影。她受不了女人袒胸露背和公开谈情拥抱的两性关系的镜头。史沫特莱在小说中安排徐美玲决定亲自到丈夫的新欢那里看她跳舞，这样的安排是有着她自己的原因的：她赞赏徐美玲那种自以为崇高的姿态。但小说的结局既哀婉动人又带有辛酸的喜剧色彩：徐美玲请求史沫特莱教她跳舞，她用那双经过缠足、后来虽然解除了缠足布但足趾已经残伤的小脚“跌跌撞撞地跳

* 二十年代在美国开始流行的一种交谊舞，有似五十年代以来的摇摆舞和迪斯科舞。当时很快就传到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流行一时。此舞发源于美国西弗吉尼亚的查尔斯顿市，故名。——译注

了几步”以后，就站在那里哭泣起来，而留声机却仍在唱着摩登的爱情歌曲。

小说描写了徐美玲的困境，但史沫特莱也描写了她的丈夫。他是一个把坚持压迫自己妻子的那种中国封建主义同以女性社交公开来掩饰压迫妇女实质的西方摩登主义两者混合在一起的人物。此外，史沫特莱还以寥寥数笔简练地勾划出中国正在演变之中的一幅比较广阔的社会背景，因为那位丈夫是一个“美国化”的银行职员，他雄心勃勃，想当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名中国代理商。

在《奉天五女子》这篇小说中，也有一段描写一个旧式的妻子。不过小说中对她着笔不多，只说是“年老、疲乏和丑陋”，只是有一双“聪明”的眼睛。她没有自己的戏可演，因为她“不敢反对”她丈夫“买一个十六岁的卖唱姑娘领回家中当小老婆”。斗争的焦点集中在父亲同他的长子之间，这个长子就是他母亲的保护人。史沫特莱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于说明妻子们受到压迫，更在于说明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新一代人是革命意识的产物，在革命意识中，妇女解放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⑩

《奉天五女子》在文笔上也不亚于《徐美玲》。两篇小说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笔法，但文章中都有了一般人物的模式和个人特色的模式。两篇文章的政治作用和艺术作用是不同的。史沫特莱企图寻找其他的文学形式来实现她的政治使命，但在此之前，我们先把她在中国结识的文学好友（以及在某些方面是她政治上的良师益友），作一简短介绍，也是有所裨益的。

“我为这种不平等现象痛苦万分”

史沫特莱有幸及时前往中国，在鲁迅生前最后六年中结识了这位文豪。鲁迅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始人，他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家。他早年在日本学医，后来为了改变他祖国同胞们的思想，他改行从事文学工作。史沫特莱同他相识的时候，鲁迅已经成为一名政治活动家，并且是三本短篇小说集的作家，这批短篇小说现在已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主要创作于1919年到1926年。史沫特莱住在鲁迅家中，把其中一些短篇小说译成英文，并且在另外几项文学工作中同鲁迅合作。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对史沫特莱的工作和当作家的立场观点产生影响，是不足为奇的。

初看起来，拿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小说选》英译本同史沫特莱这本《革命时期的中国人》对比一下，有一个共同点：鲁迅和史沫特莱为“不平等现象……而痛苦万分。”^⑩鲁迅的小说描述了形形色色中国人的生活，从赤贫如洗和苦难深重的人到无忧无虑的富人，应有尽有。而他把写作的重点放在那些不幸的、通常是孤立无援的受难者身上。在鲁迅所写的小说中看到了一线希望，那就是少数人为变革而进行的斗争，由一位叙述者或故事人物的身上闪现出觉悟的火花。故事中讲的，是人们对于最最恶劣的环境，最最野蛮的信念，以及有些人对别人的极端残忍所抱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忍耐态度。默默无闻的殉难者虽然不一定是英雄人物，但是他们会在人们的记忆中闪光。总的说来，鲁迅的小说呐喊出人们必须有所作为，这种“有所作为”，犹如鲁迅有篇小说，题为《一件小事》。

《一件小事》的篇幅只有两页半，小说讲一名人力车夫

为了救一个穷苦的老妇而放弃了他的顾客。坐人力车的乘客（小说的作者）起先怪车夫多事，认为那个老妇“一定是装腔作势”，还认为如果那个老妇到“巡警分驻所”告他一状，车夫一定会受到惩罚。无可奈何，作者只好静坐在一旁看着这场戏：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向作者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作者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并请巡警把铜元交给车夫。多年以后，作者还告诉我们：“独有这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②

这是一件小事。我们西方人可能转眼就把它忘了。作者身穿的“皮袍”是无法同老妇穿的“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的破棉背心”（因此被车把兜住，跌倒在地）相提并论的。我们也习惯于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人拉车另一人舒舒服服地坐在车上。这就是这位愤世嫉俗的作者于1920年写出了1917年冬天发生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因素给了他这种

*《一件小事》作于1920年7月，收录在《呐喊》中。此段文字引自《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译注

“勇气和希望”的呢？有人从鲁迅这本小说集的其余各篇小说中看出一点，这就是在旧中国穷人和受压迫者之间缺乏勇敢的团结。

鲁迅在二十年代初期所写的小说，不可能歌颂革命者的英雄品质，也不可能赞美象他自己那样的知识分子，在他第一部文集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增长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⑭ 为了避免这种寂寞，他就写小说。他主要写旧中国的苦难，写他自己的个人悲愤。他知道：“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⑭ **

史沫特莱认识到作家可以发挥政治作用的想法，是由于她同鲁迅合作而形成的，但她受鲁迅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迄今尚难确定。同鲁迅的其他学生一样，史沫特莱是比这位老师更为年轻的一代，她比鲁迅更直接地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她与一十年代后期和二十年代初期时的鲁迅接触的事有所不同，她参加过十分明确的政治运动，她体验过政治运动，可以写出这种政治运动。而鲁迅当时只能对变化着的未来提出一些希望的火花——因为当时在中国也只能提出这

*指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自序”。此集收录1918年至1922年的作品，1923年8月的初版包括小说15篇，1930年1月第13次印刷时作者抽去其中《不周山》一篇，此后各版只有小说14篇。——译注

**关于鲁迅在《自序》中所提到的“寂寞”和“希望”，本书后记的作者只是从英译本中引用了鲁迅的二、三句话，未能全面反映鲁迅先生当时的思想，故特按中文版摘录补充，以便读者了解鲁迅的原意：“‘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在我自己……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译注

种火花，甚至在五四运动掀起之时，情况也是如此。直至十五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立起一批根据地，才真正开始了一场长期的革命斗争。有了这种革命斗争，才使史沫特莱有可能把“勇气 and 希望”真正灌注到她的作品中去。

她歌颂的不仅仅是阶级团结或妇女团结（也有少数这样的例子，如《妇女参加抗战》中蔡妈妈领导下的那批农村妇女之间的团结，或《缫丝工人》中的那批广东女工之间的团结）。她也赞赏家庭内部的公开冲突，包括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夫妻之间的冲突，特别是以阶级为分界线的冲突。她也写同一个阶级内部发生的冲突，如在《白色恐怖片断》这篇小说内，她描写了同样是穷人出身的中国士兵竟对中国的农民实施了无以复加的恐怖和残杀，但小说的效果并不是完全令人绝望。因为小说微妙地把主题转到了有觉悟和没有觉悟的问题上，而不只是叙述那位怀孕少妇和年轻男孩的壮烈牺牲问题，他们的英雄气节来自他们的“觉悟”，而他们那些同胞们（白匪士兵）的邪恶行为则出自封建的无知。在这本集子中，这篇故事也许是史沫特莱学习运用鲁迅流畅笔法的最佳作品，对小说中的人物，她寥寥几笔，就把他们的个性勾划得淋漓尽致。

史沫特莱仿效鲁迅的文风，试着在另外两篇小说中描写两名上层阶级的妇女冲破中国的阶级界线参加革命的经历。在《共产党员单菲》和《献身者》这两篇小说中，史沫特莱不仅仅只是向西方读者报道中国妇女的生活正在发生某种变化。她公开向大家宣传，为了使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妇女们已经勇敢地起来为改变自己的生活而进行斗争。总之，史沫特莱正是企图通过两名妇女的生活的现实经历，把中国革命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的总面貌介绍给西方读者。

要史沫特莱采用自己不熟悉的文风来撰写小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这种文风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也是不习惯的。这种文风不重视“情节”的长段描写，没有对话，小说的论点重共性不重个性，思路也是平铺直叙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西方）小说或报告文学所忌讳的。

人们的反映是各种各样的，这并不奇怪。如果我们要从人物描写中寻找个人的风格，或者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感到失望。如果我们对历史表示关心并为社会的文献记载所感动，那末我们就会觉得史沫特莱的作品即使不是完美无瑕的，也是很有价值的。这些小说也许还有助于向像我这样的关中国的那些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者解开各种疑团。这些疑团的出现，部分原因在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者本身对中国的历史和思想一无所知，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阶级与妇女解放运动这两者的关系混淆不清。

这两篇小说都是写妇女解放的，至少是以妇女解放开始的。两篇小说描写的都是一名妇女在另一名妇女的帮助下摆脱了封建的家庭束缚和封建的观念，后来都成为一名共产党领导人。她们两人所经历的年代相同，对二十年代后期革命成功后又发生反革命叛变的那段短暂的激变都同样地痛痒相关。两人都同社会阶级地位比她们低的农民结婚，而她们的丈夫都是年轻时就已牺牲的革命者。但是这两个妇女和她们的经历是大不一样的，尽管在人物性格描写方面我认为是共性多于个性。实际上，小说中以简短的文字描述那个采取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逃脱行动的单菲，比起《献身者》中的张小红来，是一个更为令人可信的人物，这也许是因为小说中没有让单菲叙述她自己身世的缘故。

史沫特莱在小说中写这两个妇女的历史年代，大致与她

自己《大地的女儿》的年代相似，都是写妇女三十岁以前的生活，而这三十岁的光阴大多又消逝在二十世纪最初的三十年之中。在《共产党员单菲》这篇小说中，史沫特莱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并且采用了中国古典小说中节省笔墨的“无话即短、有话即长”的概括性很强的笔法，鲁迅对于这种笔法是推崇备至的。史沫特莱从两种不同的思想重点简要地叙述了单菲的身世。第一个重点是讲史沫特莱自己关心的妇女解放问题，小说通过单菲那位小脚母亲的“开创性”努力，讲述她从自己当学生的儿子身上得到启示，为了送女儿上学和最后获得自由，同“敌人”（她的丈夫和叔伯兄弟）展开斗争。小说的后半部分则是讲一位革命妇女。小说中只用一句句子讲她生了一个孩子，只用几句句子讲述这个孩子惨死在白匪军的手中；至于单菲同他那位农民丈夫的共同生活，小说中只字未提；关于她丈夫的牺牲，也只写了两段话，比描写她本人囚禁六个月的篇幅还要少。而且，以上这些事情都是穿插在她于农民中间、在工厂中、在当情报人员和宣传鼓动员时进行革命工作的情节中写出的。小说结尾的思想十分明确，作者要提醒我们，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妇女解放。这也是史沫特莱在《大地的女儿》中所表露出的她自己的阶级意识。小说结尾的文字是：

有人也许会问：“单菲年轻吗？长得漂亮吗？”

……她身体结实，象个农民，看来很难把她同泥土分开，这是她的命根子，她牢牢地扎根在这片泥土中。说她漂亮不漂亮？我不知道，但是，难道泥土不漂亮吗？

同《共产党员单菲》相比，《献身者》这篇小说，作为

社会历史的记载，它比较激动人心；作为一篇小说，则不是那么成功。写革命者不是那么容易的。作者很容易堕入颂扬或贬低等公式化的陷阱之中。史沫特莱仅仅是当张小红在“伟大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之时稍稍颂扬她几句。她的面容有“一种过人的智慧”，她的一双眼睛能“看透一切，理解一切”。她用连续不断的独白讲话。这是借用“中国封建旧舞台”上那种“演员们……往往一一走到台边自报扮演的角色姓名”的一种念白方式。史沫特莱为《献身者》这篇小说写的第一段文字是非常抒情的，可能同接下去所写的张小红的开场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张小红的独白很快就从两个方面把读者引进了故事：一个方面是叙述她自己的身世，首先从她的祖父讲起，总的说来，这种叙述是粗线条的；另一个方面是用冗长的细节（有时是用华丽的辞藻和细腻的分析）来叙述象以贫苦农家姑娘做奴仆交易之类的社会丑恶。这篇小说的节奏比《共产党员单菲》要缓慢一些，把社会历史、政治分析和报告文学揉合在一起了。小说以比较复杂的情节把妇女解放这一主题纳入了中国革命的背景之中。

张小红的祖父出身清贫，但在香港从英国人那里弄到一份差事，于是就一生搜刮钱财，大肆扩展他的家业，他后来也成为个剥削别人的人。某些进步思想也随着帝国主义的钱财一起进入他的家门，其中包括妇女受教育的思想，这时，张小红是大胆进入香港新办的男女生一起上课的学校的第一个姑娘，她还亲眼看见在她祖母的厨房里贩卖贫苦的农家姑娘的情景。同格里姆克姐妹*一样，童年的经历，促使张小

*格里姆克姐妹是美国十九世纪提倡保护妇女权利、允许人工流产的活动家，姐名安吉利娜·埃米莉，妹名萨拉·穆尔。1885年美国作家C·H·伯尼写过她们的传记《格里姆克姐妹》，1969年此书又在美国再版。——译注

红终身树立起痛恨不公正现象的意识。小说以更长的篇幅描写契约劳工，这是当时“男工奴役贸易”的一种形式，作者借此加深分析帝国主义对中国封建主义的影响，同时也借此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妇女受压迫只是问题的一半。张小红回过头来讲述自己的优越生活时，小说构划出了这样一幅情景，用张小红的角度来说，就是：“这段奴隶制度的故事……只是无数件人压迫人的事实中的一件，它唤起了我的责任感，它向我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嘴脸。”

当然，在张小红同自己决裂以前，这种嘴脸也就是张小红本人的嘴脸。她的两个姐姐都是按父母之命不幸地出嫁的，两人都帮助张小红同家庭进行斗争。张小红不但没有按父母之命出嫁，而且还上学读书，当了一名医生，并立志要“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服务”。在这里，作者再次运用独白把这个独特的妇女描绘一番，描写了她的学生生活，描写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描写她在战场上工作时的“强健结实”的体格，描写在战场上她用“铁的”信念和“干劲”来代替泪水；她比较出色地描绘了几场血腥恐怖的情景，首先是1926年3月18日的北京大屠杀*，其次是1927年的广州大屠杀**。史沫特莱在暴行面前毫无惧色。对于张小红来说，这种暴行就是她出身那个阶级给予她的最后纪念品，即使女性也难于幸

*指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等领导北京总工会等团体和学生为抗议日舰于12日炮击大沽口事件而举行的集会和请愿，段祺瑞政府出兵镇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译注

**指国民党军队镇压广州起义。1927年12月7日，广州起义行动委员会秘密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决定13日起义，因事先泄露消息，乃提前于11日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领导下发动起义，成立苏维埃政府。12日，国民党军队向广州反扑，张太雷遭暗杀。13日，国民党军分四路进攻，在力量悬殊下，起义军撤出广州，国民党军队在广州进行大屠杀。——译注

免，因为张小红是这样讲的：“一些资产阶级妇女走过大街，朝受伤和垂死的工人们弯下腰去，用石块或木头把他们打得脑浆横流”——或者做得比这还要残忍。

小说是以共产党员张小红措辞肯切的长篇演说作为结束的，她认为“过去，作为特权阶级的一员学到不少知识，现在我应该把全部知识贡献出来为工农服务。”实际上，这种说法同她的个人身份是不相称的：她应该属于各次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真正一员，属于正在进行中的革命的真正一员。

如果说，用我们一般的条件来衡量，《共产党员单菲》和《献身者》这两篇都称不上是成功的小说，那末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对这两篇小说所提出的要求正好是史沫特莱所不愿意或不能采用的写法：把革命妇女的日常生活写得同男性的中国革命家一样，没有家室之累，没有夫妻生活，没有对丈夫或孩子的爱。史沫特莱要写的，却是对动机的透析。对于单菲，写她那位“叛逆”、“不寻常”的母亲；对于张小红，写她祖母的贪婪和婢女们的眼泪。史沫特莱还用比这些琐事要开阔得多的视野，通过第一人称的自述或独白，写出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思想，以便向西方读者解释中国妇女解放同共产主义革命这两者之间不可割断的联系。作者再次从强调阶级的观念出发，写群众的历史，而不是个人的历史。

史沫特莱写这两篇小说，是她设法使自己成为一名政治作家而进行的部分尝试，也是为了寻找一种文风——一种既当作家又当战斗生活直接参与者所应有的文风，而不是她经常所说的“除了当一名作家，我什么都不是，我仅仅是一名旁观者。”^⑥这两篇作品，同本书从《中国人民的命运》中选录的其他几篇作品一样，都是史沫特莱早期运用她新闻记者的所见所闻和她对中国几次重大历史事件的了解而写成的

小说。

“我渴望有一种视觉的火花”

对于史沫特莱来说，发挥作家的政治作用并非是一个抽象的问题。除了国籍问题（她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老是困扰她以外，这位作家还有“什么事情先做，什么事情后办”的日常事务要安排。例如，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写道，1937年夏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朱德奔赴前线，我留下来写另一部未完稿的书……我就去请示毛泽东。”她接着写道：

我问毛泽东，他认为我应该做哪件事更为重要：是留在延安写朱德传记呢，还是奔赴前线报道这场战争。

毛泽东说：“写这场战争比写过去的历史更加重要。”

于是我就收起笔记本，准备奔赴前线。^⑩

史沫特莱从前线发回一篇篇通讯，编成了《中国在反攻》，这部作品是这场战争的直接记录，从而赢得了多次重印，同时也使史沫特莱赢得了随军新闻记者的好名声。

本书收录的最后一篇作品《矿工家属》转引自《中国在反攻》一书。这篇小说是史沫特莱无法忘却她自己的美国身世的一个例证：“全世界的矿工们”，她告诉我们，“外貌都一样……”只是在小说中没有提到，她本人也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同小说中的中国矿工家属十分相象，对史沫特莱来说，这件事又强烈地使她感觉到自己同过去的历史有着

一段距离，同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也有着一段距离——因为她是一名作家。

我离开矿工们以后，再一次感到自己仅仅是一名作家，一个袖手旁观者。我看到矿工们粗大的、青筋突起的双手，我看到他们的布鞋磨破了，或者光着双脚，我看到他们沾满尘土的衣衫。我体会到，自己永远也没有机会去真正理解这些矿工和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我依然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把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物写成文章的作家罢了。

她在这篇小说的结尾时这样写道：“我这里所写的，不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实质，而只是一位旁观者的记录。”

在《中国在反攻》这部著作的其他文章中，史沫特莱也对自己的优越地位同中国士兵之间的区别作了同样的描写，她甚至把自己的担忧讲得更为明确：她那外国“旁观者”的身分已干扰了她当作家的职责。“中国的真实故事，”史沫特莱坚持说，“只能由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自己来编写。”而“目前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⑩即使在当时的环境下只有她一个人才能写小说，情况仍然如此。她是一名作家，她不是一名矿工、一名士兵，一名工人，也不是一名农民——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因此，她一定继续“渴望有一种视觉的火花，能使我深入到他们的头脑和心灵中进行观察……”^⑪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压力。还有一种传统的压力：如果她亲自投身于革命，她还能写出一本“好书”来吗？在《中国的战歌》（我认为这是她报道中国的最佳著作之一）最后的章节中，她直接谈到这个问题：

杰克·贝尔登随身带着一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如果把书中的人名和地名都换成中国的，那末这本书就象在描写当前这场战争。他问我，哪位作家能写出这样一部关于中国战争的书。我回答说，在我看来，只有自始至终实际参加这场战争的一个中国人，才能够写出这部书。不过我也认为，杰克有朝一日也可能写出一部很好的书。他在许多支中国军队中呆过，为了找到这些军队，他不得不煞费苦心打通种种关系。他比我更客观：他不代表任何一方，可以站在一旁进行观察，而我却总是忘记自己并非一个中国人。对我来说，中国的强大和软弱就好象是整个世界的问题。^⑩

史沫特莱把自己的作用说得这样小，这并非是她虚假的客气话。不论是出于她的个人自卑感，还是出于她思想上确信作家们应抱有不宣扬自己名声的态度，人们都不应对她的这种自我否定有所非议。她正在同各种困难的文学问题和政治问题进行搏斗，当然，我们这些写书和读书的人还要继续进行这种搏斗。

在《中国的战歌》这部著作中，史沫特莱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某些压力。我认为，本书所收录《战歌》中的几篇作品是属于史沫特莱的最佳作品之列。例如，在《缫丝工人》这篇小说中，史沫特莱是一名现场采访记者，小说利用旁观者的特殊技巧，剥去了官方假宣传的外衣，对广东省的妇女、做工和妇女解放等真相作了清晰的描写。在《妇女参加抗战》中，史沫特莱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大家知道她是一名妇女解放运动者。因此她自然而然地暗中参予把当地农村妇女组织起

来的工作，并且参加他们反对鸦片商的斗争。她为这些英勇的妇女们撰写这篇动人小说的时候，她是一位可以在场外替她们喝采助威的观察家。在我所喜爱的《中国的显贵们》这篇小说中，史沫特莱又提供了另一幅自画像，与此同时，对中国这个舞台也作了一次更全面的观察。

小说的直接主题是死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阔绰的生活，特别是对中国筵席的讲究，刻划得入木三分。根本的问题也就是鲁迅在《一件小事》中所讲到的那个问题。不过史沫特莱这篇小说的写法却与鲁迅不同。史沫特莱的“中国显贵”朋友是一批男性的“现代”知识分子实用主义者，他们看不起体力劳动，看不起政治，他们拒绝相信在中国存在着阶级这一现实，他们对待妇女依然采用封建的手段。妇女解放运动者史沫特莱则是一个例外：“对他们来说，我不是一个男人，不是一个女人，不是妾也不是妓女。我是一个外国人，年纪不轻，也不漂亮，自己挣钱，同男人们平起平坐。当老婆和谈恋爱都不是我的专长。”她不必公开宣称自己是一名作家。不过她公开向他们谈到自己亲身经历过妇女解放运动和中国革命。

小说描写显贵中有一人是在黄河附近进行考察的考古学家，史沫特莱迅速把笔锋转到黄河的现实情景——战争、饥饿、水灾。小说还叙述了一段采访火柴工厂的情节，这家工厂的工人都是童工、很少有人能够活过童年。小说一个接一个地迅速描写了悲惨穷人的死亡原因和可怕的富人。小说最后站在那些“敢于”牺牲和“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社会革命”的穷学生的立场上，向这些显贵们提出了挑战。

筵席未散，席间的欢乐气氛似乎使一切“有关中国妇女、中国显贵们和中国无产阶级”的争论烟消云散。但是小

说的结尾让大家坐“人力车穿过白雪满地的寒冷街道回家”时，笔锋一转，引到了最后一个鲜明的对比，史沫特莱想着：“我的人力车夫在我前面象一匹疲劳不堪的马儿那样奔跑着，一阵阵咳嗽打断了他那气喘吁吁的呼吸……突然间，她接着写道，“他那宽阔的肩膀不禁使我想起我父亲的肩膀，我是一条狗，我们全都是狗！”

如果有人向我们提到鲁迅那篇描写人力车夫的小说，我意识到那不是《一件小事》。但是史沫特莱所写的与鲁迅那篇小说不同，她是这样写的：

“你们听着！”我用毫无显贵气息的语调向我的主人们嚷道：“下车！把你们的车夫们拉回家去！让我们都下车，拉着我们的车夫回家去！让我们证明：中国不存在任何阶级！”

这是一个荒唐但却合适的结尾。无产者史沫特莱嘲弄了那批势利鬼，当天晚上要他们立刻将“没有阶级，人人皆是兄弟”这一幻想付诸于行动。史沫特莱可以在这里为自己的困境勇敢地创造一种喜剧效果，同时也可创造一种有力的社会评论效果。

通观《战歌》这部著作，可以看出，史沫特莱解决了（或者至少就创作的压力而言）她在文学和政治方面的难题。也许在她年过四十以后，她对写作的意义增强了信心，她在这部著作中倾注了自己的全力，讲出了一位英勇的垂死的中国军官告诉过她的一句话：“我们有自己的信念……请你转告贵国的同胞……”^②也许，她在《战歌》这部著作中找到了把自传文学、报告文学、叙事文、历史、旅行见闻和托尔斯

泰式的战时农村描写等形式奇妙地揉合在一起的良法。也许是因为她回到美国以后，有机会搜集到三十年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这些资料由于当年她身体不好、战火弥漫、政治变幻等原因在中国国土上是无法搜集到的。也许原因十分简单，正如她自己所写的那样：“我已经成为中国伟大斗争中的一员。”^②从各方面说，据我所知，很少有几本书能把个性和共性如此融洽地揉合在一起。《中国的战歌》这部著作把史沫特莱本人的旅行见闻同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揉合在一起了。通过这本著作，人们还发现了一个未来世界，在这个未来世界中，农民们不仅得以生存，而且将怀着尊严和希望生活下去。在一场野蛮的战争面前，很少有几本书能够象《战歌》那样使人们建立起信心和希望，尤其是对于西方人士。《战歌》脱稿于1941年，当时战争正在扩大，革命尚未成功，史沫特莱本人的生活也飘忽不定。这部著作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在人民群众颠沛流离的生活面前，那种浮华无实的文艺作品只不过是一堆污垢罢了。

尽管中国和美国对《中国的战歌》这本著作重新感到兴趣，但此书仍处于绝版之中，这反映出我们美国文学标准的狭隘性。《战歌》这本书，同现在这本新书一样，放在一般的分类中都不合适。这两本书既是文学作品，又是社会历史文献——何况作者本人还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妇女解放运动使我们中间许多人都觉得，需要为参加这一运动的或与之有联系的作家的作品专辟一些新的类目。在确定这些新类目的过程中，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也许再一次对我们有所教益。

我要感谢保尔·劳特，没有他，就无法写成这篇后记。他的观察能力和渊博学识是尽人皆知的，他为此书默默无闻

地进行的艰巨工作也许大家还不知道。

后 记 注 解

① 《大地的女儿》是一位工人阶级出身的妇女三十岁以前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从妇女解放出版社创立时就在该社工作的蒂利·奥尔森提出这本书值得重印，保尔·劳特为此写了一篇学术性的传记体后记。此书向现代的美国读者介绍史沫特莱，三年之中，读者大增。此书现已第五次重印，发行三万余册。

② 见《中国在反攻》（纽约先锋出版社1938年版）第xvii页。

③ 见本书《矿工家属》一文。

④ 同上。

⑤ 史沫特莱把她的文学遗稿留给朱德，她去世后，全部文稿连同她的骨灰都已空运到中国。这些文稿迄今未编出目录公开供外界查阅。

⑥ 见《大地的女儿》英文版第8页。

⑦ 见《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58年版）第xi页。

⑧ 同上，第12页，第18页。

⑨ 同上，第3页。

⑩ 这份笔记也为《贵柱的故事》提供了素材。

⑪ 见《中国在反攻》第18页。

⑫ 见《鲁迅小说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3年版）第65—67页。

⑬ 同上，第23页。

⑭ 同上，第24页。

⑮ 见本书《矿工家属》一文。

⑯ 见《中国的战歌》（纽约诺夫出版社1943年版）第168页。

⑰ 见本书《矿工家属》一文。

⑱ 见《中国在反攻》第112页。

⑲ 见《中国的战歌》第505—506页。

⑳ 同上，第411页。

㉑ 同上，第525页。

照 片 说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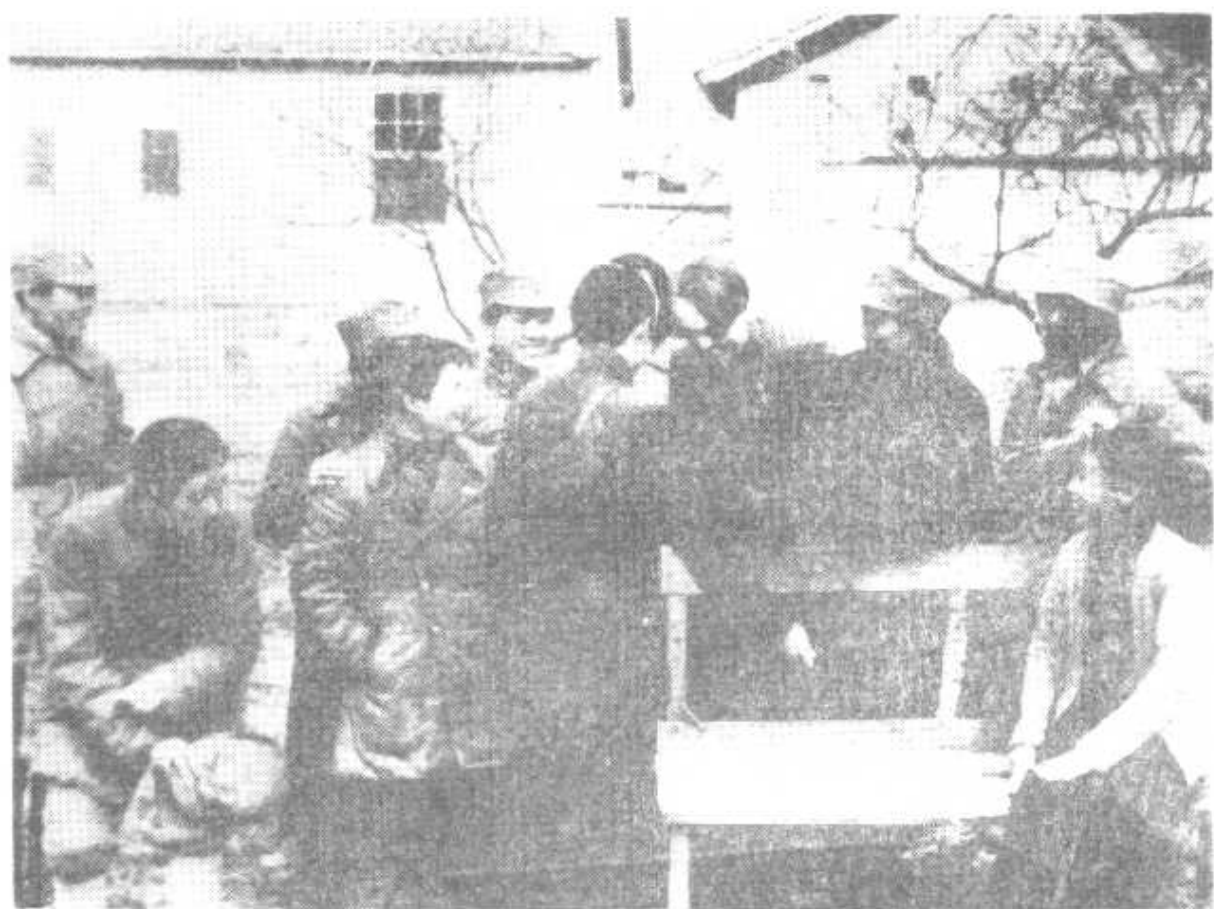
除史沫特莱本人那幅照片以外，都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于1939—1940年间亲自拍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史沫特莱是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多年生活在一起的唯一西方随军记者。除了她的著作以外，还留下了大批照片，记录了她在各游击部队中(特别是新四军)的生活经历。1950年史沫特莱去世，这批照片由她的好友托尼·威利森转交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档案馆收藏，其副本送交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

——原编者注

*本书全部照片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提供。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937年于延安（尼姆·威尔斯摄）



▲ 史沫特莱与湖北省第五战区妇女委员会在一起 ▲ 叙城县保训班妇女队





↑新四军暴风游击队领导人李先念(右)陈绍敏(左) ↓汉口以北地区妇女大会代表们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